

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

指導教授：吳志鏗教授

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眼中的中國

——以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為中心

研究生：陳瑩真

中華民國 102 年 1 月

謝辭

本論文能順利完成，首要感謝者是我的指導教授吳志鏗老師。我在大二時修習吳老師「中國近代史」一門課程，得知郭士立此人事蹟，進一步搜尋到他的航海日誌、其他著作，發現他的外文著作都尚未有中文版問世。雖然學界已有許多論及郭士立的文章，但針對他的外文著作詳加研討者卻付之闕如，這奠定我日後的研究動機。寫作過程中，每遇瓶頸，吳老師總耐心提點，耗費時間心力與我討論，在此深深感謝他。另外，亦感謝我的論文研究計畫審查與口試委員：陳惠芬、楊明哲兩位教授，您們的指正和建議使我的論文更加完善；同事黃顥秦老師協助我翻譯英文、李至倫老師幫忙繪製地圖，感謝您們。

四年的暑假進修日子令人難忘，修課時從早奮戰到晚、作業如排山倒海而來…，此生應不再有第二回了。在此感謝我的研究所老師、同學們，能暫別職場、重回學生身分，與你們討論歷史，是一件值得珍惜的事。感謝父母親予我無微不至的照顧，當我煩悶時總能聽我一吐不快，使我念書無後顧之憂。感謝妹妹幫我跑腿借還書、交作業；哥哥幫我處理電腦事宜；感謝先生一家幫忙照顧女兒，讓我能利用時間寫作。最後，我要感謝親愛的女兒沛謙，研三暑假在肚中陪我上課，出生後，及早畢業以陪伴她是我能完成這本論文的一大動力。

摘要

本論文由郭士立著作來探討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眼中的中國。第一章介紹研究動機、文獻回顧、研究方法。第二章裡，介紹郭士立的求學經歷、他到亞洲後的傳教工作、他在中國前三次航海的所見所聞，以及鴉片戰後在中國的傳教事業。第三章到第五章分別討論郭士立筆下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宗教，郭士立的中國印象，不完全是來自他親身經歷、體驗，有許多是得自前人經驗。郭士立文章中，對中國歷史、地理知識掌握不清，這應是由於他並未實際到過中國內地。仔細分析郭士立對中國的描述，牽涉到傳教事業者，他會給予批評，未牽涉傳教事業者，則不吝給予讚賞。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眼裡的中國印象，可說是既豐富又複雜，而郭士立眼中的中國印象，是混合了「過去」與「現在」、「讚賞」與「批判」、「真實」與「虛假」。郭士立在論述中國時，多方批判中國不是，或者虛構中西交流歷史，都是因為他將自己當作一位「醫生」，要告訴西方人「中國真的生病了」。若要根除中國病灶，唯有使用「基督教」這帖藥方。因此，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是透過宗教眼光透視出的中國，而郭士立筆下的中國印象，實反映出他熱切渴望令中國人改宗的寫作動機。

關鍵字：郭士立、傳教士、十九世紀前期、中國印象

目次

第一章 緒論	1
第一節 研究動機	1
第二節 相關研究成果回顧	2
第三節 研究資料、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7
第二章 郭士立生平經歷	14
第一節 成長、求學、抵達亞洲(1803~1831)	14
第二節 中國沿岸航行(1831~1833)	20
第三節 多重角色身負重任(1833~1844)	36
第四節 傳教事業再推進(1844~1851)	38
小結	42
第三章 郭士立眼中的中國政治與經濟	46
第一節 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運作	46
第二節 開放貿易為時勢所趨	56
小結	77
第四章 郭士立眼中的中國社會與文化	80
第一節 婦女地位與百姓印象	80
第二節 科技文明、藝術、教育	84
小結	101
第五章 郭士立眼中的中國宗教	104
第一節 道教、佛教的粗略認識	104
第二節 天主教、基督教與改宗的樂觀信念	119
小結	126
第六章 結論	128
參考書目	132

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研究動機



十九世紀對中國兩千多年歷史而言無疑是劇變的時代。在此之前，中國發展出獨特文明，不僅深深影響到周圍國家，也形成了以中國為中心的國際秩序觀。¹但進入到十九世紀，如此孤立的政治體系卻遭受西方列強不斷地挑戰，隨著「天朝體制」瓦解，中國被迫對外開放，也被迫進入近代國際外交體系。中外學者在探討十九世紀中國與西方接觸時，多從廣州貿易、鴉片戰爭等角度說明中國對外開放之過程，費正清並提出了「條約體制」從十九世紀四零年代開始建立的說法。²然而，要瞭解十九世紀中西方交流情況的轉變，除了從政治、經濟方面分析，社會、文化方面亦不可缺少。傳教士對中國的描寫正好可彌補官方記載之不足。十九世紀以前，西方傳教士有三個時期進入中國：七世紀時傳入唐朝的景教、十三世紀時以孟高維諾（John of Montecorvino）為主的傳教活動、及十七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傳教。³此三次傳教活動與十九世紀初傳到中國的基督新教活動有很大不同：第一，這三次傳教對象多為王公貴族等少數上階層人士；第二，這三次傳教活動並沒有造成中國社會的本質有所改變。而十九世紀首度入華的基督新教傳教士，傳教對象是中國社會中平民百姓，雖非直接與中國政府官員有所接觸，但其傳教活動卻在中國政治體制轉變中扮演不可或缺的角色。本論文所研究對象正是十九世紀初至中國的基督新教傳教士。⁴

鴉片戰爭以前，無論是西方商人、外交官或傳教士，都希望中國能夠開放，也都主張必須藉由武力才能使中國開放。十九世紀前期進入中國的外國人當中，傳教士最能深入參與中國百姓生活，對於「將中國介紹給西方」也充滿興趣。⁵本論文基於此觀點，欲從基督新教傳教士的經歷探討：在十九世紀中國、西方勢力

¹Ranbir Vohra, *China's Path to Modernization*. (N.J.: Prentice-Hall, 1987), p.23.

²Denis Twitchett, John King Fairbank 主編，韓復智等主譯，《劍橋中國史 晚清篇》，臺北：南天，1987，頁 256。費正清認為，1840 到 60 年代是中國建立外交新秩序的第一個階段，此階段中國與外國關係漸漸由過去朝貢貿易制度，轉變為與外國簽訂條約的新制度，此階段中條約體制逐漸形成。1860 到 90 年代，通商口岸成為中外共治及文化混合的都市中心。而通商口岸對全中國的影響也愈來愈大。1890 到 1920 是第三個階段，在這個階段中，外國人對中國的影響是如洪水般的全面影響，使得中國傳統社會與政治形態趨向分裂與轉型，也可看到通商口岸內出現中產階級和資本主義。1920 到 1950 年是第四個階段，條約體制為日本的侵略所破壞，繼而為共產黨所領導的革命新秩序所取代。

³此三次傳教皆為天主教。唐朝傳入中國的景教即是西方聶斯托裡教派(Nestorian Church)。

⁴在本文中，筆者指稱的「傳教士」皆指稱狹義的基督新教傳教士。

⁵ Suzanne Wilson Barnett、John King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f the Dept. of History, 1985), p.2.

此消彼長時，中國在其心中呈現何種圖像，傳教士們在其日誌、報刊中如何論述此階段的中國。經由研究當時傳教士的著作，可深入瞭解其中國經驗、中國印象，這些對中國的描述是否正確、是否帶有正面評價或負面評價，也是本論文想研究之處。因鴉片戰爭是中國天朝體制崩解的明顯分界點，本論文為避免時代跨度過長流於瑣碎，將研究時間範圍界定在十九世紀前半期—1800 至 1850 年間，並以此階段一位傳教士代表人物—郭士立(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1803~1851)為中心做研究。

郭士立出生於普魯士，成長過程中在柏林、荷蘭接受教會學校的傳道訓練。後因緣際會結識馬禮遜(Rev. Robert Morrison)牧師、麥都思牧師(Rev. Walter Henry Medhurst)、湯雅各牧師(Rev. Jacob Tomlin)等，習得華語，並到巴達維亞、麻六甲、泰國等地傳教。1831 年到中國以後，出版許多傳道小冊、翻譯聖經、發行期刊，將自己的中國見聞詳實記載。雖然他直接參與的政治、經濟活動遭致中國的負面評價，但他無疑是位富有文采又多產的作家，其各項著作極具重要性。本研究希望以郭士立的種種著作為主，同時期至中國活動的西方人作品為輔，探討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的中國印象，使我們在看待中西交流時有更多方面的視角。

第二節、相關研究成果回顧

欲瞭解十九世紀前期進入中國之基督新教傳教士事蹟，可參考《中國基督教基礎知識》⁶、《中國基督教簡史》等書，⁷其中按照時間順序詳列了馬禮遜、麥都思、裨治文、郭士立、伯駕(Peter Parker)、理雅各(James Legge)、丁韪良(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等，介紹基督新教傳教士進入中國的發展。除介紹傳教士外，也提及隨傳教帶進的西學、傳教士建立的教會及學校、太平天國及排洋仇教事件、本土中國教會發展…等。台灣的財團法人基督教宇宙光全人關懷機構為紀念馬禮遜入華宣教 200 週年，2006 年開始出版了 30 冊新教傳教士入華的相關學術論文集，與本論文高度相關者有第六冊《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文集》⁸收錄〈郭士立與福漢會〉和第二十九冊《傳教士東來傳教恩論文集錦》收錄了〈傳教士與近代中西文化交流〉。⁹

概述性介紹郭士立的期刊論文，則有譚樹林〈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與中國傳統文化〉，¹⁰文中介紹首批入華新教傳教士活動。並以 1807 到 1842 年間對中國影響較大的三位新教傳教士：馬禮遜、郭士立、裨治文在中國的活動，說明他們的世俗著作所宣揚有關西方文明的知識，給中國傳統秩序的基礎帶來了衝擊和威

⁶ 卓新平，《中國基督教基礎知識》，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頁 179~211。

⁷ 姚民權、羅偉虹，《中國基督教簡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⁸ 吳義雄，《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

⁹ 顧長聲，《傳教士東來傳教恩論文集錦》，臺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

¹⁰ 譚樹林，〈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與中國傳統文化〉，《北方論叢》，1998 年第 4 期，頁 101~105。

脅，也使一部分睿智的中國人如林則徐、魏源等不再沉溺於「天朝大國」的美夢裡，而開始「睜眼看世界」的歷程。¹¹李樂曾〈近代德國基督教(新教)傳教團在中國活動概述〉一文，比較清末德國天主教與基督新教傳教士在中國活動之差異——相較於天主教傳教團先後受德國國內政治、對華政策、宗教政策的影響，表現出後來居上和極具發展的趨勢，基督新教傳教團在中國呈現一個時間較長及相對平穩的發展過程。¹²邢甲志〈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在中国的活動及其影響〉概述了郭士立在中国的活動及出版物，結論中將郭士立視為一個「集傳教士、鴉片走私販、間諜、侵略者及學者」於一身的人物。¹³上述期刊論文除了有助查考郭士立一生經歷外，對於邢甲志將郭士立定位為「集傳教士、鴉片走私販、間諜、侵略者及學者為一身」，也是本論文在探討郭士立的中國印象後，要檢討的觀點。

目前學界對郭士立一生做出詳細研究者，當屬美國羅格斯紐澤西州立大學的榮譽退休教授魯珍妮(Jessie Gregory Lutz)，她在 2008 年出版的《開放中的中國：1827~1852 年間郭士立與中英關係》(*Opening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一書，¹⁴是近年西方學者對郭士立進行系統研究的知名著作。此書中首先提到，十七至十八世紀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的時間是短暫的，基督教對中國產生深遠影響應是從 1807 年馬禮遜入華開始。中國在 1807 年到 1852 年間的轉變非常巨大，鴉片戰爭後西方貿易商及傳教士在條約體制下得到正式居留權，無論是基督新教或天主教傳教士人數都快速增長。過去中國自認為西方仰賴中國，中國不需要西方的商品，但十九世紀前期，數以千計的西方商人、語言學家、科學實驗家、傳教士…進入到中國，郭士立正好是這段期間在中國傳教者，他不僅見證，也實際上參與中國這段時間的改變。對郭士立而言，中西貿易、外交關係以及基督教信仰在這段期間都逐漸開放。接著，魯珍妮描述郭士立出身時日爾曼地區情況、他的家庭背景、受教育過程、如何到中國傳教…等。雖然此書副標題強調 1827~1852 年間郭士立與中英關係，但由於得到倫敦大學友人蓋瑞·泰德門(Gary Tiedemann)、雷(Ray)等人協助收集材料，¹⁵翻譯德文手稿，本書得以具體描繪出郭士立到中國之前的生活，也得以一窺他的心理發展。在多方面研究郭士立在中国的活動後，作者在此書結尾提出問題：「郭士立是一位牧師還是一位侵略者？他是一位吹牛者還是一位天才？」留待讀者自行做出評價。郭士立的真實個性和人格特質也許仍是模糊不清，但他能激起西方人對中國產生興趣和到中國傳教之意願，他在十九世紀前期中西交流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目前有關郭士立到中國之前的經歷研究稀少，史料來源取得不易，因此

¹¹譚樹林，〈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與中國傳統文化〉，《北方論叢》，1998 年第 4 期，頁 101。

¹²李樂曾，〈近代德國基督教(新教)傳教團在中國活動概述〉，《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 年 9 月，頁 69~73。

¹³邢甲志，〈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在中国的活動及其影響〉，《黑龍江科技資訊》，頁 110。其中「德國」應改為「普魯士」較恰當。

¹⁴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¹⁵前引書，前言。

本論文第一章第一節將引用魯珍晞此書來介紹郭士立到中國前的活動。

針對「郭士立」一人相關的專題研究，主要有研究郭士立的「醫藥傳教」以及郭士立所出版的中文月刊《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以下將分別敘述：

第一，強調郭士立的「醫藥傳教」思想。例如張琳〈郭士立的醫藥傳教思想與實踐〉¹⁶指出「醫藥傳教」是基督新教傳教士在中國特有的環境和經歷中摸索出來的特殊傳教方法。最早倡導醫藥傳教者就是郭士立。醫藥傳教可視為一種大規模的慈善活動，不僅給病人帶來實際利益，同時也帶來西方醫藥科學及醫學教育，對中西文化交流極具貢獻。卞浩宇〈基督教新教早期在華“醫藥傳教”剖析〉¹⁷探討「醫藥傳教」理念之成因、「醫藥傳教」如何實踐以及「醫藥傳教」之影響，作者認為，郭士立停留在「醫藥傳教」的理論探索階段，將「醫藥傳教」發揚光大者則是近代來華的第一位正式醫學傳教士——伯駕。¹⁸本論文第四章第二節裡會討論郭士立眼中的中國醫藥學，將以上述有關「郭士立醫藥傳教」的相關研究來探討其間的關聯性。

第二，研究郭士立所出版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1833年在廣州創刊，是基督新教傳教士在中國所發行的第一份中文月刊，郭士立希望此份刊物能讓中國人認識到西方人並非蠻夷，藉由傳播西方新聞和知識，告訴中國人應該向西方人學習。¹⁹有〈《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析論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過渡形態〉、²⁰〈關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若干問題的探索〉、²¹〈《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宗旨及編輯特色〉、²²〈《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創辦的社會歷史背景〉、²³〈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近代中國的影響〉、²⁴〈開啓中國大門之先聲：《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等²⁵。這些文章都介紹了《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創辦緣由、刊出內容、所具價值。對於此刊物之發行都給予高度評價，認為此刊將西方的地理、風俗、科學技術、宗教信仰…等介紹到中國，揭開中西文化交流的序幕，也啓迪中國近代知識份子、促進中國「師夷長技」思想形成與實踐。另外，《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採用分類編纂方法，設有各欄欄

¹⁶張琳，〈郭士立的醫藥傳教思想與實踐〉，《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4卷第5期，2005年5月，頁16~19。

¹⁷卞浩宇，〈基督教新教早期在華“醫藥傳教”剖析〉，《歷史教學》，2008年第8期，頁45~50。

¹⁸前引文，頁47。

¹⁹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12。

²⁰武占江、王亞南，〈《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析論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過渡形態〉，《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1期，2006年1月，頁97~102。

²¹黎尚健，〈關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若干問題的探索〉，《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8卷第8期，2009年8月，頁13~16。

²²羅大正，〈《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宗旨及編輯特色〉，《學術界》，第132期，2008年5月，頁237~241。

²³羅大正，〈《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創辦的社會歷史背景〉，《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24卷第6期，2008年11月，頁120~122。

²⁴羅大正，〈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齊魯學刊》，2008年第5期，頁54~57。

²⁵羅大正，〈開啓中國大門之先聲：《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歷史教學》2008年第22期，頁46~49。

目及分類標題，也輔以插圖配置，這些都是近代報刊的基本格式。尤其，此刊設有新聞專欄及刊登「物價表」以報導「市價」，是中文報刊之首創，可謂開近代中國報刊之先河。

方姿堯《從衝突到和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書寫策略與文化意義》是研究《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最新成果。²⁶方姿堯認為，過去學者在研究此刊物時，多定位為「世俗性強」的著作，她認為此刊物其實帶有宗教動機。過去研究多針對「新聞」主題，而方姿堯想從「倫語」、「天文」、「煞語」…等其他項目，探討其中意義。所謂「和合」指「相互接和」，例如書中「東西史地和合」即把中國歷史納入基督教歷史發展中。方姿堯指出：傳教士會引用、剪貼儒家經典，以傳達中國思想與基督教教義本於同源。郭士立在書中塑造英國成為教育、法律、社會秩序的典範國家，美國則是光明希望的國度，藉以激發中國人對基督教國家的嚮往。郭士立藉由此刊物想扭轉中國人對西方人的歧視，過去中國人視西方人為「夷」，但郭士立在此刊物中書寫的「夷」卻是指「還未信仰基督教的人」。由文學角度來看，《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是採用「歐話白話文」，²⁷成為民初白話文運動的先聲。不過，方姿堯在論文當中提到：「第二次航行時，阿美士德號上攜帶傳教手冊，使阿美士德號由原本的商業探路，轉變為具有宗教目的的一趟航行」，²⁸實際上阿美士德號的航行本就是出於商業探路動機，船上攜帶傳教手冊是郭士立個人行為，想藉由參與探路適時傳教，不應擴大解讀成船長及所有船員都是出於宗教目的而航行。方姿堯較少從歷史角度指出《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的錯誤書寫，例如編者黃時鑑誤將阿美士德號當成是阿美士德使團、郭士立誤將佛教傳入時間定在東漢明帝…等，²⁹她在緒論中寫「『德國普魯士』傳教士郭士立…」對郭士立的國籍描寫有誤。但整體而言，方姿堯的論文算是目前對《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有深入研究的著作，本論文在第五章討論到郭士立如何描述中國的宗教，將討論此篇論文中提到有關郭士立對中國佛教的錯誤描述。³⁰

其他與本論文有關的專題性著作，以下將分段做回顧：

第一，班傑明·路易士·費雪(Benjamin Louis Fischer)所寫的博士論文《鴉片販賣與聖經走私》，在探討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在中國的活動與鴉片戰爭關係。³¹費雪認為，十九世紀初，英國傳教士堅持進入到封閉的中華帝國而擾亂傳統的茶葉三角貿易。傳教士的學識以及文筆都充滿吸引力。雖然他們寫作目的是為了對民眾傳教，但其影響力卻擴及使中國當地文化轉變，以及緊接而來鴉片戰爭後中

²⁶方姿堯，《從衝突到和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書寫策略與文化意義》，政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100年4月。

²⁷袁進，《中國文學的近代變革》，廣西：桂林師範大學出版，2006，頁69-96。

²⁸方姿堯，《衝突到和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書寫策略與文化意義》，政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100年4月，頁26。

²⁹前引書，頁87。本論文引用的《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刊物，是採用北京中華書局出版，黃時鑑先生整理編輯成的版本。

³⁰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87

³¹Benjamin Louis Fischer, "Opium Pushing And Bible Smuggling": Religion and the Culture Politics Of British Imperialist Ambition in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08.)

國在外交體制的瓦解。費雪說明過去英國的傳教以及帝國主義傳統，到十九世紀初，英國社會中形成兩股勢力在競爭：外顯的中產階級文化以及日漸茁壯的基督新教潛在文化。費雪比較了托馬斯·狄坤西、³²耶穌會教士和旅行作家對中國描述的差異，爲了對比基督教社會充滿光明與知識，傳教士總將中國社會描述成充滿貧苦與黑暗。費雪提到，郭士立的傳教活動反映中國社會藉由基督新教接觸到英國文化以及西方人後的轉變。當傳教士之間出現是否和商人、政府合作的意見之爭，郭士立在英國出版的作品卻爲鴉片戰爭的發動提出正當理由。在中國的傳教其實反映出英國看待傳教活動以及帝國支配權上的轉變，也反映出英國文化中成功建立了一個基督教霸權。本論文特別強調郭士立出版作品是導致鴉片戰爭原因之一，值得重新審視「傳教」與「政治活動」的關聯。本論文在第二章第二節裡，會提到郭士立三次的中國沿岸航行經驗，將細查郭士立在其航行日誌裡會如何呼籲英國應該以武力開放中國。第三章到第五章裡，對於郭士立筆下描述的中國印象，也會探討是否如同費雪所說「傳教士總將中國社會描述成充滿貧苦與黑暗」。

第二，鄧嗣禹(Ssu-Yu, Teng)〈西方人對中國歷史與文明的偏見〉³³一文中指出，過去三百年來西方人持續以不同角度審視中國歷史。有時將中國歷史視爲西方榜樣，有時又以中國歷史爲借鑑。西方人在看待中國歷史時會製造出一種偏見，而既然西方人多信仰基督教，這也可當作是「基督徒對於中國非基督徒」的偏見。基督教傳教士雖然對中國的教育、衛生以及現代化做出很多貢獻，但他們始終以一種宗教哲學的立場對待中國，更不用說有系統地去研究漢學，並重新審視那些描述中國的西方著作。本論文在第三章、第四章談到郭士立眼中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宗教時，將試著細查郭士立是否帶著「基督徒對於中國非基督徒」的偏見。

第三，張志惠《閱讀中國：〈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與新教傳教士關於中國的理解與書寫》³⁴一書，談到十九世紀前期新教傳教士的中國印象。張志惠所採取的研究史料是由馬禮遜在廣州所發行的第一份傳教刊物《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論文主軸問題是：傳教士如何利用《中國叢報》生產中國知識，以爭取西方讀者支持傳教事業？這些知識形塑西方讀者什麼樣的中西權力想像？而她的結論是：《中國叢報》爲了迎合讀者對中西自由貿易、自由互動期待的方式，達到結合讀者力量，實踐在華傳教使命，在《中國叢報》裡的中國知識是經由篩選傳佈西方，刻意塑造中國負面形象，以建立傳教正當性。而那些《中國叢報》的作者—傳教士，則掌握了「閱讀」、「書寫」、「傳播」的選擇權。本論文在第三章、第四章探討郭士立所敘述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

³²托馬斯·狄坤西(Thomas de Quincey, 1785 - 1859)，英國作家，著有《英國鴉片吸食者的告白》(Confessions of an English Opium-Eater, 1821.)

³³Ssu-Yu, Teng *The Predispositions of Westerners in Treating Chinese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In *Historian*, 19:3, May, 1957.)

³⁴張志惠，《閱讀中國：〈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與新教傳教士關於中國的理解與書寫》，台大歷史碩士論文，民國 95 年。

文化時，將重新審視郭士立的敘述是否如同張志惠所說「傳教士刻意塑造中國的負面形象」。

第三節、研究資料、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所採用的研究資料、研究方法與論文章節安排如下：

(一) 史料

本論文採用郭士立本人、基督新教傳教士和非傳教士之西方人所出版的刊物做為一手史料。郭士立著作多項，有：

1. 《三次中國沿岸航行日誌》(*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³⁵——本書由郭士立親自記錄下他在 1831 年到 1833 年間三度於中國沿岸航行的所見所聞。1831 年 6 月 3 日乘中國帆船順利號沿海南島、南澳、澄海入福建同安，再北上天津，11 月抵遼東，沿途施醫贈藥，派發傳教單，12 月 13 日返抵澳門，獲馬禮遜夫婦接待。第一次航行可說是郭士立為日後的「醫藥傳教」試溫。³⁶郭氏抵達澳門，時有東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勳爵號(The Lord Amherst)³⁷將起程北行，馬禮遜牧師即推薦他任隨船翻譯。1832 年自澳門出港，途經台灣、福州、廈門、上海等中國沿岸，最遠到達高麗，回程經過琉球，9 月 5 日再回到澳門。³⁸其時有汽精號(Sylph)擬到沿海口岸販賣鴉片，查頓(William Jardine)邀郭氏充當譯員，1832 年 10 月 20 日郭氏乘船再次北上，³⁹至 1833 年 4 月 29 日回到澳門。此書 1834 年於倫敦出版。

2. 《阿美士德號中國北方航行日誌》(*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st of China, in the Ship of Lord Amherst.*)⁴⁰——此書收錄郭士立第二次中國

³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 本文將以《三次中國沿岸航行日誌》為中文名稱。

³⁶ 此次旅途中，郭士立提到許多病人請求他幫忙介除鴉片，但他沒有說到是用何種藥物或方法來戒除，見《三次中國沿岸航行日誌》頁 132。

³⁷ 根據馬士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 第四、五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頁 343~345 其中提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在 1832 年 1 月 12 日給委員會以下的高級大班林賽(Lindsay)一個秘密訓令，要求他乘公司的武裝船克萊武號(Clive)出發，目的是“查明這個帝國可以漸次對不列顛商業開放最適宜的北方口岸有多遠，以及土著和當地政府對此事的好感度。”他準備了一定數量的英國產品以便察明可能的需求和能獲得的價錢。陪同他前往的有郭士立牧師。但作為樣品的貨物裝上克萊武號以後，該船長哈裡斯卻拒絕裝運，於是委員會在 2 月 1 日下令哈裡斯將船上貨物轉移到阿美士德號。

³⁸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 p.369.

³⁹ 前引書，頁 413。

⁴⁰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st of China, in the*

沿岸航行時船長林賽的日誌，並附上當時自己隨船所寫日誌，1834年在倫敦出版成書。由這些日記可得知林賽在福建、廈門、寧波行動。林賽也記錄了他在上海、高麗、琉球時貿易過程。郭士立日誌則是按照省份廣東、福建、浙江、江蘇、山東編寫。一行人在最後一站「琉球」時，盡力想與琉球人交往、買賣，但是由於琉球當地政府禁止居民與外國人做生意，且琉球本身屬於物產貧乏的地方，因此貿易不成功。雖然郭士立向琉球人解釋有些和歐洲人做生意的地區得到很多好處，但琉球受到中國傳統影響太深而不想改變他們的制度。郭士立在此發現到「中國在他的週邊國家中扮演一個很重要的角色。」⁴¹

3. 《中國歷史之古老與現代—回顧過去與中國的來往、貿易》(*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omprising a Retrospect of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with China.*)⁴²—郭士立說：「中國已日益引起西方各國對他的興趣和好奇心。藉由商業貿易，前人發現，中國人在藝術上的成就透露其擁有豐富資源，他們的品行、個性、知識都散發出光芒。迄今，中英之間因為政府設下藩籬，阻礙中英交流，致使中國一直對外國人存有錯誤或誇大的印象。…中國比起西方民主國家較少發生革命與內戰…希望藉著細讀此書，過去的錯誤印象可消除。中國人和外國人都能更正確且更全面地瞭解中國歷史和中西交流。希望從今以後，英國商人可以移除中國人接觸世界的障礙物，那麼中國的新紀元才會開始，中國在文明世界和基督教國家中才會佔有一席之地。」⁴³所謂「知己知彼，百戰百勝」，郭士立希望西方人閱讀此書後更瞭解中國歷史發展。書中前三章分別介紹中國的地理、政府及法律制度、工業、語言、宗教…等。第四章裡郭士立將中國歷史分為四部分—神話時期、古代、中古、現代。每一部分的帝王名字、在位年間，和英文名字翻譯都詳列出，顯現他不僅熟悉中文，對中國歷史發展也有深入瞭解，此章可說是中國歷代帝王中英文名字對照的工具書。五至十六章分別寫出中國夏朝到明朝的歷史，本研究欲從此書探討郭士立對中國歷史的觀點。

4. 《被開放的中國；中華帝國的地形、歷史、風俗、禮儀、藝術、製造品、貿易、文學、宗教、法學等》(*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⁴⁴—本書原有兩卷，現存為下卷，收錄第十四到第二十

Ship of Lord Amherst.(London : B. Fellowes , Ludgate Street ,1834.)

⁴¹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 of China, in the Ship of Lord Amherst.*(London : B. Fellowes , Ludgate Street .1834.),p295.文中郭士立提到，琉球受到中國傳統文化很深，因此不願意對外開放貿易。若非受到在琉球的中國官員阻撓，我們早就愉快地和到琉球的日本商人做生意。

⁴²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Ancient and Modern: Comprising a Retrospect of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with China.*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34.)

⁴³前引書，前言。原文：「...this vast empire,the government of which may be regarded as the beau ideal of despotism, has been torn by fewer revolutions and civil wars than the free states of the West;..」

⁴⁴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38.) 此書標提「China Opened」的「Opened」一字，字尾加了ed

一章，分篇記載郭士立調查的中國風土民情，包括：中國的工業、宗教、政府、官府、貴族、歲收、宗教儀式、軍事、罰則…等。本論文第三章、第四章裡，會詳細從此書中探討郭士立如何描述中國？他對中國的認識是否正確？他對中國的描述是否全然如同張志惠所言「傳教士刻意塑造中國負面形象」？

5. 《道光皇帝一生—北京皇宮記載中的晚清皇帝》(*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 with Memories of the Court of Peking.*)⁴⁵— 本書一共十七章，記載道光皇帝出生至死亡這段期間，中國朝廷所發生的大小事，也記錄了鴉片戰爭時清政府的反應。郭士立在此書裡說明「身為中國皇帝的無奈」，他在本書序言中寫道：「有野心的人也許會認為當中國皇帝擁有至高無上的尊嚴。除了那些為提升皇權而加諸皇帝身上的迷思外，皇帝在人們心中永遠存留某些形象—就像西方的亞歷山大和拿破崙給人們留下榮耀一樣。中國皇帝所說出來的話就是法律，他所有行為被當成模範，只要高興他可以任意更改旨意。所有生命都必須接受他的處置，他不需對監督機構負責，也不用聽命於貴族們。但是，雖然沒有任何人可以命令皇帝，皇帝卻必須遵守傳統，必須執行所有傳統的儀式。如果皇帝藐視傳統或企圖改變它，就會使自己身分地位受到損害。」⁴⁶「中國皇帝可以將自己的意願變成法律，但是他必須宣稱這是採納臣下的建議。」⁴⁷「中國皇帝所受限制有如此之多，一個普通的農民比他的統治者享有更多自由，以及更不受限的行動。」⁴⁸可見，郭士立在中國居住更久後，對中國皇帝的印象有所轉變，他認為皇帝所受的束縛並不少於他所享有的威權。由於此書是郭士立逝世後才出版，可代表郭士立逝世前對中國皇帝的認識。本論文在第三章第一節，討論郭士立眼中的中國皇帝時，將比較他在 1838 年出版以及 1852 年出版的書，查其對於中國皇帝的認識有什麼差別，並探討其間可能的原因。

6. 《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⁴⁹— 目前共有哈佛大學燕京社圖書館、英國圖書館、耶魯大學圖書館，和康乃爾大學圖書館收藏這份刊物，其中哈佛大學所藏版本較完整，共有三十九冊。此刊是 1833 年由郭士立所創，到 1834 年間的前十二期都由郭士立署筆名「愛漢者」編纂。1834 年到 1838 年間的後二十七期遷到新加坡由中國益智會編纂。⁵⁰本論文所用版本，是由黃時鑑先生與北京中華書局

可能有兩個意思：代表被動式「被開放」，或者過去式「已開放」。郭士立寫此書時，中國仍處於閉關自守時期，而閉關自守結束是由於西力入侵所導致，有「被動開放」的涵義。故本論文採取「被開放」的意思，將此書翻譯為「被開放的中國」。

⁴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 with Memorie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52.)

⁴⁶前引書，頁 3。

⁴⁷前引書，頁 4。

⁴⁸前引書，頁 6。

⁴⁹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⁵⁰《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導言第十二頁中提到：「中國益智會一八三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成立於廣州，是由一些廣州外僑組成，郭士立本人是該會的積極會員。他被選為該會的中文秘書。根據一八三七年該會在廣州美國商會會議決定，由該會代辦在新加坡再版原由郭士立編纂的十二期《東西洋考》。」

合作影印原件，加上總目、導言、索引後出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創辦宗旨是：「鑒於中國人仍然妄自尊大，故步自封，視異族為「蠻夷」，需要謹慎巧妙地展示西方的文明，使中國人認識到洋人不是「蠻夷」，並且知有不足，願向西方學習，俾以維護在華洋人的利益，發展他們與中國人的交往。」⁵¹可見郭士立欲在此刊中藉由大量介紹西方文明達到傳教目的，也希望扭轉中國人視西方人為「蠻夷」的觀念。郭士立在此刊物中大量運用儒家思想、孔子學說來解釋西方各項觀念，此方法頗類似於明末利瑪竇的借儒傳教方式。值得注意的是，編者黃時鑑在導言中有兩個錯誤之處：第一，指出郭士立在一八三二年中國沿岸航行是「為英國阿美士德使團的譯員和外科醫生。」⁵²實際上，阿美士德使團是在嘉慶二十一年(1816)訪華，此處誤將東印度公司商船阿美士德號認做為阿美士德使團；第二，指出郭士立在行文中「往往極力加入天主教的觀念。」⁵³而郭士立是當時日爾曼基督新教傳教士代表，與「天主教」傳教士並不相同。

7. 各式傳教手冊— 澳洲國家圖書館(National Library of Australia)中，收藏有郭士立在中國傳教時親手編寫聖書的微縮資料，例如：《救世主耶穌基督行要列傳》、⁵⁴《正道之傳》、⁵⁵《耶穌神蹟之傳》、⁵⁶《耶穌降世傳》、⁵⁷《正教安慰》⁵⁸。這些由郭士立親自編寫的傳道小冊，除了書寫新約聖經內容外，也論及中國人應更正看待外國人之謬誤—「因到各國願以朋友樣待兄輩。雖然，自遠方來，遠客已明知中國民人，懷禮儀的心，視普天下之人如兄弟也。據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弟欲意與君子等，隨便往來，論義講德彼此有益。但只可恨多人懷疑，誠恐與遠客交接，甚害於心。故此必勸四方君子，親眼看外國人如何，或善或惡，或智或蠢。照高見定意，終不可憚加意省察。」⁵⁹本論文在第五章第三節討論郭士立認為中國人應該應該改宗，會參考這些傳教小冊內容，看郭士立如何告訴中國人應接受基督教的救贖。

除了郭士立本人作品外，本論文也將略為參照同時期來華傳教士的中國印象。使用史料有：《衛三畏生平及書信——一位美國傳教士心路歷程》⁶⁰— 衛三畏 1812 年出生於紐約，1832 年被美部會(美國對外傳教機構)任命為廣州傳教站的印刷工。衛三畏 1833 年 6 月起程前往中國並在 10 月抵達廣州。他在中國待了 44 年(1833~1877)，主要工作是編輯和印刷《中國叢報》。曾經隨美國艦隊遠征日本、擔任翻譯，也曾經參與訂定《中美天津條約》。1877 年回美國後受聘為耶魯大學

⁵¹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2。

⁵²前引書，頁 10。

⁵³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13 中提到：「但是，郭士立畢竟是一位牧師，傳教是他畢生的主要事業。因此，他編纂《東西洋考》，儘管展示了西方文明包括了各方面的內容，然而不管是哪一方面，行文之間，往往極力加入天主教的觀念。」

⁵⁴此書出版地不明，僅在封面寫有「道光甲午年(1834)出版」。

⁵⁵新加坡堅夏書院出版，道光丙申(1836)。

⁵⁶同 54。

⁵⁷同 54。

⁵⁸同 54。

⁵⁹同 54，頁 70。

⁶⁰衛斐列著，顧鈞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第一位中國語言與文學教授。此書是由衛三畏兒子衛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執筆介紹父親，書中收錄許多衛三畏書信，配合衛三畏所寫的《中國總論》，⁶¹可更加瞭解早期來華基督信教傳教士對中國的認識。另一位美國傳教士丁韋良 1850 年到 1916 年間在中國傳教，他的書信收錄在《花甲記憶——一位美國傳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國》中，⁶²可由其書信探討在馬禮遜、郭士立，尤其是鴉片戰爭結束後，傳教士在中國身分地位上的轉變。

傳教士們希望基督教能解救中國人封閉的心靈，而「非傳教士」西方人除去宗教因素後，會用什麼眼光看待中國文明，亦是本論文欲比較之處。透過分析非傳教士者的中國印象，來突顯傳教士中國觀感的意義為何。當時來華的美籍商人亨特(William C. Hunter)在中國生活長達四十年時間，曾加入美商旗昌洋行，後又自己開設亨特洋行。他的兩本著作《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廣州「番鬼」錄》(*The Fankwae at Canton*)皆已翻譯成中文出版，⁶³透過這兩本著作，可更瞭解十九世紀前期廣州外商的生活樣貌，以及外商的中國觀感。作為中國閉關自守時期唯一對外開放之門——廣州，在鴉片戰爭前後有什麼轉變也可從書中探知。

(二) 研究方法與章節安排

本論文在第一章裡談及研究動機與目的、回顧前人所做相關研究，和本論文所採取的史料與研究方法。第二章主要介紹郭士立生平經歷，分為四小節。第一節中介紹郭士立在 1803 到 1831 年間的人生經歷，包含身家背景、幼年受教經驗、他如何發展出對傳教事業的熱情、他受到何種傳教機構任命到亞洲傳教，他為何會想到中國傳教。第二節中，要談到郭士立抵達中國，真正開啓他在中國的親身經歷是 1831 年。1831 到 1833 年間他在中國沿岸所做的頭三次航行，讓他親眼見到中國風土民情。第三節則寫 1833 年至 1844 年間，郭士立擔任過不同職位、扮演不同角色。例如：郭士立曾隨著馬禮遜牧師將日本水手送返日本；鴉片戰爭期間，他擔任英軍翻譯，甚至擔任定海知縣；1843 年擔任香港撫華道；他的身分可說是相當多元。第四節寫 1844 到 1851 年間，郭士立投注全付心力在組織「福漢會」上，希望訓練中國人自己傳道，使福音能傳佈更廣。

第三章到第五章，主要研究郭士立的著作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討論郭士立眼中的中國政治經濟和社會文化。這部書在 1838 年出版於倫敦，可說是首次由西方傳教士對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有全面性的描述。第三章第一節，要談到在此書中，郭士立介紹了中國的皇帝制度、官府機構、宮廷祭典…等，特色是圍繞著「皇帝」為中心作安排。在本書裡，郭士立所敘述的皇帝有著至高權力，他擁有許多財產，可

⁶¹ 衛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⁶² 丁韋良，《花甲記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4。

⁶³ 本論文參考亨特兩本作品的中譯本，分別是馮樹鐵譯：《阿兜仔在廣州》(*The Fankwae at Canton*)，臺北：五南，2010。以及沈正邦譯，章文欽校訂：《舊中國雜記》(*Bits of Old China*)，臺北：五南，2003。

以任意使用國庫，看似中國的政治運作圍繞皇帝而運轉。第二節中，要討論此書中郭士立如何描述中國經濟。他談到中國內陸貿易相當發達，尤其是藉由自然河川與運河，使各地商品互相流通。⁶⁴中國商人爲了賺錢總是非常積極工作、願意深入險境作生意，而且渴望與外國人做生意。⁶⁵而中國商人之所以無法對外國人作生意，是因爲受到中國政府的阻撓，這反而加強走私現象。⁶⁶他並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利用連載故事、引用孔子孟子言論，來證明開放貿易爲時勢所趨。⁶⁷

第四章第一節，仍探討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n the Chinese Empire*. 書中如何描述中國的社會，主要探討兩個議題：郭士立筆下的中國女性以及中國百姓的特色。第二節裡，要討論郭士立如何敘述中國科技、教育、藝術…等。而身爲傳教士的郭士立，到中國的目的是爲了傳佈福音，他如何描述中國宗教是必須探討的。因此，在五章第一節中，討論郭士立筆下的中國佛教與道教。郭士立瞭解中國大多數信仰佛教、道教，他也特別針對佛教、道教作出批判，指此兩種是「錯誤的宗教」，造成中國人長久以來盲目地生活，急需上帝的救贖。⁶⁸不過，郭士立對中國道教、佛教的認知有許多錯誤，可說他對中國道教、佛教的理解相當粗略。第二節裡，要探討郭士立如何描述中國的天主教、基督教。郭士立在本章裡強調中國人應該改宗，他也對令中國人改宗充滿信心。

本論文在談到郭士立眼中的中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宗教時，都會一併加入同時期傳教士以及非傳教士對相同議題的說法，討論郭士立與其他傳教士、非傳教士對中國印象是否有所出入，並推敲其間的差異與關聯性。

十九世紀前期基督新教傳教士初抵中國，身負傳播福音的重任。他們希望有更多西方支持者一起投入「傳教」這項艱困工作。傳教士瞭解，必須藉由著作讓西方人更瞭解中國，才能激發更多西方人對中國產生興趣，進一步支持傳教士的工作。傳教士如何理解中國、會用什麼樣的口吻介紹中國、這些書寫是否有盲點？是本論文的研究主軸。郭士立 1831 年抵達中國，時間上僅稍晚於馬禮遜、裨治文、雅裨禮，排名第四。⁶⁹他多樣的語言能力使他在中西接觸時扮演多種不同角色。而郭士立對中國的觀察、研究著作比這三位傳教士更多，是基督新教傳教士

⁶⁴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29-30.

⁶⁵前引書，頁 43-44。

⁶⁶前引書，頁 51。

⁶⁷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頁 314、331。

⁶⁸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227.

⁶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 1782-1834)是 1807 年到中國，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 1801-1861)、雅裨禮(David Abeel, 1804-1846)是 1830 年到中國，而郭士立是 1831 年到中國。

裡，第一位寫下對中國全面性介紹的著作者。有關郭士立的爭議，過去已有魯珍晰、蘇精等人詳細探討，⁷⁰而郭士立與鴉片戰爭之間的關聯，費雪也已提出他的見解，故本論文無意再針對此類議題做研究。本論文關注的主軸是「郭士立在他的著作中如何描述中國」，藉由還原郭士立筆下的中國、討論他的中國印象，評估郭士立身處時代背景與其中國印象之間的關聯性。

⁷⁰ 有關郭士立的爭議，見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其中第二章〈郭實臘與其他傳教士的緊張關係〉一文，詳細介紹郭士立在中國傳教時所受到當時歐洲傳教人士的質疑與批評，以及有關福漢會之爭議。

第二章 郭士立生平經歷

本章分為四小節，第一節敘述郭士立幼年成長、求學經歷以及他抵達印度、泰國、緬甸等地傳教過程，並探討郭士立求學時期受到什麼啟發以致立志傳教？他受到當時歐洲哪些傳教機構資助才能前往亞洲？第二節介紹 1831 年到 1833 年間郭士立在中國頭三次的沿岸航行經歷。第三節介紹 1833 年到 1844 年間郭士立扮演不同角色、擔任過不同職位，可說是身負重任。第四節裡介紹 1844 年到 1851 年間郭士立創設福漢會，使他的傳教事業有更進一步發展，但也遭受當時西方教會質疑。郭士立到中國前的活動，目前缺乏中文史料，所以第一節中，有關郭士立到中國前的行動，多引用自美國羅格斯大學榮譽退休教授 Jessie Gregory Lutz 的作品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Lutz 得到倫敦大學友人蓋瑞·泰德門等友人幫忙蒐集翻譯德文手稿，⁷¹她對郭士立到亞洲前的活動描述較完整。希望在瞭解郭士立一生作為後，有助於其後詳細探討他的著作內容。

第一節 成長、求學、抵達亞洲(1803~1831)

郭士立 1803 年出生於普魯士波美拉尼亞省的比列茲鎮(Pyritz)，⁷²父親約翰·雅各·郭士立(Johann Jacob Gützlaff)是當地有名的一位裁縫師。他母親瑪莉亞·伊麗莎白·班克(Maria Elisabeth Behncke)在 1807 年去世。母親去世後一年，父親就娶了一位寡婦卡羅麗娜·露易莎·奧克特·叔茲(Carolina Louisa Ockert Schultz)。郭士立曾提到，母親之死帶給他極度憂傷和孤單：

在我十五歲時，我有了一個長達八年時間對我非常不好的後母。這段時間對我而言只是痛苦的痕跡，我原先樂觀的個性因而轉為陰暗與憂鬱。⁷³郭士立對於父親的再婚並不認同，慶幸地是，郭士立其中一位繼姊給他溫暖的關懷並教他讀書識字，使郭士立感受到母愛。八歲時，父親將郭士立送去比列茲鎮的一所學校，從 1811 年到 1816 年他都在這所學校裡，學習拉丁文、歷史學、數學…等學科，他日後的語言能力可說在此打下基礎。郭士立日後回憶在此間學校裡雖然可學習各種知識，但是唯獨在「宗教」部分卻無所進展，校長每在談及宗

⁷¹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前言。

⁷² 比列茲鎮在九世紀已有口聚集，十二世紀時屬於波美拉尼亞公爵管轄地。比列茲鎮在 1524 年成為波美拉尼亞省第一個接受路德新教派的地區。1871 年日爾曼地區統一後屬於德國統治，在二戰結束後由蘇聯紅軍接收，目前屬於波蘭領土，波蘭文是：Pyrzyce。

⁷³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18.

教議題時，總是使用很多含糊不清的字眼而無法讓人理解。當時他遇到兩位當地傳教士與他討論教義，使他開始成為一位懂得自由思考的人。⁷⁴傳教士教導郭士立如何藉由禱告與上帝直接溝通，郭士立也因為學會禱告、懺悔，瞭解到必須維持住自己的良好品德，以對上帝的誓詞負責。

1816年7月7日郭士立完成路德教派的堅信禮後，⁷⁵本來可以繼續接受教育，但他父親卻把他送到斯德丁(Stettin)省府學習工藝，準備當一個工匠，因而在他十三歲那年中斷了基礎教育。郭士立雖然接受工藝訓練，但他仍持續閱讀從比列茲鎮帶來一些書。在斯德丁居住時，郭士立認識一位牧師遺孀海頓麗琪(Heydenreich)和其兒子，並成為朋友。他們一起讀詩，討論日爾曼名著。郭士立的兄弟曾提及，在斯德丁那幾年，郭士立善用時間讀書，每晚十點完成學徒工作後，使用他自己買的檯燈，閱讀從海頓麗琪那裡借來的書直到深夜。⁷⁶早在郭士立於比列茲鎮念書時，他就對老師在地理課中提到傳教士到哪些地點傳教有興趣。他在斯德丁認識一位批發商人，從批發商人手中得到巴色會期刊，⁷⁷藉由閱讀期刊上的傳教議題並與批發商人討論，郭士立漸漸產生對傳教的好奇，產生「當傳教士」的想法。此時郭士立的決定是出於他的冒險精神更甚於宗教動機，但是他缺乏一筆資金，其父親和老師無法資助他，因此他的傳教計畫並未成功。

郭士立與海頓麗琪在彼此切磋閱讀時，某日得知威廉三世要到斯德丁，海頓麗琪提議做詩獻給國王以歡迎他到來。海頓麗琪親手獻給國王，但是他們擔心受到懲處而躲進城市，威廉三世連續派了三個使者才將他們找進宮中。國王接見郭士立和海頓麗琪，決定幫助他們受教育。海頓麗琪過去在中學已讀到最後一年，因此只要完成拉丁學校學業，畢業後就可以進入大學。但是郭士立的教育銜接卻出現問題，他在十三歲時就因為要受工匠訓練而離開拉丁學校，不具備進入大學的資格。威廉三世決定測驗郭士立是否具備進大學該有程度，郭士立輕鬆地通過測驗後，國王將他送到哈雷區(Halle)的孤兒院居住，要求必須在那裏完成學業。

78

1821年郭士立完成學業並等待威廉三世後續安排時，國王接到雷尼厄斯(Rhenius)來信敘述他在印度的工作，並向國王介紹柏林的傑尼克(Janicke)傳教協會。此協會是1800年由席爾汀(Schirnding)所創，專門訓練新教傳教士並送他們出去傳教。此協會在創立後的20年當中提供了英國、荷蘭傳教組織許多工作人

⁷⁴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19.

⁷⁵ 基督教認為嬰兒受洗時並未明白基督徒的使命，因此在長大後，須另外舉行堅信禮，作為完全加入教會，為基督宣揚福音的象徵。

⁷⁶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20.

⁷⁷ 巴色會(*Basel Mission*)，基督教新教差會，1815年成立於瑞士北部德語區的巴塞爾市(Basel，現其總部會址)，原稱德國差會(German Missionary Society)，後改名為巴色會。1847年開始向中國派遣傳教士，主要在廣東省。

⁷⁸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22.

員。雷尼厄斯建議國王贊助柏林傳教協會以使它擴大規模，國王同意了，並指派郭士立到傑尼克協會念書，提供他每年五百元獎學金。⁷⁹根據郭士立在柏林時的室友所述，1821年郭士立到傑尼克協會報到時，牧師曾問他畢業後想做什麼？郭士立回答：「一個有口才的牧師。」⁸⁰牧師說這樣有野心的個性並不適合協會。雖然這個室友比郭士立晚幾個星期才到此協會，他的記載不見得是真實的，可是這種說法卻可以反映出郭士立對冒險、成為英雄、將福音帶給野蠻人的渴望。

傑尼克協會非常關心郭士立的精神狀況，他們安排一位剛從古典預備學校畢業者—理查(Reichardt)同住。理查和郭士立都非常好學，兩人時常共同討論課業到深夜。郭士立在學校裡成為一位風雲人物，同學們讚嘆他的勤奮和做學問能力，但卻批評他太驕傲、自負，缺乏傳道者該有的謙卑精神。1821年7月某日晚上，理查和郭士立提到，教育之目的應是為他人而活，並不是為了追求自己更高的地位，理查提醒他：

如果打算成為一位傳教士，應該先使自己遵守上帝的旨意，體驗福音的精神。應先讓自己體驗到欲向他人傳達的內容，否則不算真正愛戴救世主，也不算侍奉上帝。⁸¹

郭士立在聽完此話後陷入沉默，心中不太舒服。那晚他躺在床上反覆難眠，理查關心他時，郭士立告訴理查他迷失了方向，甚至失控大叫自己被撒旦控制。在理查持續開導郭士立並帶領他念聖經、祈禱後，他漸漸平復情緒，接受了理查的說法。隔日，理查原本擔心徹夜長談對郭士立是否操之過急，出乎意外的是，理查第一次看到郭士立跪在床邊發自內心地祈禱。從那晚以後，郭士立彷彿變了一個人，學校同學、師長看到他的轉變都非常驚喜，這可以說是郭士立人生中的一次重生。郭士立此後仍然對課業充滿熱情，勤奮向學，不同的是，他不再視教育為博取自己名聲的途徑，而是將受教育當成服務神的方法。由於將來想到外地傳教，又由友人處獲贈寫有中國資訊的刊物，引起郭士立對中國的好奇，他開始蒐集有關中國的資訊。

在郭士立的靈魂中，充滿「企圖心」和「熱情」這兩項特質，他很快就感到柏林傳教協會的課程無法滿足旺盛的求知慾。1822年，郭士立開始跟哈雷大學(University of Halle)語言學教授奧古斯都·涂洛克(August Tholuck)學習波斯語、英語、荷蘭語，以及古典語文。傑尼克傳教協會與普魯士聖經信仰組織(Prussian Central Bible Society)合作成立了柏林基督教刊物出版協會(Berlin Central Society for Christian Edifying Writings)，傑尼克學校的畢業生有些會進入此機構從事翻譯工作。郭士立被允許可閱覽出版協會裡的刊物，他樂於為自己補充知識。魯珍晞教授的研究指出，郭士立在柏林傳教協會時，將自己塑造成冷漠、驕傲的形象，課業成就雖然遠遠超越同學，但他與同儕團體卻格格不入，這與他幼年經驗有關。郭士立與繼母相處的那段日子深感自己不像其他兄弟受到重視，總感到自己是家

⁷⁹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22.

⁸⁰前引書，頁 23。

⁸¹前引書，頁 24。

庭生活的局外人，因此形成他孤傲的個性。另外，郭士立異於常人的表現，其實也和當時普魯士正處於「浪漫主義」與「基督新教」之間的衝突有關。基督新教和浪漫主義都探討到個體的心智和靈魂，不同的是，基督新教認為不該鼓勵個人主義，個人應融入團體當中，不該自私自利也不可崇拜英雄，因為英雄通常出現在戰爭中。相反地，浪漫主義卻是欣賞具有野心、勇氣的英雄。⁸²十九世紀的日爾曼知識分子可以說一直處於上述兩者衝突中，郭士立就是典型代表。郭士立將自己當作上帝傑出的工具，他不僅想改變中國人的信仰，也想改變全東亞的信仰，這表示郭士立雖然身為一個新教傳教士，他卻具有浪漫主義式的野心。

1823 年時，傑尼克傳教協會幫助郭士立取得柏林大學的入學資格，以預備將來擔任柏林傳教協會的教師。本來郭士立應該準備一個資格考來取代他未取得的中學畢業證書，假設他能通過資格考，就可以在 1823 年復活節成為正式的大學生。但是，郭士立此時突然生了一場重病而無法通過測驗。傑尼克傳教協會因此與鹿特丹的荷蘭傳教協會(Dutch Missionary Society)取得聯繫，經過國王允許後，將郭士立送至荷蘭傳教協會。郭士立非常高興，他並不想將一輩子都在柏林傳教協會教書，去遠方學習更吸引著他。1823 年 6 月郭士立到鹿特丹的荷蘭傳教協會中學開始念三年書，郭士立想到將來有可能會隨著荷蘭商人的貿易路線傳教，便開始學習馬來文，同時他英文和荷蘭文也大有進步。

十九世紀初期荷蘭傳教士在印尼的傳教充滿著挑戰，因為當地時常發生戰爭，小島太多，具有許多不同的地方信仰，各地方言也不一樣。當地官員也不太歡迎傳教士進入，擔心會帶來更多紛爭。新教傳教士在印尼地區也面臨與伊斯蘭教和天主教的競爭，因此在印尼的拓展並不順利。荷蘭傳教協會不斷地尋找突破傳教瓶頸的方法，而郭士立認為，應該要訓練當地人成為傳教士才能迅速拓展傳教版圖。郭士立在鹿特丹第一年就寫信給雷尼厄斯表達想去遠東工作的想法，不久他結識一位想轉信基督新教的希臘東正教牧師，也許是受到這位牧師和希臘戰爭中浪漫英雄主義的影響，郭士立在 1824 年春天到巴黎學習阿拉伯和土耳其語文，在巴黎認識一些法國新教牧師。此時，荷蘭傳教協會與羅伯特·馬禮遜(Robert Morrison)有所接觸，也預告即將來臨的新契機。

1825 年 10 月，荷蘭傳道協會將郭士立送至倫敦傳教協會，討論在遠東地區的傳教合作，他們考慮將郭士立送到麻六甲的安格魯中文大學以準備在東印度地區籌設傳教機構。在倫敦時，郭士立結識了馬禮遜(Robert Morrison)和其他英國新教傳教士。馬禮遜將他蒐集的一萬多本中國書籍、華英和英華字典聖經翻譯帶回英國。1824 到 1826 年間馬禮遜設立一個原住民語協會，並將所有中文書籍捐贈該協會，郭士立也認識此協會中馬禮遜的學生們，後來成為郭士立首任妻子的尼威爾(Newell)就是此機構的學生。瑪莉·安·艾迪綏(Mary Ann Aldersey)從此機構畢業後到中國傳教，成為第一位中國女新教傳教士。⁸³郭士立在荷蘭的三年中，

⁸²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30.

⁸³ Mary Ann Aldersey (1797 ~ 1868) 師從馬禮遜學習中文，是中國第一位女新教傳教士。1837 年

積極尋找一些傳教助手，跟他接觸過的人也總是會對郭士立留下深刻印象。郭士立也為荷蘭傳教協會寫教會歷史，1826 年 9 月離開荷蘭前往印度時曾經交給荷蘭出版商一份手稿，這份手稿在 1828 年出版，書名是「自教會建立到現今的基督教傳播史；附註傳教士和傳教組織。」(*History of the Expansion of God's Kingdom on Earth since the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Church until the Present Time with Particular Reference to Missionaries and Mission Societies*)這本書寫到基督教初創時的歷史、基督教在歐洲的傳布、基督教在亞洲的傳教活動…等，最後一章寫到倫敦傳教協會在東印度地區、新加坡、中國、馬來西亞的傳教，以及馬禮遜個人的貢獻。此書出版的目的是希望荷蘭政府可以支援協會在東方的傳教工作，也希望有更多新血可以加入傳教行列。⁸⁴

當郭士立完成他在荷蘭傳教協會的課業後，原本即將被指派去蘇門答臘工作，但在他離開前，荷蘭傳教協會突然接到普魯士教育部提供給郭士立兩百元的傳教資金。普魯士國王幫了郭士立一個大忙，1826 年 9 月 11 日，郭士立啟程前往東印度，四個月後抵達加爾各答，開始他在東亞長達 20 多年的傳教工作。原先荷蘭傳教協會是指派郭士立到印尼的蘇門答臘北部，和另一位畢業生溫廷克(H. Wentink)傳教，但當地發生戰爭，使郭士立在 1826 年 11 月 7 日轉往加爾各答，此後四個月時間都與麥都思⁸⁵共同傳教。麥都思傳教時善用技巧吸引聽眾，引導他們閱讀傳教小冊，討論當中的議題。有時他會唱詩歌吸引聽眾，有時會引用儒家道德觀來比附基督教教義，告訴聽眾所有人都該避免犯罪，只有神會幫助人們抵抗惡魔的誘惑。郭士立希望可以像麥都思一樣具備優越的語言能力，他開始和一位來自福建的家教學習中文、利用方言交談，此後陸續學會閩南語、廣東話、客家語、馬來語、一點泰文和日文，也學會中國文言文。可以說，郭士立深受到馬禮遜和麥都思兩位傳教士的影響。

郭士立抵達加爾各答後，立刻呼籲歐洲給予更多傳教支援。1827 年 4 月時，郭士立獲得從荷蘭傳教協會分支機構—巴達維亞傳教組織允許，調動到多數由中國人口組成的新加坡。還沒等到荷蘭鹿特丹方面的正式命令，他就隻身前往新加坡，他也向荷蘭傳教協會要求給予一艘船以便駛往泰國和越南傳教，為將來進入中國傳教做準備。同時，溫廷克也來到新加坡檳城，他們兩人覺得，將來郭士立應全心投入中國傳教，而溫廷克則負責馬來西亞的工作。郭士立認為，待在檳城這個小島會限制他的活動，在 1827 年 8 月份他寫道：

她在雅加達設立一所女子學校，到 1843 年開港後，將此所學校移到浙江寧波。

⁸⁴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34.

⁸⁵ 麥都思(Walter Henry Medhurst, 1796~1857)英國倫敦傳教協會牧師，1817 年 6 月抵達麻六甲，接替英國倫敦協會傳教士米憐負責在麻六甲的印刷廠工作，開始學習中文，1819 年被按立成為牧師。1842 年以前他主要是在南洋傳教，往來於雅加達、新加坡、婆羅洲和馬來半島等地，散佈傳教宣傳單和小冊子。創辦中文月刊《天下新聞》、孤兒院。1843 年後到上海居住，主要從事聖經翻譯。1848 年因擅離上海租界，違反《中英五口通商章程》而引發「青浦教案」，1854 年擔任英國駐華公使包令(Sir John Bowring)的翻譯員，到南京瞭解太平天國狀況，1857 年返回倫敦時去世。

主啊！送我到祢希望我去的地方，若祢要令我待在檳城這裡，會壓抑我的心。只要在經過五到八天時間航行，我就可以到中國向數億人傳教。上帝賜給我一張能說流利中文的嘴巴，我將它視為上帝的禮物…過去已有許多傳教士寫下基督教作品，我們應該持續完成這項工作…⁸⁶

在檳城這裡，郭士立發現，中國人區分為一百多個家族世系，每一個家族都有自己的姓氏，既然未來打算進入中國工作，郭士立入籍福建同安郭氏宗祠，為自己取名為「郭實臘」，⁸⁷郭士立因為擁有這個中文姓名，進入到中國社會裡的人際網路，他在向中國人作自我介紹時也都使用此名稱。

1828年六月在未得到荷蘭傳教協會允許下，郭士立打算前往泰國(暹羅)和越南(交趾支那)。這次行程是由郭士立、麥都思，和一位倫敦傳教協會牧師雅各·湯姆林(Jacob Tomlin)發起，帶了三位中國助手幫忙搬運藥材、聖經、傳教小冊…等。八月份起程時，麥都思因為遲到沒跟上，而湯姆林隔年五月染病回到新加坡，郭士立獨自一人在泰國工作了三年，遊歷了越南、麻六甲、新加坡各地，並與隨著季風來到南亞地區做生意的中國商人接觸，為他日後的獨立傳教工作打下基礎。由於荷蘭傳教協會拒絕送郭士立去中國傳教，郭士立自此脫離荷蘭傳教協會。1828到1831這三年間，郭士立在南亞地區與其他傳教士一起工作，雖然有人在當地染疾而逝世，但也陸續有人加入傳教行列。此階段，新加坡傳教協會提供郭士立許多傳道小冊，倫敦傳教協會也提供許多藥品。十九世紀前期在南洋地區居住的中國人大概可以區分為三種類型：早期移民，已娶當南洋當地女生為妻者；近年來移民到南洋地區的商人、勞工，希望在南洋地區多賺錢寄回中國老家養活家人者；以及依賴雨季、季風，從中國福建廣東沿海乘戎客船南下，到南洋地區買賣者。後者尤為南洋地區與中國貿易的主力，他們春天隨著季風帶來中國商品，夏天再隨季風帶著米、鹽、象牙、顏料…回中國。郭士立傳教時常與這些中國商人接觸，對中國豐富的歷史和文化更加瞭解，他甚至將中國聖賢比喻成希臘哲學家一樣優越，只是因為不信基督教而略帶缺陷。所有中國事務都令郭士立著迷，從他的作品裡可發現對中國的描述包羅萬象。雖然郭士立很喜歡中國人，但是他對中國的描述仍是黑暗大過光明，比如：中國的教育體制雖好卻缺乏對基督的依賴。他覺得中國傳統節慶在祭拜時焚燒香菸和祭拜供品、佛教徒念經、轉動佛珠等，都很像天主教的朝拜儀式，而對十九世紀的基督新教徒來說，羅馬天主教並非正統的基督教。郭士立曾有一次抓住神像丟出窗外以證明中國人心中的神明並不具神力。⁸⁸

在南洋傳教時，郭士立已開始使用學自麥都思的傳教方法—帶著民眾祈禱、解說聖經和傳教小冊，要求同伴必須學習當地方言才能有效地快速傳教。郭士立也會帶領大家唱出聖歌。湯姆林描述到有次在泰國旅程當中，船上一行人念完詩

⁸⁶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41.

⁸⁷ 譯作「Guo Shilie」或「Guo Shila」。

⁸⁸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44.

篇後，郭士立突然起身用強烈的情感唱出詩篇，令所有人都感動跪下向神祈禱。郭士立也細微地觀察到，比起其他亞洲人，中國佛教徒更能接受基督教的某些價值觀，這可能跟中國宗教具備寬容特質有關，但是，傳教過程中沒發生激烈衝突卻不代表中國人會直接改信基督教。在貿易季節裡，郭士立和湯姆林會將聖經與傳教手冊發給戎克船上的中國人，希望他們至少能將書帶回家並傳達基督教文學，這種作法的確有收到一點效果。郭士立在南洋時已運用醫藥傳教方法，他會將奎寧發給民眾以治療瘧疾、拿油膏治療眼疾和皮膚病，也會執行小手術、教導當地人如何用催吐方法治療鴉片上癮症。郭士立發現，醫療傳教是吸引信徒非常有效的途徑。

十九世紀前期，泰國對英國在亞洲地區的擴張有所警覺。當郭士立在南洋地區傳教時，一度被指控為英國政府欲奪取泰國的間諜。傳教士們的一些著作被泰國當局沒收，甚至被指控走私鴉片，郭士立在 1829 年秋天離開泰國前往麻六甲，他到倫敦傳教協會在麻六甲所設立的英華書院(Anglo-Chinese College)。在英華書院工作時，郭士立與第一位被倫敦傳教協會派至亞洲工作的女子瑪麗·尼威爾(Mary Newell)結婚。瑪麗·尼威爾已在麻六甲學習中文、馬來語，並設立五所女子學校。婚後不久兩人便到曼谷一起從事翻譯。瑪麗·尼威爾開始編寫華英、英華字典，郭士立和湯姆林則一起將新約翻譯成泰文，結婚並未減低郭士立的宗教熱情，他計畫和妻子一起沿中國沿岸航行。但由於妻子懷孕，郭士立改為和湯姆林同行時，又因為二人都染病而耽擱。1831 年 2 月，瑪麗·尼威爾在生雙胞胎時難產而死，其中一個孩子也夭折。郭士立將這個噩耗當作神的旨意，他認為神要他在暹羅地區所做的工作已結束，接下來神要引導他進入中國。他將女兒安置妥當後，開始尋找前往中國的通道，1831 年他登船前往天津。

第二節 中國沿岸航行(1831~1833)

(一)第一次航行：1831 年 6 月 3 日到 1831 年 12 月 13 日

1831 年 6 月 3 日郭士立隨著船長信雄(Sin-shun)乘中國帆船順利號(Shunle)由海南島出發，目的地是天津。這艘船重 2500 噸，在暹羅建造後申請到廣東的許可證，載有木頭、糖、胡椒，和印花棉布，船上雇有五十位水手。許多船員都吸食鴉片，郭士立描述：

我們的船長信雄是個友善的人，擅長駕馭船隻，但不幸地是他也有鴉片癮。船長的助手雖然是麻煩人物，不過在航海技術上倒是比其他船員細心。這位助手也吸鴉片，時常在工作中吸食鴉片陷入昏睡。船上所有乘員都會互相分享鴉片這個奢侈品。⁸⁹

⁸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70.

郭士立身旁友人在知曉他妻子去世後給予溫暖的安慰，在日誌中郭士立寫道：

人們友善地對待我，替我失去妻子感到遺憾，他們有些人曾看過我妻子，都試圖減低我的難過。我可憐的同胞，雖然他們總是缺乏糧食、鹽巴、蔬菜…但他們仍能保持愉悅來安慰我。⁹⁰

6月14日，有些暹羅人登船，告知郭士立女兒的死訊，帶給郭士立極大悲傷，他在自己的艙房中渡過幾天，收拾好憂傷情緒後，他繼續投入為神工作。他觀察到中國船員吸食鴉片情形，也寫到自己開始勸戒他們不要吸食鴉片：

當這些人放下他們的鴉片煙管，總會講出很淫穢粗俗的話語，我總是耐心地告誡他們、勸告他們，再接受他們對我的道歉。⁹¹

再次啓航後，6月19日來到寇克蘭島(Ko-Kram)，過去這裡是海盜集散地，建有一座廟，廟裡放著佛陀睡臥像。郭士立寫出他對於供奉偶像的批評：

附近的中國船家會拿一些醃過的豬肉、雞肉、鴨肉來供奉這個懶惰的偶像…我對這個現象嗤之以鼻。⁹²

7月4日來到崑崙島(Kwun-lun)，這個島上有從越南來的漁夫，停泊在此的船隻載滿果醬要前去天津。此時郭士立正受病痛折磨，但病痛中他仍不忘傳教重任：

雖然我正受病痛之苦，但我在堅強的信念中得到安慰，無論會遇到什麼阻礙，神的福音絕對可以進入到中國。⁹³

7月10日到海南，郭士立評論此地食物，寫到中國人不瞭解西方飲食情況：這裡缺乏美味的食物，實在是非常可憐。居民無法得到足夠的米，只好加水下去煮。他們問我為何西方那些野蠻人不吃米，我慢慢解釋說我們有別的主食，他們卻認為西方土地一定很貧脊，不足以種出足夠糧食，他們一直認為只有米可以養活人們。⁹⁴

7月30日船隻到達廈門，郭士立日誌中記載，廈門是福建的主要貿易市場，這裡約有三百艘帆船停泊，準備前去中國沿岸各港口和印度。商人樂於和歐洲人做生意，這對廣東的貿易有很大助益。接著船隻到達台灣，郭士立觀察到台灣雖實施渡台禁令，政府仍難以有效看管移民：

自從台灣被中國納入版圖後，就愈來愈繁榮。許多移民來自福建同安，他們在台灣種植稻米、樟腦、糖。這島有許多特別的港口，入口幾乎都是淺灘。中國政府擔心移民台灣者忠誠度不足，因而對渡台者訂下限制。移民者小有財富又難以看管，因此台灣島內有不少叛亂，叛亂者會躲在山中與政府對抗。臺地文風鼎盛，甚至有許多福建人將孩子送至台灣讀書以期科

⁹⁰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73.

⁹¹前引書，頁74。

⁹²前引書，頁76。

⁹³前引書，頁79。

⁹⁴前引書，頁86。

考上榜。⁹⁵

郭士立認為福建人把孩子送到台灣讀書是因為「臺地文風鼎盛」，實際上，是因為清代科舉制度規定台灣有保障名額，福建人希望取得「台籍」身分應考。且台灣在清領時期屬於移民社會，文風不盛，福建人若以台籍身分與台灣本地讀書人一同應試，錄取率相對較高。⁹⁶郭士立雖然寫出「福建人把孩子送到台灣念書」的現象，可是他對於這種現象的解釋卻不正確，可見他不瞭解清朝科舉考試的舉辦情形和影響。

8月20日來到揚子江口，郭士立眼中的上海是個南北貿易的集散地：

這裡有非常多寺廟，房屋都很乾淨也舒適，居民很有禮貌，即使是僕人都彬彬有禮。上海和寧波一樣，主要的商人都來自福建。商人把江南的絲綢、手工藝品往北運送，再由北方運來豌豆、中藥材…。有些福建人雇用的帆船會前進印度群島，買回好幾貨櫃的珍貴物品。⁹⁷

8月23日來到利多港(Leto)，郭士立在日誌中寫下他如何糾正居民對歐洲誤解：

中國人把歐洲想像成是一個很小的國家，上面只有住著一些商人，說著不同語言，他們主要靠與中國人做買賣來維生。為了改正他們的觀念，我告訴他們歐洲有很多不同民族。不過他們還是覺得歐洲只是一個小島，並且對我身上錢幣的由來感到興趣。我告訴他們更多有關西方世界的事，他們表示想去看看那裡是否遍地金銀。但是，當我提到去歐洲會有很多天需要離開陸地，他們便沒興趣加入旅程了。⁹⁸

很多居民對於郭士立身上的錢幣感到好奇，郭士立寫道：

許多中國人相信我是一個厲害的藝術家，可以把金屬變成銀幣，我告訴他們我沒有這種能耐，也不相信金屬可以變成銀幣，他們就很失望。我告訴他們雖然英國人有財富、有商船、在廣州開設公司，也無法藉由這種方式致富。或許是因為人們沒有看到我參與貿易行動，身上卻拿得出錢來，才推測我有變造出錢幣的本領。⁹⁹

9月9日船隻來到海河河口，此處人煙稀少，看上去非常荒涼。當英國使者到過這裡以後，政府便在此駐紮步兵和騎兵以防未來受到攻擊。郭士立描述道：

這裡的居民對於比中華帝國落後的西方野蠻人能輕易到達此處很疑惑，他們慶幸海河河道淺、流速大，使西方船隻難以溯河而上，但當他們發現西方船隻自己有動力，不須依靠拉絳，又感到很吃驚。其實他們大可不必感

⁹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93.

⁹⁶李祖基，〈冒籍：清代台灣的科舉移民〉，《廈門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1年第1期，頁63。

⁹⁷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101.

⁹⁸前引書，頁108。

⁹⁹前引書，頁109。

到害怕，我想西方人只有在受到挑釁時才會發動攻擊。¹⁰⁰

郭士立對海河口一帶居民生活觀察深入，他的日誌也記錄中國北方人民的居住型態：

這裡居民的房屋不同於內陸人使用磚塊，他們用泥巴蓋成。屋內只有一個房間，當作寢室、廚房、客廳之用，房屋雖然簡陋，但能維持溫暖以度過乾燥的冬天。居民主要興趣是吸菸。我和他們聊天，發現他們雖粗魯卻勇敢，雖貧窮卻快樂。這裡的糧食價格高，家庭所需日用品多來自外地，燃料也相當昂貴。唯一值得慶幸的是，這裡出產銀，國家大部分的銀來自此地。¹⁰¹

郭士立說海河口一帶是中國主要銀產地，但實際上，中國銀礦分佈以江西省最多，其次為雲南，郭士立此處所述不正確。¹⁰²

郭士立一行人在海河口附近遇到滿清官員，從雙方互動中，可看出濃厚的官僚心態：

有些滿清官員從大沽口帶來准許我們渡過河口的指令，然而，這指令須我們以貨物交換才能拿到，我們花了超過半天時間與官員們議價。¹⁰³

當地居民多以製鹽維生，郭士立寫道：

海河口岸有許多鹽堆，這些鹽似乎足夠供應整個帝國了。這些鹽被裝在大桶子裡，轉運到大沽後，堆在地面上，並用竹子覆蓋住，維持一段時間，接著再裝進袋子裡運到天津賣出。從製成到賣出前要經歷約一年的時間。這裡有超過八百艘船從事鹽業轉運，數以千計人以此維生，有些人因此致富，中國最有錢者通常是鹽業商人。¹⁰⁴

郭士立此處對於海河口岸鹽業的觀察大抵正確。

居民習慣飲酒，郭士立說：

我在此地常看到門上寫著「酒店」(Tsew-teen)，酒店裡賣著人們的精神食糧—酒，尤其是從高粱蒸餾出來的最普遍。我很訝異發現，沒人從海河岸邊種出的優質葡萄去提煉酒，葡萄似乎只被中國人當成水果種類之一。這裡水果種類多，蘋果、水梨都有，數量多，品質卻不見得比歐洲的好。

¹⁰⁵

¹⁰⁰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115.此頁裡提到郭士立一行人來到大沽(Ta-koo)的村莊，這村莊是靠近「Pei-ho」河口，因此判斷文中的「Pei-ho」是指「海河」。原文為：「The village of Ta-koo, near which we anchored, is a fair specimen of the architecture alone the banks of the Pei-hoo;...」

¹⁰¹前引書，頁116。

¹⁰²參考中國礦業網 http://www.chinamining.com.cn/report/default.asp?V_DOC_ID=1166(下載時間：2013.01.17)裡提到，銀礦儲量從大區來看，以中南區為大宗，占總保有儲存量的29.5%。以省分來看，江西最多，佔有全國總儲存量的15.5%，雲南次之，占11.3%。

¹⁰³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頁117。大沽口原文：Ta-koo

¹⁰⁴前引書，頁119。

¹⁰⁵前引書，頁121。

9月22日一行人通過海河左岸，來到天津。郭士立受到天津人的歡迎，他寫道：

當我來到岸邊，人們對我打招呼，稱呼我「老師」以及「醫生」。其中有些是我的老友，他們以前曾經食用過我給的藥品，目前身體健康。他們讚美我離開野蠻國度，來到天子的國家。他們證明我從遙遠地區來，不僅造福許多迷途羔羊，也協助中華帝國達成堅實信仰。這群人甚至知道先生娘(seensang neung)去世，與我一起哀悼。¹⁰⁶

郭士立此行是第一次到中國天津，但他在文章中卻說遇到的中國人中有些是中國老友，以前曾食用過他給的藥品，這段文字明顯是杜撰出來的。郭士立想將自己塑造成一個相當瞭解中國的外國人，明明是初次遊歷中國，卻製造了過去到過中國的謊言。而且，中國百姓更不可能「認可」郭士立的傳教是幫助中國人改信基督教，中國人不會認為自己沒信基督教就是迷途羔羊。如果中國人認為郭士立來到中國是「離開野蠻國度」，那又何須接受來自「野蠻國度」的信仰呢？在這段文字裡，郭士立所寫的前後文是自相矛盾的。

在天津，郭士立描述到中國醫學比起西方醫學缺乏實驗：

中國醫生通常也是失意文人。中國人對那些念很多醫書、缺乏實際經驗者也稱做醫生。他們只要能正確測出小脈動就宣稱已可開業。西方人的解剖學被中國人當作不實際的形上學。他們的處方主要是草藥。他們很瞭解植物，但是藥草通常會傷害他們身體或加重病情。要阻止人們欽佩的醫生開草藥作處方是很困難之事。¹⁰⁷

天津不僅商業貿易繁榮，因為距離首都近，鴉片禁令較能有效執行。他將天津與英國利物浦相比，相信天津不久即會開放貿易：

在嚴格的禁令下，鴉片貿易停滯。有個廣東人因攜帶鴉片被抓。來自廣東的鴉片已沒人敢買。天津的貿易腹地廣，超過500艘帆船每年從中國南方、越南或暹羅來。河面被帆船占滿，天津港貿易之繁榮有如英國的利物浦。這地區供養周遭很多必需品，尤其是首都…天津必然會對外敞開貿易大門的。¹⁰⁸

10月17日船隻離開天津前，郭士立敘述許多中國人要求他再回來：

在這麼多朋友的要求下，我保證只要神允許，明年我將再來。

船隻駛往遼東，10月28日抵達錦州。錦州住有許多蒙古人、滿州人，地方不大，郭士立認為沒有特別吸引人的風景。11月17日沿著遼東海岸南下，11月18日來到山東省，12月10日抵達廣東，12月13日返抵澳門，獲馬禮遜夫婦接待。¹⁰⁹首次在中國沿岸航行，郭士立發現中國人渴望獲得基督教作品，且很樂意與西方

¹⁰⁶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128.

¹⁰⁷前引書，頁130。

¹⁰⁸前引書，頁135。

¹⁰⁹前引書，頁151。

人作生意，與中國平民接觸時雙方有許多的互動。¹¹⁰日誌後記裡，郭士立相信中國不久就會打開封閉的大門：

我們會祈求，在上帝的慈悲之下，中國很快會打開大門，而只要祂繼續賜與我們健康、勇氣、機會，我們也會持續為祂工作。¹¹¹

(二)第二次航行：1832年2月25日到1832年9月5日

雖然郭士立從倫敦傳教協會得到藥物、出版品，但他在1829年已請辭荷蘭傳教協會工作，無法獲得固定薪水，這也許是他在1832年接受東印度公司聘為船員的原因。¹¹²郭士立抵達澳門不久，東印度公司阿美士德勳爵號(The Lord Amherst)¹¹³將起程北行，馬禮遜牧師即推薦他任隨船翻譯，並研究在廣東以外設立商港的可能性。¹¹⁴這次航行是回應英國曼徹斯特手工業者要求，希望探求中國北方港口開放的可能性，並由英國東印度公司做擔保。這趟航行並未取得中國政府允許，因此郭士立和林賽都使用中文名字，也隱藏與東印度公司間的關聯。郭士立在出航前提到：

我作這趟探險的目的，是出於代理商渴望開設工廠，幫助東印度公司瞭解哪些港口有發展貿易的可能性，期許對公司拓展貿易有所幫助。我們得到指示：除非為了自衛，否則不可使用武力。我們即將拜訪中國沿岸、高麗、日本和琉球(Loo-Choo island)。¹¹⁵

1832年2月25日自澳門出港，出發時天氣惡劣，郭士立一行人在船隻還沒進入大海時就遇到狂風。阿美士德號在河道裡暫時停留。有些僧侶向郭士立等人乞討食物，僧侶得到食物後，幫阿美士德號祈福做為回報。郭士立記載他所看到中國人航行前慣有的祈福儀式：

中國人習慣在所有航程開始前先祈求媽祖保佑。他們會把牲禮拿給僧侶祭拜，當將祭品供奉給神明時，會有一個佛僧朗誦祈禱文，並在神明面前焚香。我們的牲禮拿去祭拜了，但它對基督徒卻是毫無用處。¹¹⁶

¹¹⁰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142.

¹¹¹前引書，頁151。

¹¹² 荷蘭傳教協會希望郭士立在暹羅地區傳教，然而郭士立希望進入中國內地傳教。

¹¹³ 根據馬士著，區宗華譯，《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H·B·Morse. *The Chronicles of the East India Company Trading to China, 1635~1834*)第四、五卷，廣州：中山大學出版社，1992，頁343~345。其中提到，英國東印度公司在1832年1月12日給委員會以下的高級大班林賽(Lindsay)一個秘密訓令，要求他乘公司的武裝船克萊武號(Clive)出發，目的是「查明這個帝國可以漸次對不列顛商業開放最適宜的北方口岸有多遠，以及土著和當地政府對此事的好感度。」他準備了一定數量的英國產品以便察明可能的需求和能獲得的價錢。陪同他前往的有郭士立牧師。但作為樣品的貨物裝上克萊武號以後，該船長哈裡斯卻拒絕裝運，於是委員會在2月1日下令哈裡斯將船上貨物轉移到阿美士德號。

¹¹⁴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154.

¹¹⁵前引書，頁153。文中「代理商」原文：「the factory of the Hon」，郭士立所指為「西方商人」。此處為避免讀者以為是中國「行商」，故翻譯為「代理商」。

¹¹⁶前引書，頁155。

郭士立發現，廣東海灘就像海河口岸有許多鹽田，他對廣東鹽業的描述如下：

這裡的海水蒸發後會留下一些泥沙，經由提煉後可得到純粹的鹽巴。鹽專賣的收入是中國主要稅收，中國的有錢人通常是鹽業商人。然而，鹽業專賣的管理對中國來講卻是滿大的負擔。¹¹⁷

3月17日船隻在新村(Shin-tseuen)港下錨，郭士立一行人來到息州(Shih-Chow)，郭士立在此遇到一位駐守在此的老官員，要求他們返回，郭士立因此與他有所爭論：

我問他們為何我們不能走在共同的土地上，官員說：「這是中國法律禁止的。」我說：「你們政府自誇平等對待外國人，但這種禁令哪算公平？」他說：「沒這回事！」我說：「那為何急於趕走我們？」官員不再回答，只是詢問我們名字和船名。既然大部分的外國人還是相信中國人並非厭惡外國人，我們仍會盡最大努力，希望在短暫的停留中，可以讓中國人時常與我們保持友好接觸。¹¹⁸

官員急於趕走外來者，但此地居民卻相當歡迎郭士立一行人的到來，他們很高興有生意可做。郭士立發現，中國皇帝准許福建廣東沿海男子移民到海外，但是卻禁止女性移出，結果導致男性移民必須取當地原住民女子為妻，後代繼承雙親多樣的特徵。當其他國家都致力於海外擴張，中國政府卻漠視這股熱潮：

大部分移民保持獨身，有些幸運者若能賺點錢仍會回故鄉。因此，中國政府並不熱衷擴張殖民地，相較其他國家用盡各種方式取得更多殖民地，只有中國政府不好此道。¹¹⁹

關於「移民」與「家鄉」關係，郭士立描述中國人即使離鄉背井，仍與親友關係緊密。廣東這裡有許多貧困的外出工作者，背負著養活家鄉親人的使命：

移民若返抵家鄉會受到盛大歡迎，家鄉親友翹首盼望親人帶來的資源…移民對家族很有向心力，無論離開多久都不能減弱他對家鄉的熱愛…大部分的移民處境很可憐，他們常無法滿足一天所需，甚至錢不夠回家鄉，必須賣身為奴，一整年替人做事…¹²⁰

到達廈門後，郭士立認為這裡「溺斃女嬰」的習俗是中國人「父權」社會下的產物：

對此地居民而言，將一定比例的女嬰溺斃是傳統習俗。這種不尋常的犯罪對居民來講是家常便飯，他們甚至可以在很高興的心情下完成。問男人「是否有女兒」是對他的侮辱。無論政府或社會輿論都未曾阻止這邪惡的習俗。

郭士立也發現，中國社會中男性具有無上權威，父親對小孩的生命有絕對操縱權，他可以根據心情管教孩子。男孩享受到較多父親的寵愛，「男孩誕生」被視

¹¹⁷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160.

¹¹⁸前引書，頁162。

¹¹⁹前引書，頁164。

¹²⁰前引書，頁166。

為家族中最可喜可賀之事。當父親死後，兒子的權力是超越母親的。¹²¹

在廈門時，郭士立敘述中國官員總用各種藉口想驅逐他們：

我們請求他們可以像我們國家對待來客般的態度，但說再多都不如將我們的長槍拿出來有用…這些滿清官員上船後，一再要求我們離開，他們假裝自己非常好客、是我們誠摯的朋友，說因為擔心我們安危所以要派出幾艘中國船艦護送。我們則回答：「根據外國文化，朋友不該被當作小偷般地監視，客人也不會被當作惡棍般驅離。」他們聽後似乎覺得有道理，說給其中一個司令官聽。司令官承諾會提供我們所需物品，但是既然已有規定限制外國人在廣東活動，他仍無法承諾讓我們做生意。¹²²

中國人民也被禁止和郭士立這些外國人接觸，甚至看一眼外國人就犯法，郭士立說：

我們聽到有人痛苦的嘆息，他們脖子上戴著枷鎖，枷鎖上標誌罪名，不是因和外國人打交道或進入外國船隻，僅僅是因為看了一眼外國人的船——只是看了我們一眼就被當作罪犯，我們實在沒受過比這更糟的對待了。¹²³

鴉片戰爭以前，中國政府雖然用法律限制外國人居留處，並禁止外國人直接與中國百姓接觸，但是法律未規定中國百姓不能「看」外國人。中國人不可能因為僅僅是看了一眼外國人就遭受懲處。郭士立此處所言是虛構，而虛構的原因，是爲了刻意凸顯：爲了阻止中西接觸，中國法律多麼嚴苛又不合常理。

郭士立與一位廈門官員辯論中國法律與開放貿易的問題：

假若法律是不變的，那我們應該更能自由來去，因為康熙朝時的法令是准許外國人進入任何港口的，你們曾說過法令是不變的，可見這法令支持我們的說法。我們允許你們的船隻在印度各港口自由進出，既沒被我們的船包圍，也沒被我們的官員盤查，我們甚至允許你們到我們的殖民地定居，享有同等自由。我們不奢求要被平等對待，但至少能自由到各港口貿易，這要求只是一般國家普遍的原則。¹²⁴

4月11日船隻來到台灣，郭士立比起第一次到台灣，對台灣有更深入的瞭解：台灣島從荷蘭時代開始開發，至今成爲福建的穀倉，出產的糖與樟腦都賣到歐洲各地。雖然台灣大部分地是屬於中國的，但東部山區仍是原住民所有。¹²⁵郭士立很高興有機會到台灣傳教，他說：

我知道自從中國統治台灣後就沒有人再散播福音了，我很高興有機會可以向台灣人傳教。¹²⁶

4月16日來到艋港(Wan-Gan)，有幾艘漁船靠近，這些漁夫看到阿美士德號這

¹²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174.

¹²²前引書，頁178。

¹²³前引書，頁183。

¹²⁴前引書，頁185~186。

¹²⁵前引書，頁201。

¹²⁶前引書，頁203。

艘船時非常驚訝、好奇，郭士立邀請他們上船參觀：

這些漁夫看到船身優秀的建造技法驚訝地說：「他們是什麼人啊！」漁夫們進到船艙後，讚嘆這船的工藝技術，並欣賞地毯。太平洋上大概只有台灣島的人會這麼好奇了。¹²⁷

郭士立一行人在魷港發現一座廟宇：

我們走進這座廟，愈往裡面走愈讚嘆它精巧的工藝。我們在裡面看到很多佛像，有黑人般的捲髮，很像暹羅人。這座廟現在似乎荒廢了，我們多麼希望這意味偶像崇拜滅絕，我多麼希望這建築是上帝的殿堂。¹²⁸

根據郭士立形容，台灣人雖貧窮卻充滿熱情：

他們的好客與貧窮成反比。他們邀請我們進入其髒亂的屋子，與我們分享有限的晚餐。我送給他們聖經，希望他們在上帝的福音裡得到希望與永生。我們用米來換取他們的魚貨，這使他們很開心——他們已經很久沒吃到足夠米飯了。¹²⁹

從郭士立4月21日的日記裡，可以瞭解當時中國官員對於西方器物感到陌生：

在前進福建首府福州時，我們遇到幾艘戰船，無可避免地詢問我們來意。當我們使用望遠鏡觀看對方時，他們以為我們拿著槍而倉皇逃走。¹³⁰

4月22日一行人來到福州。荷蘭人曾到過此處貿易，但相關遺蹟許多都遺失了，因此郭士立一行人的到來使當地居民感到吃驚，但居民很快地熱情引領郭士立參觀村莊，他說：

我們參觀朋友們的住處，與他們聊天聊滿長一段時間。他們高興地接受我的贈書，認真地研讀它…我很高興能遇見這些友善的人，他們不像滿清官員那般僵化，認為野蠻人須被當成敵人。¹³¹

郭士立記錄到官方致力於阻止一行人和民眾接觸：

官員通常不知道我們多麼受到民眾歡迎，他們常盡力告訴我們百姓有多麼愚蠢，但這種挑撥無論對我們或對民眾都是白費工夫。¹³²

在離開福州前，郭士立已注意到有中國人成為基督徒：

以前我很渴望能和在地基督徒交談，而今天，我很開心看到有一位盛裝打扮的年輕人，向我介紹他自己是位基督徒教師。比起其他較粗俗的基督徒，他熟悉禮節和中國文學。雖然他對基督教義仍未透徹瞭解，但他承諾認真學習福音，而我也提供他許多書籍。¹³³

1832年5月底，阿美士德號抵達寧波。無可避免的，地方官員下令驅逐郭士

¹²⁷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206.

¹²⁸前引書，頁208。

¹²⁹前引書，頁210。

¹³⁰前引書，頁212。

¹³¹這裡的「野蠻人」指外國人。

¹³²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231.

¹³³前引書，頁235。

立等人，他們警告說：

這裡雖在數年前有英國人開設工廠，但已經結束營運許久，現在要重新開放非常不便。¹³⁴

郭士立在此處說曾有英國人在寧波開設工廠，但是，外國人可在中國設立工廠應是在馬關條約簽定後。郭士立此處是刻意要塑造一個對外國商人友善的「過去」，以告訴中國官員「現在」的限制不合理。

即使林賽船長一再表明善意，強調中國過去更早的規定是准許自由貿易的，但滿清官員仍制式地以禁令拒絕請求。相較於官員處心積慮想將郭士立一行人打發走，當地卻有居民想進一步瞭解貿易的可能性，郭士立記錄道：

聚集的居民中有兩位我們的朋友：李先生、馬先生來拜訪我們，想知道更多有關貿易的事情。¹³⁵

郭士立在寧波行動時，曾與一群孩童交談，他評論中國孩童所受教育太狹隘，也不曾接觸宗教學：

我瞭解這些孩子所受教育是如何受限。我不能說這些孩子若接受別種教育會有多大改變，但我卻為他們在學堂中只能不斷學習讀寫感到惋惜。一旦他們學會寫文章便離開學堂，只有那些進一步想考科舉的孩子們會留下來繼續學習，可惜終究成效有限。中國人在孩童教育這部分還有很大的進步空間，尤其是過去幾乎忽略宗教教育！孩子們心目中從不曾瞭解造物主。

¹³⁶

從 1832 年 6 月 20 日到 7 月 8 日阿美士德號停留上海期間，可看出中國官方自知武力不足以驅趕外國人，因此對貿易限制逐漸讓步，也無法禁止阿美士德號繼續前進。6 月 20 日郭士立等人會見上海道台，與他辯論貿易禁令。上海道台詢問林賽為何不留在廣州做生意，違反規定來到上海，林賽回答他：「廣州貿易制度紊亂，上海港口應接待外國船隻一如中國船隻可以進入外國港口。」上海道台聽後生氣地說：「那就不要讓中國船隻進入你們的港口。」林賽回答：「那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政府講道理，不會無理對待外國人。」¹³⁷上海道台無視請求下令驅逐他們，中國官兵與阿美士德號互相開火卻失勢。發現武力不足以驅趕外國人的事實後，6 月 27 日官府再次派兩名中國官員與郭士立等對談，此時上海官方改採取哀兵政策。郭士立寫道：

兩名官員告訴我們，再不走，他們就會丟了工作。其中一人拿下官帽上代表官銜的鈕扣，告訴我們他不僅會丟了官還會被監禁…官員流下淚水，這場景簡直就是一齣鬧劇。¹³⁸

¹³⁴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 p.256. 原文：「..., that many years ago an English factory had been established at Ning-po.」

¹³⁵ 前引書，頁 257。

¹³⁶ 前引書，頁 262。

¹³⁷ 前引書，頁 286 中提到「戰船對我們(阿美士德號)砲箭齊發，但殺傷力就像在放鞭炮一樣。」

¹³⁸ 前引書，頁 290。此段文字中，郭士立描述「官員流下淚水，這場景簡直就像一齣鬧劇」原文是：「One of the mandarins tried to weep, but the tears fell very sparingly; and on the whole this intended

郭士立告知中國官員並不想侵擾此地，也很抱歉造成官員困擾，但只要官員允許貿易就會離開。接著，中國官員表示已被授權詢問需要什麼物產才會離開，郭士立就交給他們一張清單。最後，6月30日上海地區突然取消對阿美士德號的貿易禁令，當天街上還貼著許多禁令告示，此舉實在令許多人同感震驚！¹³⁹

1832年七月中旬，阿美士德號在威海衛停留不久即前往朝鮮半島，郭士立發現朝鮮人也信奉儒家學說，¹⁴⁰政治體制與中國相當接近。¹⁴¹郭士立在朝鮮傳教時的遭遇與在中國的情況接近——一樣遇到當地官員驅離，也遇到居民熱情招待。八月底時阿美士德號結束此趟航行，在1832年9月5日返抵澳門。

郭士立的第二次中國沿岸航行使他瞭解到：廈門是個富裕的城市，具有傑出港灣條件，它可以控制大部分中國東南方沿岸的船隻。另外，福州、寧波、上海比廣東更接近中國絲織品、瓷器、茶葉發源地，只要開放即可大幅減少運輸費用，也比廣東更接近羊毛需求市場。要使這些港口開放其實非常容易，因為中國各港口的防守非常微弱、人手不足，士兵幾乎沒受訓練，他們裝備不夠，既吃不飽也穿不暖，士兵許多缺乏槍枝，就算有也是生鏽的武器。郭士立甚至說道：

如果我們以敵軍身分到此，所有中國軍隊不到半小時內就可被我們擊退，他們將非常沮喪。¹⁴²

因此郭士立在航海日誌中，記錄下中國沿海防衛的缺失，他們探勘中國沿海並繪製地圖，使西方對中國海岸線更加瞭解。南京條約後選擇開放上海、寧波、福州、廈門，與阿美士德號的航行收穫具有高度關聯性。

(三)第三次航行：1832年10月20日到1833年4月29日

1832年9月郭士立返抵澳門不久，有汽精號(Sylph)擬到沿海口岸販賣鴉片，船主查頓邀請郭士立充當譯員，1832年10月20日郭士立登上汽精號(Sylph)，這是一艘有武裝的船隻。由於正處於寒冬，自出發以後汽精號可說是一路抵擋嚴寒的東北季風。船隻時常面臨狂風巨浪，甚至造成船上的印度籍水手落海身亡。10月26日來到廣東省東海岸的揭西縣(Ke-seak或Ke-shih)海邊，這是一個充滿著石頭的港灣。郭氏一行人遇到當地漁夫，用米和漁夫們交換魚獲。雖然漁夫們認為米的數量不夠多，但這種以物易物的方式使得漁夫很滿意，又另外贈送郭氏一行人蔬果。10月27日到達揭西縣更東邊的柯齊(Kap-che或Ka-tsze)，這裡的居民過去曾經見過郭士立，看到他重回故地熱烈歡迎，稱他「鄰居」，熱情地跟他索取書本。當通過福建省羅源灣(Lae-ao)時，看到很大的村莊，10月28日在此下錨。當地居民起初對郭士立一行人感到陌生，在郭士立熱情招呼下，接受傳教書籍：

tragedy more resembled a farce than any thing else.」

¹³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291.

¹⁴⁰前引書，頁338。

¹⁴¹前引書，頁335。

¹⁴²前引書，頁310。

此地居民一開始對我們充滿懷疑，在我招呼他們過來後才漸漸敢靠近。當他們靠過來後，我想時候到了，我將書遞給一位看起來聰明的人，他一開始將書視為陌生的禮物，隨即轉向他的族人大聲朗讀內容。所有人馬上將注意力轉移到他身上，接著其他人也要求要得到書，幾分鐘內我們的船馬上被人們包圍住，居民要求不拿到書就不離開，在此情況下，我必得將這滿載福音的書籍發送給他們，畢竟他們是如此渴望獲得。¹⁴³

11月8日來郭氏一行人來到浙江省南緣的北關(Pih-kwan)港，在此處下錨避風。郭士立拜訪許多停在港灣內的船隻，並向居民表明來意。居民起先認為沒有東西可以和郭士立交換便不願接受贈書，在聽聞郭士立解釋所有書籍都是免費贈送後，皆感激地彎腰向郭士立鞠躬。郭士立在日記中描述當地居民的生活情況：

這些居民似乎天生就適合居住在海岸地帶，他們能適應海濱充滿鹹水的環境。在所有漁夫中，福建人是最勇敢充滿膽量的，他們航向中國所有海港，在狹小的環境、有限的資源中挑戰困難。將自己所受的苦難換成一年五塊錢工資來養活家庭。出於漠視法令和想賺更多錢的心態，福建人成為海盜，為患整個浙江沿海。¹⁴⁴

郭士立文中所述福建漁夫用一年所賺的五塊錢工資養活家庭，這「五塊錢」數字是令人質疑的，在他的文章中採取「dollar」一詞，是西方幣值單位，難以換算成中國的銀兩或銅錢。郭士立不見得真正瞭解福建漁夫一年所得是多少，但他想凸顯出福建漁夫家鄉生活環境艱困，即使向外尋找工作機會，能賺得的錢很少，仍必須出海工作。

11月15日一行人來到江南地區，在航行一個多月後終於可看見山東的海岬，他們在鳳鳴(Fun-ming)登陸。這裡大部分居民自山東移民過來，看到郭士立這群陌生人，全都趕到海邊來觀看，也有居民邀請一行人去住家參觀：

他們的眼光不是驚訝而是非常嚴肅。我們想進入其中一位居民家中，但是被阻擋，我想此時非常需要將我們的書送給他。當他們發現我們要把書「送」給他們時，態度立刻轉為友善好客。我們進入他的小屋，這個簡單的小屋由一個壁爐、房間、廚房組成。屋主提供我們木炭、棉花，他的眾多孩子們看到我們都手舞足蹈。所有人都穿著七摺夾克和毛衣，看來吃的夠飽。這個國家不僅提供所有人充足需求，也提供來探險者相當多的物產。當我們要離開時，他們祈禱得到永生，並對得到珍貴的禮物心懷感激。

¹⁴⁵

不久，郭士立來到東沙口(Tung-tsze-kow)，他看到這裡有許多帆船載滿貨物

¹⁴³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416.

¹⁴⁴前引書，頁417。郭士立提到福建人辛苦工作一整年，換取五塊錢養活家庭，原文是：「...; they brave all dangers for a scanty livelihood, and suffer the severest hardships to return to their families with five dollars after the toils of a whole year.」

¹⁴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418.郭士立說「所有人都穿著七摺夾克和毛衣」原文是：「Every body was well dressed in seven-fold jackets and skins,...」

準備前往南方。這些商人非常友善回答郭士立一些問題，並多次勸告郭氏一行人盡量不要再往更北方去，因為會遇到冰雪。郭士立照例將傳道小冊發送給居民：

雖然他們對基督教的無知使我們談話有阻礙，但書本會直接與他們對話。

也許他們只會閱讀其中一部分，甚至有可能將書丟掉，但相信所有傳道小冊與聖經都會找到讀者，並將如何救贖靈魂的方法傳授給他。¹⁴⁶

郭士立一行人身穿的印花布襯衫、寬大的外套都引起居民好奇，有一些居民也與郭士立交談。郭士立對這裡的環境有詳細描述：

這山谷帶來很多沖積土，每年為海岸地帶堆積許多土壤，使海岸線漸漸往外後退。這些沖積到海邊的土壤雖然肥沃，但卻使船隻沿岸航行增加困難。我們沿著河口彎走進去，看見一群山羊正吃著秋天過後僅存的草，人們看見我們要進入村莊都很害怕。我很訝異地發現，這裡的人們當聽到我述及羅馬天主教時似乎感到很疑慮，雖然我向他們解釋天主教與基督教有極大差異，他們仍然搖頭不相信我的說法，不像在帆船上做生意的中國人總是非常注意我們，高興地聆聽福音。¹⁴⁷

11月28日船隻抵達凱州(Kae-chow)，郭氏一行人在測量後發現靠近海岸處有強烈的北風，不適合下錨，便轉往錦州(Kin-chow)和長城。他們的船隻在航行當中受到撞擊，龍骨和舵有損毀，船身有漏洞會滴水，因此接下來的航程必須丟掉一部分貨物。這趟行程中所遇到最大的困難就是嚴寒的氣候，此時凜烈的北風由勘察加(Kamtchatka)吹來，船上的印度水手冷到無法工作，郭士立在如此艱困環境中仍全心信賴上帝：

還好在這些危險時刻，有全能的上帝持續安慰我們，使我們可以保持愉悅心靈，祈禱情況改善。¹⁴⁸

12月3日時，整艘船已覆蓋上一層結冰。一行人努力了幾小時才將錨拉起，慢慢離開此地，再次回到東沙口(Tung-tsze-kow)。這時有許多帆船也正在下錨，郭士立從當地居民手中得到滿清官員曾承諾卻未給的燃料，他說：「官員沒有救助我們，更是顯示出此地居民的友善，居民們的表現值得我們信賴。」¹⁴⁹12月11日船隻來到吳淞江，狂風直吹使得船身上下晃動劇烈，即使天際透出光線，雲漸漸散開，海浪仍波濤洶湧。在這樣令人沮喪的天候條件下，郭士立等人向一艘喪失桅桿和錨、在海中載浮載沉的船伸出援手，並告知中國人神像並不具有解救他們的神力，利用這次機會欲教育中國人放棄無用的偶像崇拜：

附近有好幾艘中國帆船，但只有我們願意幫它。縱然以前我們遇難時沒人幫忙，但這是我們以基督教方式回報中國人、實踐馬太福音所言的好機會。我們駕著小艇靠近，約十二個中國人向我們伸手求助，向我們呼救。但當我們靠近時，他們第一件交給我們的東西卻是媽祖神像，使我們有一

¹⁴⁶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419.

¹⁴⁷前引書，頁421。

¹⁴⁸前引書，頁422。

¹⁴⁹前引書，頁423。

種受騙的感覺。我不想浪費時間，便告訴他：「這東西是無法救你的，甚至它也無法救它自己，就讓它被毀棄吧。」神像被淹沒，所有人都救上船後，他們全部向船長下跪，而我只要他們感謝主。¹⁵⁰

沿著吳淞江往上，進入到上海。1832年12月25日到1833年1月5日郭士立一行人在上海停留。郭士立看到數千隻船停泊於此，天氣好時有更多船隻開進，上海港可說是中國中部最重要的門戶。郭士立觀察到上海人口很多，孩子數量一直增加，城市內有許多溝渠和水道灌溉農作物。1月5日前往浙江省北邊的乍浦港(Cha-poo)。乍浦港獨占了對日貿易，它有一個廣闊的天然港灣，港邊小鎮環繞一周約五哩，中間有一個廣場，被數個水道分割，所有河流都通向杭州河。郭士立如此形容這裡風景：

沒有什麼比這裡更像一幅畫。放眼望去散佈著高聳的塔、陵墓和廟宇，如果中國有世外桃源，那一定是指杭州和乍浦這一帶。居民該是有什麼特權才能住到這裡，他們都盡心維護環境，用乾淨的道路、耕地，和美麗顯眼的建築來裝飾它。沒有任何地方的人比此地居民更具開闊胸懷，他們對我們的國家感到好奇，好像對我們的陪伴永不厭倦。¹⁵¹

1月17日到達青潭島(Kin-tang)，過去阿美士德號也曾來到此處，居民認得郭士立，許多患病者希望從郭士立手中得到藥物。郭士立形容居民衛生習慣差，常染疾病：

他們身上穿了五至六層衣服，衣服用棉花做成，但上頭有許多補丁。雖然縫補多次但可保持溫暖。中國人的衛生習慣不好，太久沒洗衣服導致疾病感染。對傳教士而言，進入此區提供藥膏也是任務之一。我總是焦急地想提供醫藥協助，但這裡患者太多，我能幫的僅是少數人。我尤其要提醒想進入中國的傳教者要做好心理準備，會遇見很多眼疾患者…真希望中國能在交通便利之處設立一間醫院。¹⁵²

2月4日來到普陀島(Poo-to)，此島土壤貧瘠，不適合居住。郭士立發現此地居民克服了環境問題，蓋相當雄偉的建築物。有座廟宇蓋在凸出的海岬上，底下就是泡沫般的海水在沖擊，居民特意將他們的偶像置放於這最吸引之處。郭士立在此看到佛僧身穿破舊袈裟沿著岸邊散步，緩慢地接近他們。郭士立將一些書送給僧侶，僧侶引領他們往上到一間寺廟。這座廟是五世紀梁朝時所建，有很漂亮的大門以及雄偉的玄關，踏入玄關後是一座寬敞的庭院，庭院四周圍繞著一排房子。房子裡面有菩薩和祂弟子的佛像、代表仁慈的觀音佛像，以及其他神像。郭士立感嘆地說：「當一個基督教傳教士看到這個國家的人民受到偶像控制會作何感想呢？」¹⁵³大廳內放置許多鍍金神像，還有大鼓和鑼。僧侶們手握玫瑰花圈，花圈中有一個鈴鐺，每隔一段時間就響一次鈴鐺再撞一次鼓，以提醒佛

¹⁵⁰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426.

¹⁵¹前引書，頁430。

¹⁵²前引書，頁436。

¹⁵³前引書，頁439。

祖聆聽信徒的請求，¹⁵⁴僧侶口中的祈禱文要不斷重複。即使有些造訪者在僧侶旁邊談話、嘻笑，這些僧侶們仍專注地舉行儀式。郭士立說：

雖然中國政府有時責難佛教有不好的教條，但我們看到人們為了祈求豐收，屢次修建廟宇，政府也支持修廟——這真是非常矛盾。¹⁵⁵

郭士立觀察到普陀島有很多廟宇：

若神明有造福此處，就要在此處修廟以示感謝神的慈悲。在普陀島上有兩座大廟、四十座小廟，它們都蓋成同一個樣式，這裡共有兩千多個僧侶，廟宇主要是拜觀音。這些僧侶除了進行祭拜外，也從有錢人的奉獻中獲利。¹⁵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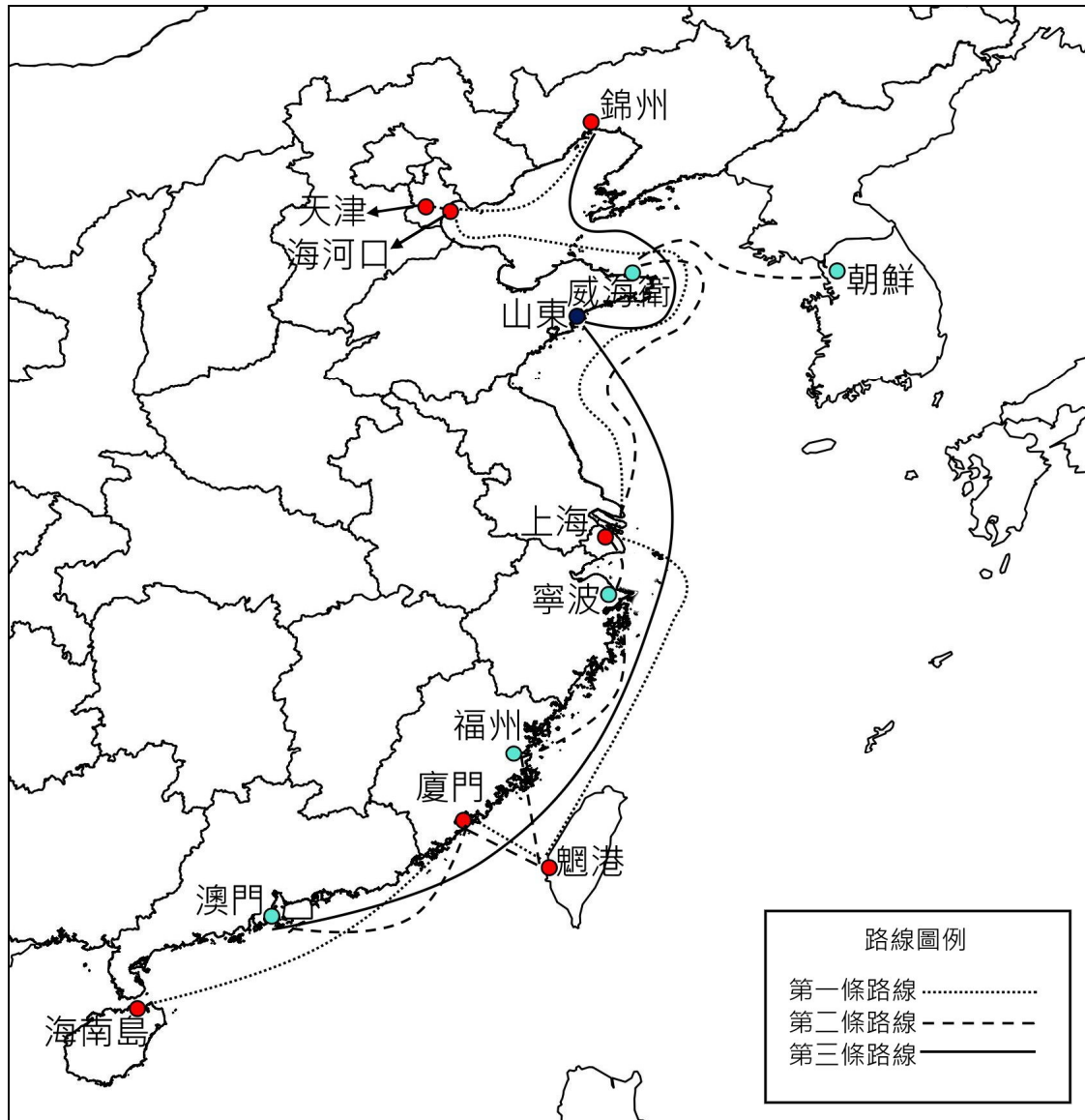
郭士立一行人繼續遊歷了舟山群島其他島嶼，他認為在中國沿岸島嶼傳教比在太平洋上的島嶼傳教還要順利。雖然這一個世紀以來，這些島嶼持續有英國帆船造訪，但卻從未被歐洲海軍將領深入瞭解，因此郭士立的造訪有助於得知沿岸環境。4月1日船隻來到石浦(Shih-poo)，天氣仍然寒冷，偶有風暴，但春天即將來臨，桃樹在空氣中綻放清香。重回故地，居民對郭士立一行人已熟識，居民願意努力探究郭士立所傳福音，郭士立本身也認為來此目的達成。最後，路經台灣和金門，在六個月又九天的航行後，船隻於4月29日回到澳門。

¹⁵⁴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442.原文是「...they occasionally beat the drum and large bell to rouse Budha to attend to their prayers.」

¹⁵⁵前引書，頁442。

¹⁵⁶前引書，頁445。

郭士立 1831~1833 年三次中國沿岸航行去程路線圖
(本圖由李至倫老師使用 QGIS、Google Earth 軟體繪製)



第一條路線：1831 年 6 月 3 日到 1831 年 12 月 13 日

第二條路線：1832 年 2 月 25 日到 1832 年 9 月 5 日

第三條路線：1832 年 10 月 20 日到 1833 年 4 月 29 日

第三節 多重角色身負重任(1833~1844)

郭士立最後兩次航行是爲了找尋茶葉種子和種茶方式，本來這些資訊在中國人的保密下很難取得。爲了打破中國茶葉獨佔市場情形，英國決定在印度種茶。¹⁵⁷1834年加爾各答茶葉公司派高登(G.J.Gordon)邀請郭士立共同前往中國茶葉種植區探查。1834年7月高登與郭士立登上有武裝的「仙女號」(Fairy)前去福建。由於缺少足夠資訊與地圖，他們數度迷路，最後終於避開中國官員進入威陶灣(Weitou)，溯河而上。當地居民友善地索取郭士立的傳道小冊，對郭士立所帶來的商品感到好奇。¹⁵⁸高登和郭士立在此記錄了茶葉生長狀況、獲得茶葉種子並邀請中國茶農同回印度當茶葉種植指導者。高登將茶葉種子與種茶技術帶回印度後，廣泛地種在印度阿薩姆省，從此大量取代中國茶葉而銷往西方。

1834年有艘從名古屋出發要前去東京的運糧船遇到颱風，在海上漂流14個月。其中三名船員讓美國人救起，經由倫敦又輾轉來到澳門。¹⁵⁹另外有四名日本船員則經由菲律賓來到澳門。這七名日本水手在澳門受到郭士立的照顧，郭士立也向他們學習日文，並將聖經翻譯成日文。馬禮遜牧師決定帶著郭士立、伯駕等人將船員送回日本，一行人在1837年抵達東京，但受到日方攻擊，於是在1837年8月返抵澳門。¹⁶⁰參與這趟日本之行的威廉(S.Wells Williams)後來成爲1853年培理(Matthew C. Perry)到日本要求開港時的翻譯，而其中一位日本水手則是威廉的助理。7位水手中有2位持續幫忙郭士立做事，在鴉片戰爭時，有一位日本水手跟隨郭士立前往中國北方，他後來擔任郭士立從事香港撫華道一職時的幕僚。

¹⁶¹

1835到1843年間，郭士立應聘擔任英國政府翻譯，多次隨英軍在中國沿海活動。1839年9月九龍事件時，郭士立擔任義律的翻譯。¹⁶²當林則徐禁止中國人販賣物品給英國人或接觸他們時，郭士立警告林則徐若拒絕給予外國人幫助會付出更多代價。郭士立雖然知道戰爭會引起流血衝突，但若英國想使中國開放貿易，傳教士若想順利傳教，那麼流血就是必要的。¹⁶³鴉片戰爭期間，郭士立可說具有雙重角色，他一方面是英軍不可或缺的助手，一方面又在英軍占領區向中國百姓釋出善意、改善他們的生活。他在寧波幫忙被俘擄的商人籌募贖金、參與英軍與中國官員交涉行動。郭士立隨著英軍前往乍浦、浙江、鎮海時，發現過去這些地方被滿洲人占領後，當地很多漢人官員帶著妻小自殺，因此英軍入城時，他

¹⁵⁷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83.

¹⁵⁸ 前引書，頁 83。

¹⁵⁹ 前引書，頁 92。

¹⁶⁰ 前引書，頁 94。

¹⁶¹ 前引書，頁 95。

¹⁶² 前引書，頁 99。

¹⁶³ 前引書，頁 99。

試圖阻止官員的自殺行爲。¹⁶⁴在許多軍事占領區，郭士立儼然就像一個軍事指揮官，當樸鼎查(Pottinger)拒絕接見中國派來的非全權代表時，郭士立時常出面協商。英軍需要中國人幫忙搬運軍糧，或者想雇用中國人當作間諜來刺探軍情，都由郭士立出面找尋。¹⁶⁵在定海，農人們拜託郭士立阻止英軍搶奪他們的財物；發生乾旱時，郭士立帶領農人們一起向天祈求降雨。¹⁶⁶他建議英軍經由杭州直接去揚子江並拿下南京，這樣可把中國分割成兩半，取得中國最佳航道和米、鹽。這建議被樸鼎查和郭富將軍採用多少雖難以判定，但可確定的是郭富將軍的進軍路線與郭士立的建議相去不遠。¹⁶⁷郭士立參與中英談判及《南京條約》簽定的過程。1842年9月郭士立開始擔任定海知縣，直到1843年回到香港，接替馬禮遜之子馬如翰擔任香港撫華道(Chinese Secretary)。

南京條約簽定，英國取得香港後，郭士立曾告訴樸鼎查：香港的地理、人文條件不如舟山，放棄舟山選擇香港非常可惜。¹⁶⁸鴉片在香港可以合法上稅，香港不僅成為鴉片轉運站，也成為海盜、秘密會社、走私鹽業者的天堂，此地因此出現許多犯罪行爲。郭士立擔任香港撫華道期間，與福漢會成員之一曾啓堯(Zheng Chi-yao)共同翻譯聖經，協調英國政府與香港官員溝通。¹⁶⁹香港撫華道辦公室翻譯《京報》、中國刊物、編纂船貨進出口列表。郭士立在船貨進出口列表中詳細記載香港船隻的噸位、目的地、運載物品…等，這些紀錄都成為每年香港向倫敦回報政情的重要資訊。¹⁷⁰英軍駐守香港初期，軍隊中爆發嚴重瘟疫，香港政府決定把軍營附近的稻田徵收填平以免孳生蚊蠅，該如何補償農民損失成為一大問題。郭士立被香港政府指定處理徵收田地事宜，他盡力為農民爭取有四年時間可供搬遷。¹⁷¹

1845年12月，郭士立建議香港政府對當地中國學校發放津貼。¹⁷²在19世紀後期，大多數的初等教育是由宗教機構或慈善機構辦理，郭士立發現香港當地的中國學校校舍破舊，假如政府願意提供資金，對當地學童教育幫助很大，也會給中國人留下好印象。郭士立的建議得到回響，1847年7月倫敦決定資助香港三所學校一年各一百磅。¹⁷³比起其他商人、傳教士或官員，郭士立與中國人保有更好的友誼。他自稱為「愛漢者」，對中國所有文化習俗都深感興趣，他第一次前往中國航行時就身穿福建當地衣服。1849年第二任妻子去世後，他自稱中國是他的新娘，自己絕對無法離開中國。郭士立在航海日誌中描繪了中國人崇拜偶像非

¹⁶⁴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102.

¹⁶⁵ 前引書，頁 103。

¹⁶⁶ 前引書，頁 107。

¹⁶⁷ 前引書，頁 108。

¹⁶⁸ 前引書，頁 110。

¹⁶⁹ 前引書，頁 111。

¹⁷⁰ 前引書，頁 112。

¹⁷¹ 前引書，頁 120。

¹⁷² 前引書，頁 120。

¹⁷³ 前引書，頁 121。

常迷信，但自己身為中國人的父親，可原諒他們的錯誤。1849 年郭士立在東亞待了 23 年後回到歐洲，¹⁷⁴將他豐富的知識見解交付給歐洲人。

第四節 傳教事業再推進(1844~1851)

郭士立在 1844 年創立福漢會，可說是他傳教事業更進一步的發展。郭士立 1830 年就開始宣揚，要利用中國信徒到五口以外的地區傳教，當時他和美國浸禮會的牧師羅孝全合作，1839 年 2 月 7 日共同發表一份「年度報告」：

從這個(廣東)省東部來的一位先生到這裡稟告我們說，有幾千個中國人，其中包括兩名軍官，已經放棄偶像崇拜，現在崇拜獨一真神！他說他們沒有宣教師，並說他樂意把我們的包含救主信條的書帶給他們，如果可能的話，與我們建立起聯繫。他現在帶著書走了，但我們還沒有聽到他成功到達的消息。¹⁷⁵

雖然在沒有與外國傳教士接觸的情況下，有這麼多的中國人會改信基督教頗令人質疑，但郭士立想藉由這份報告指出，已經有中國人信仰基督教的唯一真神，並自願到中國內地從事傳教工作。1841 年他回澳門後，發現他原來雇用的中國助手們已經解散，便重新將當地的中國信徒組織起來，訓練他們如何傳教。1844 年郭士立在香港將追隨他的人組成一個團體，命名為「福音宣教聖會」(Christian Association for Propagation of Gospel)，後來改名為「福漢會」(Chinese Union 或 Chinese Christian Union)，又稱「漢會」。福漢會成立目的，是要讓中國信徒自己傳教，並且深入到中國內地傳教。福漢會初期成員都是郭士立身邊來往的中國人，如秦繼堯(Chin Ke-yaou)、楊志遠(Yeang Chi-yuen)、吳衛(Wu Wei)等，都是香港英政府中文秘書處的雇員。¹⁷⁶還有些人是其他傳教士如美國浸禮會的叔未士、蔣為仁等施洗入教的，或與他們有過接觸，如任語言教師、抄寫員等。¹⁷⁷

郭士立將部分早期會員派往各地傳教。他們的身分是「佈道者」(preacher)和「散書者」(tracts distributor)。他們從郭士立那裡領取經費和傳道書，前往指定地點。這些人通常會發展一些新的信徒，其中有些被帶到香港，由郭士立親自加以考察，在福漢會的香港基地接受教義方面的訓練，包括研讀聖經和傳道書，參加禮拜儀式等。經過一段時期，通常是一個月左右，這些新入會的福漢會成員掌握了基督教的基本教義後，也成為佈道者和散書者後，郭士立派他們到各地去散書、傳教，重複創始會員的工作。至於不到香港的信徒，就由促使他們入會的人

¹⁷⁴ 郭士立在 1826 年受荷蘭傳道協會指派到加爾各答，1849 年回歐洲，待在東亞期間一共 23 年。

¹⁷⁵ 吳義雄，《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頁 83。

¹⁷⁶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271-272.

¹⁷⁷ 吳義雄，《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頁 85。

負責保持聯絡。郭士立因此創造了一個新的對華傳教模式—由傳教士組織獨立的、沒有教派背景的傳教團體，由中國信徒自己管理並從事傳教活動。他之所以這樣無視傳統和成規，是因為在神學上受到了「莫拉維亞兄弟會」(Moravian Brethren)的宗教信仰和在日爾曼地區流行的浪漫主義精神影響。¹⁷⁸莫拉維亞兄弟會主張生活之快樂在於靈性生活的實踐，禮拜在室內舉行，不設祭壇，只有唱詩、讀經、禱告。郭士立一生傳教事業皆隨個人意志所為，不受傳道會的約束，

福漢會成立初期重要成員有：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¹⁷⁹韓山文（Theodore Hamburg）、¹⁸⁰黎力基（Rudolph Lechler）；、¹⁸¹葉那清（Rev. Ferdinand Genahr）¹⁸²等。這幾個傳教士活動範圍，仍是以廣東地區為主，不敢深入內地。關於福漢會成員人數，魯珍晞根據郭士立本人的報告與信件，在他的著作中有一個統計可參考：¹⁸³

年份	成員人數	宣教師	受洗信徒
1844	20	—	262
1845	80	—	88
1846	179	36	601
1847	300	50	655
1848	1000	100	487
1849	—	130	695

（此表來源：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頁 228。）

由此統計表可看到，郭士立所記載的福漢會成員擴展人數非常迅速。1846 年前，福漢會成員活動範圍主要在廣東，1846 年後，漸漸有一半成員被派到廣東與江西、廣西、福建的邊界地帶。到 1848 年，郭士立報告說，他的宣教師已經分佈到中國 18 個省中的 12 個。他計畫在北京這樣的大城市建立傳教中心，在各

¹⁷⁸ 李志剛，《基督較早期在華傳教史》，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5，頁 300。

¹⁷⁹ 根據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網站：<http://www.bdcconline.net/en/stories/r/roberts-issachar-jacox.php>（下載時間：2013.01.17）說明，羅孝全（Issachar Jacox Roberts, 1802-1871.）1837 年到中國，初在澳門向麻瘋病患者傳教。1841 年加入美國浸信會差會，1842 年，他是第一位長期居留香港的新教傳教士。

¹⁸⁰ 根據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網站：<http://www.bdcconline.net/en/stories/h/hamburg-theodore.php> 說明（下載時間：2013.01.17），韓山文（Theodore Hamburg, 1819-1854.）為瑞典傳教士 1847 年瑞士巴色會派他到中國，首抵香港，先習客語，後於廣東南部和東部的客家人聚居地傳教。1851 年，在香港皇后大道建立巴色會教堂。

¹⁸¹ 根據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網站：<http://www.bdcconline.net/en/stories/l/lechler-rudolf.php>（下載時間：2013.01.17）中說明，黎力基（Rudolph Lechler, 1824-1908.）為日爾曼傳教士。1847 年與韓山文共同受瑞士巴色會派遣到中國。主要在香港、廣東一帶向客家人傳教，1898 年退休返回德國。

¹⁸² 根據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網站：<http://www.bdcconline.net/en/stories/g/ferdinand-genahr.php>（下載時間：2013.01.17）中說明，葉那清（Rev. Ferdinand Genahr, 1823-1864.）是日爾曼人，1846 年由日爾曼禮賢會派至香港跟隨郭士立學習華語、傳教。

¹⁸³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228.

省都建立分支機構，由他最可靠的助手來負責掌管各省教務，還要做到每個省都由本省人來宣教。爲了培訓這樣的宣教師，郭士立打算在香港建立一個神學院。郭士立聲稱，1847年，福漢會已在70個地方建立了穩固基地，到了1848年，又發展到80個。但是郭士立所講的這些數字，後來受到許多質疑。¹⁸⁴

爲了維持福漢會經濟來源，郭士立撰寫許多文章、小冊子，發表公開信，宣揚福漢會的活動。他將福漢會成員的傳教日記翻譯成歐洲文字發表，讓福漢會成員寫信給歐洲有關機構，希望使歐洲傳教機構相信福漢會在中國傳教已取得重大進展。1849年9月，郭士立回歐洲度假。他走訪歐洲各國，包含：英格蘭、愛爾蘭、蘇格蘭、瑞士、日爾曼地區、波西米亞、奧地利、匈牙利、俄羅斯、波蘭、芬蘭、瑞典、丹麥、義大利、希臘…等。除了挪威、西班牙、土耳其、葡萄牙以外，幾乎是在一年多時間裡踏遍歐洲各地，宣傳他的傳教事業。吳義雄在《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文集》一書裡提到，當時歐洲各地由於受到郭士立的號召，成立許多支持福漢會的團體，認爲其中最有名的是英國商人理查·鮑爾(Richard Ball)成立的「中國福音會」(Chinese Evangelization Association)，參加成員有律師、股票經紀人、商人、牧師等。¹⁸⁵

隨著郭士立離開香港，福漢會也漸漸出現危機。韓山文與黎力基參與福漢會活動後不久即發現，郭士立所記載的福漢會成員人數，或者福漢會成員到內地傳教的日記與報告，都不可信。王元琛在《聖道東來考》一書中敘述到：

時游郭門學道者甚眾，領洗者約有一百餘人，其間良莠不齊，共同作弊者有之，郭君不暇察覺，而葉黎韓三人知其弊，與郭君意向不同，因此而分，各歸本會自理。郭君於道光二十六年回國著論演說，備述華人求道者眾。翌年小巴陵傳道會，始遣那文傳教士來華，僑寓香港灣仔山上。至咸豐元年，郭君復來香港，與那文同事。是年郭君遇疾，卒於香港，福漢會傳教事，乃歸小巴陵那文統理。又兼招生徒學道。時有何槐卿、區道成、梁福等學道；又有屈安、吳旭添等助理傳教。據此，三巴會(巴色會、巴勉會、巴陵會)之入粵，皆以助郭士立之福漢會工作為原意，而郭士立牧師亦早已訓練福漢會之華人傳道以作各牧師入內地之嚮導。即或其後韓山文、黎力基、葉納清三牧師脫離郭士立之福漢會，復有那文牧師相助。俟那文牧師一八五五年之回國，福漢會之無以為繼，乃告停頓。¹⁸⁶

王元琛是廣東東莞人，生年不詳，但知他成年後在香港經商，認識郭士立。1847年受洗，成爲福漢會成員。王元琛在1914年卒於香港，所留下作品主要有《通道實錄》、《聖道東來考》。從以上文字敘述可知，福漢會成員素質不一，葉那清、黎力基、韓山文三人與郭士立志趣不同因此離去，連身爲福漢會成員的王元琛都相當瞭解而作此敘述。當時，在香港的倫敦傳教士理雅各(James Legge)等，

¹⁸⁴ 吳義雄，《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頁89。

¹⁸⁵ 前引書，頁90。

¹⁸⁶ 《聖道東來考》李志剛先生收藏有複印本，王慶成著有《稀見清世史料與考釋》，收錄他從李志剛先生取得的《聖道東來考》全文。見李志剛，《基督較早期在華傳教史》，臺北：商務印書館，1985，頁301。

對福漢會急遽擴張、超乎尋常的運作方式早已心存懷疑。由於郭士立在歐洲引起廣大關注，倫敦傳道會的資助金流向福漢會，理雅各開始採取行動，他告訴人們：

我個人的印象是，那個所謂的基督徒協會(即福漢會)是一個罪惡的淵藪，其情形比我們的報告要糟糕十倍，我認為鴉片貿易對基督教在華事業造成的損害也沒有那個所謂基督徒協會造成的惡果嚴重。¹⁸⁷

吳義雄先生以《福漢會調查備忘錄》中的資料，詳細舉證多處福漢會虛妄不實之處：韓山文與理雅各利用倫敦會海外事務秘書 1849 年 12 月給理雅各等的信，作為調查福漢會的基礎。該信要求他們提供福漢會的真實情況。理雅各以無法以其他方式取得「有關福漢會的資訊」為由，要求在香港的新教傳教士召開「全體會議」，就福漢會的問題展開調查。於是，理雅各和韓山文共同策劃，組成一個十二人委員會，從 1850 年 2 月 20 日至 26 日，調查福漢會的內情。調查內容有：福漢會的具體運作方式、福漢會確切人數、福漢會活動範圍、福漢會成員的詐欺行為…等。調查結果發現，福漢會的傳教成果並不如郭士立所述那麼有成效。例如，在活動範圍方面，郭士立曾宣稱福漢會成員廣佈中國十八個省和西藏、滿洲、蒙古等地，但韓山文卻說，那些聲稱自己來自遙遠省份的人，實際上都來自廣東。有一位叫戴光文的中國人作證說，他認為聲稱來自廣東以外地區的福漢會員，一半以上是在撒謊，那些操外省口音的人，大都是從那些省份到廣州謀生的。韓山文以親身經歷來說明這方面的問題。他在郭士立走後，派出 44 個人到各地活動，卻發現其中有人多日後還躺在家中吸食鴉片。調查中也說明，郭士立給這些人的路費根本不夠用，這意味著郭士立的運作方式本身就存在產生欺詐的漏洞。

福漢會成員也未將郭士立給予他們傳道用的聖經發送出去。韓山文曾作證，他指定外出散發傳道書的 16 人中，有些人根本沒有外出，而是將發給他們的 200 部《新約》以極低的價格(每市斤 15 或 16 枚銅錢)賣給原來承印這些書的書商，而書商又以高價將這些書轉賣給韓山文，其中有些書已經過多次的轉賣。¹⁸⁸「散書者」一面從郭士立或韓山文那裡領取路費和津貼，一方面還可以將大批的傳道書冊賣錢，這些傳道者領取路費後卻待在香港不走。《福漢會調查備忘錄》中還提到，福漢會成員中許多都吸食鴉片，正因為吸食鴉片需要錢，才有這麼多人蒙騙郭士立。這次調查揭露許多福漢會的虛假情形。委員會將調查結果印了 100 份，寄到歐洲散發，1850 年 4 月，這份紀錄開始在歐洲流傳。

郭士立為了反駁福漢會的調查結果，便將過去的福漢會會員重新召集在一起，以從中蒐尋可推翻調查結果的證據。他找到 30 個曾經承認自己有過錯的福漢會成員，這些人聲稱自己遭到韓山文威脅承認自己從未犯過的錯誤。¹⁸⁹郭士立將這些說詞公佈於歐洲社會，企圖證明韓山文、理雅各等人的行為乃屬偏見。1851 年 8 月 9 日郭士立去世後，他的遺孀朵拉·嘉必麗兒(Dora Gabriel)和巴陵會(Berlin

¹⁸⁷ 吳義雄，《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頁 91。

¹⁸⁸ 前引書，頁 93。

¹⁸⁹ 前引書，頁 96。

Missionary Society)的那文(Robert Neuman)還想將福漢會維持下去。但福漢會失去郭士立這位有力的創始者後，終於在 1855 年終止了會務活動。

小結

郭士立十九歲已學習荷蘭語、英語、波斯語，展現驚人的語言能力。他在求學時代努力好學，有極大的求知慾。或許因為自己知識豐富，語言能力高人一等，他有些恃才傲物，與同學間關係不甚融洽，這種性格也反映在他日後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上。郭士立在柏林傳教協會求學時就對中國產生好奇心，1825 年在倫敦結識了馬禮遜與其他新教傳教士，閱讀馬禮遜所帶回的中國書籍。當荷蘭傳教協會不願意送他到中國時，他在 1828 年脫離荷蘭傳教協會開始獨立傳教。1826 到 1831 年間郭士立在南洋地區傳教，學習到麥都思的傳教方式—唱詩歌、以儒家經典來比擬基督教教義，這成為郭士立到中國後的主要傳教方式。

1831 到 1833 年郭士立在中國沿海地區活動，實地與中國平民接觸，他筆下的中國百姓相當貧窮但卻樂觀，總是熱情招待郭士立一群人。郭士立一行人每到一座城市總會遭受中國官府驅趕，郭士立嘗試與中國官員說理，但是中國官員只想盡快驅離他們。郭士立的阿美士德號之行洞察到中國海防實力薄弱，在上海，中國官方對阿美士德號開火卻失勢，更加顯示中國不堪一擊。1833 年到鴉片戰爭期間，郭士立的角色是非常多元的。他替英國茶葉公司到中國產茶區蒐集種茶資訊，1834 年照顧遇難的日本水手，後又將他們護送回日本。鴉片戰爭期間，郭士立擔任義律翻譯、定海知縣，1843 年擔任香港撫華道，勸說香港英政府投資學校教育。1844 年後，郭士立全力投注於成立「福漢會」，他希望訓練中國人向中國人傳道，這在當時的中國是創舉。不過，或許郭士立過於求取快速出現傳教成效，福漢會在成立不久就遭人質疑。福漢會的人數、成員素質、活動範圍、傳教成果…等都有許多疑點。郭士立在 1851 年去世，享年只有 49 歲，雖然人生短暫，但是卻有豐富經歷。

學者對郭士立此人的評價各有不同。中國學者普遍將郭士立定位為「十九世紀初英國侵略軍的幫兇」，他們認為「外國資本主義之所以能夠打開中國大門，與他們所派的傳教士作為先遣隊有密切關係」，¹⁹⁰而其中郭士立正是先遣隊的「首要人物」。¹⁹¹中國學者也特別關注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在鴉片戰爭前後所扮演的角色，指出郭士立在《南京條約》簽約時，為英國政府爭取到比原計畫更多的特權與賠款，¹⁹²傳教士的活動是十九世紀前期「西方殖民者侵略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¹⁹³魯珍晞在著作裡的結論，認為郭士立可被視為一位「商人與傳教士的

¹⁹⁰ 陳虹，〈郭實獵評傳〉，《圖書館雜誌》，2004 年第 5 期，頁 75。

¹⁹¹ 前引文，頁 75。

¹⁹² 胡曉琴，〈鴉片戰爭時期西方傳教士的在華活動〉，《黔東南民族師專學報》，2001 年 8 月第 19 卷第 4 期，頁 14。

¹⁹³ 前引文，頁 14。

合體化身」¹⁹⁴他也提出問題讓讀者自己思考，郭士立到底是「一位牧師還是一位侵略者？一位天才還是一位吹噓者？」¹⁹⁵學者們給予郭士立不同的評價，是針對郭士立不同的角色、職位所下定論。若是由郭士立自己的言論來看，是否會有不同的定位？本文在第三章到第五章中，要藉由討論郭士立本身著作，探討郭士立如何向當時西方介紹中國，他所介紹的中國是屬於「真實」者多？或屬於「虛構」者多？若為「真實」者多，郭士立便可說是一位具有真知灼見的中國通，那麼，稱他是一位天才也不為過；若為「虛構」者多，是否又真如魯珍晞的提問——是一位「吹噓者」呢？而郭士立又為什麼要做出這些「虛構」，也是以下章節將嘗試探討的內容。

¹⁹⁴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p. 316.

¹⁹⁵ 前引書，頁 294，標題。

郭士立生平重要大事表：

時間	年紀	大事紀要	影響	備註
1803	1	出生		
1811	8	在普魯士比列茲鎮拉丁學校學習各學科。		①
1816	13	到普魯士斯德丁省學工藝。得到巴色會期刊。	產生當傳教士的想法。	②
1821	18	得到威廉三世資助，到柏林傑尼克傳教協會念書。		③
1822	19	與哈雷大學語言學教授學習波斯語、英語、荷蘭語。		④
1823	20	到鹿特丹的荷蘭傳教協會中學念書。		⑤
1825	22	到倫敦傳教協會。結識馬禮遜。	馬禮遜將中文書籍捐贈給所設立的原住民協會。郭士立閱讀馬禮遜所帶來的中文書。郭士立第一任妻子瑪麗·尼威爾即是此機構學生。	⑥
1826	23	受荷蘭傳教協會指派加爾各答。	和麥都思特共同傳教，學習他的傳教方式。從此開始學習閩南語、客家話、泰文。	⑦
1827	24	受荷蘭傳教協會指派去新加坡。在新加坡入籍福建同安郭氏宗祠。	開始以中文名字稱呼自己。	⑧
1828	25	脫離荷蘭傳教協會(因協會不願送郭士立去荷蘭傳教)。1828-1831 年間遊歷泰國、越南、新加坡等地。	接觸許多中國商人，加深對中國的好奇。	⑨
1829	26	到新加坡英華書院從事翻譯聖經工作。與瑪麗·尼威爾結婚。		⑩
1831	28	尼威爾難產過世。郭士立搭乘順利號前往中國沿岸航行。		⑪
1832	29	搭乘阿美士德號、汽精號航行。		⑫

1834	31	搭乘仙女號前往福建尋找茶葉種子。在澳門照顧受遭受船難的日本水手，並學習日文。與瑪麗・溫斯托結婚(溫斯托在 1849 年過世)。		⑬
1835	33	擔任英軍翻譯(到 1843 年)。		⑭
1837	35	護送日本水手東京。		⑮
1839	37	擔任義律翻譯。		⑯
1842	40	擔任定海知縣。		⑰
1843	41	擔任香港撫華道。		⑱
1844	42	創立福漢會。		⑲
1849	47	回歐洲。	將中國經驗向歐洲人宣傳，並在歐洲出版宣傳刊物，鼓勵歐洲傳教士到中國傳教。	⑳
1850	48	福漢會遭受調查。與第三任妻子朵拉・嘉必麗兒結婚。		㉑
1851	49	回香港。病逝。		㉒

資料來源：

1. 出自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u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一書者有：
備註①頁 19、②頁 20、③頁 21、④頁 29、⑤頁 31、⑥頁 33、⑦頁 35、
⑧頁 41、⑨頁 41、⑩頁 48、⑪頁 50、⑬頁 83、⑭頁 99、⑮頁 94、⑯頁
99、⑰頁 104、⑱頁 110、⑲頁 222、㉑頁 231。
2. 備註⑫出自 Karl Friedrich August Gu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頁 154、416。
3. 出自吳義雄，《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文集》，臺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一書者有：備註㉑頁 90、備註㉒頁 96。

第三章 郭士立眼中的中國政治與經濟

郭士立 1838 年在倫敦出版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n the Chinese Empire*. 是十九世紀前半段到中國的西方人著作當中，少數對中國具有全面性描述的作品。馬士¹⁹⁶在他代表性著作《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中多次引用郭士立資料，¹⁹⁷而費正清自述許多新的研究都是建立在馬士的基礎上。¹⁹⁸可見此書是西方學者在認識中國、敘述中國時重要的一手史料。身為早期基督新教到中國的傳教士，郭士立對中國的認識，某部分來自先前西方人對中國的描述，某部分來自親眼所見親耳所聞。郭士立筆下所寫出的中國風貌，會左右十九世紀前期西方人對中國的理解。本章第一節裡，要從此書內容探討郭士立對中國政治制度的認識，中國政治特色是以皇帝為中心運轉。在郭士立眼中，中國官署的設置與運作必須以「維護皇權」為宗旨，而缺乏考慮人民的權利，不像西方國家人民可在國會、議會中為自己發聲。第二節則討論郭士立如何敘述中國內部經濟運作，以及對外貿易情況，郭士立認為，中國百姓積極求取財富，地方官府也了解對外貿易的重要性，所以中國將來勢必會開放貿易。

第一節 以皇帝為中心的政治運作

(一) 皇帝的管家—內務府

郭士立筆下的中國政治特色，是以「皇帝」為中心安排各項機構、制度。首先，他觀察到中國皇宮內與皇帝日常起居關係最緊密的機構是內務府，他作出如下描述：

內務府所有官員都是高層官員，也是皇帝的親信。政府官員大多要在皇宮裡的這些機構待一陣子，以學習應對進退，他們必須當一個值得信任的

¹⁹⁶ 馬士，或譯作摩爾斯(Hosea Ballou Mourse, 1855-1934)，原籍美國，1874 年從美國哈佛大學畢業，同年考入中國海關，到上海學習漢語，此後擔任中國多項職務，1877 年出任中國天津海關幫辦，隨後又擔任過北京總稅務司、京師同文館英文教習、上海副稅務司、海關總稅務司統計秘書。1909 年退休後到英國劍橋大學附近居住，1917 年入籍英國。除了《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之外，還有《中國貨幣考》(1906)、《中國制度考》(1908)、《中國公行考》(1909)、《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編年史(1635-1834)》(1926-1929)、《太平天國紀事》(1927)、《遠東國際關係史》(1928)。見張匯文、楊智信等譯，馬士著，《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¹⁹⁷ 《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共三卷。第一卷(1834-1860 年衝突時期)出版於 1910 年，第二卷(1861-1893 年屈服時期)和第三卷(1894-1911 年被征服時期)出版於 1918 年。其中第一卷在介紹中國保商制度下外國商船到中國須繳納的引水費、船鈔、各項規費，都引用到郭士立《開放中的中國》書中數據，見頁 84、88、89。

¹⁹⁸ 費正清，《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頁 37。

人。由於內務府是最近皇帝身邊的人，若是他們洩漏機密，皇帝就會有危險。1813 年的叛亂之所以能深入皇宮，造成皇帝威脅，應是內務府內有奸細。法庭無法阻絕陰謀，即使是北京宮殿也不能確保安全。內務府有一個五百七十人的機構，專門負責保護皇室成員。這機構有最勇敢的士兵，他們都是滿洲武士的後代。首領是皇帝近親，具有高的官階。這些士兵不只待在府邸也會幫忙處理皇帝的家務。¹⁹⁹

中國皇帝在宮中生活由總理內務大臣掌管大小事宜，當皇帝要出宮時，鑾儀衛必須保護他的安危、提供所需用品：

鑾儀衛(Lwan-e-wei)負責天子交通時的裝備，不會少於一百三十個成員，因為這是個重要的責任。皇帝的權威延伸廣泛。皇帝出巡時，陣仗就像是一座小型宮殿在移動，而非只是一列皇家衛隊而已。這就像是蒙古人的傳統，這個小朝廷不只提供軍旗、軍隊、住處、行李給這次遊覽，還會提供地毯、廚房、其他小東西…。所有皇室成員要用到的都由鑾儀衛準備。這個組織的成員很細，階級有大小，地位高低之分。²⁰⁰

皇帝出巡時時要使用的馬匹，郭士立指出由太僕寺供應：「另一個類似鑾儀衛的組織叫太僕寺(Tae-puh-she)，它提供所需馬和駱駝給皇帝。」²⁰¹然太僕寺在雍正年間從兵部獨立出來，掌管牧馬場之政令，皇室用馬主要是由內務府上駟院管理。²⁰²郭士立提到上駟院：

上駟院(Shang-sze-yuen)是另一個部門，專門照顧皇室馬匹，功能比我們想像還多。滿洲人喜愛他們的馬匹。馬帶領他們在原始家鄉渡過單調生活，使他們可以打仗，使他們可以快速攻破明朝，征服整個中國。雖然這些動物小又不起眼，但很強壯，適合在滿洲生活。大約有七十頭是皇帝私人用，一千頭是戰爭用，兩百頭用來拉敞篷雙輪馬車。皇帝有最大的馬，每年都會特別選進皇宮的馬。除非蒙古首領聽從帝國命令，否則是不能呈上「馬」這種供品的。他的家人和獲勝馬匹常會得到獵狗，外國王子也以得到獵狗作為受喜愛的象徵。馬伕的角色很多元，可待在騎兵部隊中，或專門控管馬勒與鞍座。²⁰³

鑾儀衛管皇帝鹵簿，太僕寺管生產馬匹的場所，而上駟院主管飼養、照顧、調度皇室用馬匹。²⁰⁴因此郭士立說鑾儀衛與太僕寺的工作內容相似並不正確。

¹⁹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319.郭士立所說 1813 年發生的叛亂，應是指嘉慶十八年(1813)天理教徒攻入北京城一事。

²⁰⁰前引書，頁 320。

²⁰¹前引書，頁 321。

²⁰²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臺北：商鼎文化，1999，頁 117。

²⁰³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315.

²⁰⁴古鴻廷，《清代官制研究》，臺北：五南，2005，頁 139。

郭士立觀察到「祭祀」是皇帝年度重要工作，籌辦祭典負責的機構有太常寺、鴻臚寺與光祿寺，辦理祭典主要原因是皇帝有責任為國家農業祈求豐收：

太常寺(Tae-chang-sze)專門負責祭祀儀式，在祭品中，必須分別提供九十、六十、三十天大的牛，並準備不同的湯和菜去祭祀偶像。在祭祀當天，太常寺要安排皇帝或他的代理人去維修神像，祈求的儀式中要把祝禱詞大聲背誦出來。天子要在祭祀儀式中祈求國家農業順利發展，祈求上天在適當季節降雨。皇帝每年會選一個良辰吉日穿上龍袍向天祈雨，希望藉由這至高無上者的祈求得到糧食。希望他的祈求可為人民帶來風調雨順，那麼人民就可以多種植小米和玉米，農業產量便會更加豐盛。太常寺成員在祭祀場合會穿著刺繡有龍的衣服，他們要不是自己主持祭祀，就是管理僧徒。為此目的，他們會準備豐盛的宴會並淨身。在其他方面，所有其餘成員都有負責的工作。雖然這些成員都是帝國的親信，但他們也不能多說什麼。

鴻臚寺(Hung-loo-sze)在祭典時也像是儀式的主持人。就像儀仗官一樣，他們必須下命令起立、下跪、拜倒。為了區分這些艱鉅的任務，有一群內務府官被指定學習這些東西。沒看過這種跪拜儀式的人可能會聯想到波斯軍隊。光祿寺(Kwang-luh-sze)負責在宴會或是祭祀場合煮飯。²⁰⁵

上述三段史料裡，郭士立提到與祭祀典禮有關的三個機構是「太常寺」、「鴻臚寺」、「光祿寺」，不過，太常寺與鴻臚寺所掌管的祭典有所不同。太常寺主掌宗廟禮儀、國學事、選試，鴻臚寺主掌藩客朝會、吉凶弔祭，這點郭士立並未作區分。且太常寺成員應不能穿著繡有「龍」的衣服。²⁰⁶

郭士立認為中國人是非常重視儀式的民族，在舉辦祭典時有一套複雜的儀式，必須重複下跪，在覲見皇帝時也如此：

中國文人宣稱，若沒有「儀式」，那合宜的規矩就無法建立起來。藉由儀式，帝國可以規律的運轉。人們變得文明，社會更加鞏固，人民也會更和平喜悅。受到所有國人景仰的皇帝，更須要在他的房子裡謹慎地執行儀式。為此目的，他在朝廷裡設「掌儀司(Chang-e-sze)」，以規範他的家規，並教導規矩。共有一百三十七位成員專門維持不同的禮儀。最重要的責任，是去照顧皇帝在太廟裡的四十位祖先。中國官員必須熟悉三跪九叩，但我們是不會重複鞠躬、下跪磕頭的。想必中國官員的頭蓋骨是非常厚，才可承受一天中磕頭這麼多次。掌儀司也會準備皇帝的飯食、公開活動，

²⁰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323.

²⁰⁶ 王文權，〈清朝官服補子研究〉，《學術探索》，2012年1月，頁133裡提到「清朝官服補子紋樣區分官員等級有十級。文官補子紋樣一品官為仙鶴，二品官為錦鳩，三品官為孔雀，四品官為雪雁，五品官為白鸛，六品官為鸞鷟，七品官為紫鴛鴦，八品官為鸂鶒，九品官為絲雀，未入流的為黃鸝。武官補子紋樣一品官為麒麟，二品官為獅子，三品官為豹子，四品官為老虎，五品官為熊，六品官為彪，七品官為犀牛，八品官為犀牛，九品官為海馬，未入流的為獬豸。」可見除了皇帝補子可為「龍」外，其他官員身上是不能穿著繡有「龍」圖案的衣服。

安排與蒙古王子、高階官員往來、邀請外國大使。²⁰⁷

要詳細描述招待客人時的泡茶細節、擺盤細節實在太複雜。當有皇室成員要結婚時，掌儀司會準備婚禮所須。所有女眷在宴會場合都會下跪磕頭。掌儀司深受皇室內部成員信任，這些官員要負責提供最好的膳宿。他們住在豪華的屋舍裡，有華麗的屋頂、鑲金的地毯、鏤空的傢具，都閃爍著金光。這個機構也設有學校以教導中文和滿文。另外，也設有醫藥部門，有十二個化學家和十二個藥劑師。²⁰⁸

上述兩段文字中，郭士立寫出無論在祭祀或宴會中，最不可或缺的儀式就是跪拜磕頭，他對於這項儀式相當不以為然，強調「『我們』是不會這樣下跪磕頭的，但中國人卻須要。」²⁰⁹他認為中國人過於注重外在禮儀，卻忽視內涵。

郭士立在敘述完中國宮中儀式後，他認為中國朝廷過於忽略「教育」，中國朝廷百官應該多關心中國的教育，而教育的內容不該只是學習語文，應該要學習「科學」：

若沒有任何教育機構，朝廷會顯得很野蠻。一個自認是地球上唯一文明的民族，並想領導世界的民族，必須發展科學。一個如此大的帝國必須成為學習領導人。比起維持儀式和權力，教育實在是被輕忽了。國子監是給功臣後代或滿洲貴族受教育處。為了未來工作，他們要學中文、滿文、蒙古文，中文是固定不變的課程，其他東西就很少了。²¹⁰

他在書中反問中國人：「我們把問題留給中國人——儀式真的比較重要嗎？」²¹¹

(二)皇帝的財產

郭士立描述皇帝擁有許多園林、珍奇異寶、武器、來自其他民族的貢品。：

皇帝擁有很多花園和果園，這些地方的出產物都會運進皇宮。所有皇室用奢侈品會存在一個房間中，有官員管理並清點。這房間的四周掛滿古玩照，收藏所有朝代的古物。不須懷疑這裡有世界上最珍貴的寶物，珍藏非常久，特別是珍珠和珍貴寶石。藩國使節把珍寶帶來進貢，同樣也會拿回一批珍寶。有一群工匠總是辛苦地製作這些寶物。²¹²皇帝的公園非常遼闊，由自然景觀所區隔，其中會有人造湖、河、石頭、山。最著名者有圓明園、南園…照顧這些園林的人都是高階官員。²¹³皇帝在長城外還有一大批牛羊、奢華的牧場。可供他使用或其他祭祀目的。皇帝有自己的軍火庫。

²⁰⁷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317.

²⁰⁸ 前引書，頁 318。

²⁰⁹ 前引書，頁 317。

²¹⁰ 前引書，頁 324。

²¹¹ 前引書，頁 318。

²¹² 前引書，頁 316。

²¹³ 前引書，頁 317。郭士立說到照顧園林者是高階官員，原文「They are men of high rank.」他沒說明「高階官員」的職位名稱是什麼。

有工匠在製作新武器、維護舊武器。我們必須忘記中國近代的統治是來自放牧民族，他們也以此為傲。皇帝會從其他放牧部落得到貢品，有的來自女兒所嫁的蒙古部落，有的來自其他民族。²¹⁴

郭士立描述中國皇帝可以任意使用國庫錢財：

中國的歲收可分作三部分用途：皇帝使用、國庫使用、地方省分使用。皇帝的財富放在皇宮中，是皇帝這個獨裁者可以直接處理的。中國皇帝的財富遠比世界上任何統治者多。身為掌控整個中國的征服者，皇帝不須對任何人負責，他可以積聚自己所想要的財富，他不須自掏腰包付薪水給官員，而是偶爾獎賞他們。皇帝的財產從不曾清楚公開有多少。我們發現到，國庫有一部分錢財是提供皇帝各人使用。皇帝想對外擴張時，使用國庫經費，他有特權想用多少就用多少，他的家人、八旗都是他慷慨花用的對象，他也把錢花在供養演員、戲班上面。²¹⁵

(三)皇帝的士兵

皇帝所擁有士兵數量很多，他記載：

禁衛隊的數量，有 23122 個步兵，3000 個騎兵，共分為三隊。屬於黃旗，駐守在首都、圓明園、界河一帶。每一旅包含五個指揮官、射箭手 514 人。裝有滑膛槍的下士共 192 人。普通士兵共 1920 人；射箭手、騎兵共 256 人；炮兵、海軍侍衛共 40 人，列兵 440 人。然而，中國的騎兵和我們的騎兵很不同。中國騎兵仍使用弓箭多於使用火繩槍。這些騎兵善長射箭術，一個月薪俸只有一兩、三斗米。他們主要的生活來源並非薪資，而是來自出租自己的土地與馬匹。土地與馬匹是皇帝給他們的永久性財產。²¹⁶

此段文字中，郭士立說禁衛隊屬於「黃旗」，應是不正確的。楊玉良指出，清代北京城防守工作，是以「八旗步軍負責防守內城，依八旗方位分汛駐防」，²¹⁷其中「正黃旗在德勝門內」、「鑲黃旗在安定門內」，²¹⁸圓明園是由「巡捕五營馬步」防守，²¹⁹其他各旗也都有自己的防守區域。可見，郭士立不瞭解「黃旗」是區分為「正黃旗」和「鑲黃旗」，而整個京城的防備是由八旗步軍和巡捕五營馬步共同負責。

郭士立說，士兵工作內容除了維護宮廷安全外，還必須外出打獵，這與當時

²¹⁴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314.

²¹⁵ 前引書，頁 394。

²¹⁶ 前引書，頁 313。「屬於黃旗」原文：「...belonging to the yellow imperial banners.」；「滑膛槍」原文「musketeers」。

²¹⁷ 楊玉良，〈清代北京城的警備機關一步軍統領衙門及《白塔信炮章程》〉，《紫禁城》，1996 年第 1 期，頁 19。

²¹⁸ 前引文，頁 19。

²¹⁹ 前引文，頁 19。

西方對軍隊的要求相當不同：

侍衛須防守宮女閨房、帝王墳墓。為王室餐桌添加不同的小點心——例如鵪鶉、野雞肉、鹿肉、蜂蜜……甚至是珍珠、狐狸毛等。因此他們進入到滿洲地區，扮演獵人、漁夫，帶回水果及特產，為了避免他們偷懶，每個人都被要求要進獻一定數量，數量若沒達到會被當作偷懶。這些要求在我們國家會被認為是削弱戰鬥力。但是在中國，把士兵操得疲憊一點會比讓他們維持戰鬥力好。²²⁰

郭士立眼中的中國士兵像是皇帝的家僕，比起增強體能或戰技，維持對皇帝的「忠誠」才是最重要的。士兵的「戰鬥力」太強，可能對皇帝造成威脅。中國皇帝不僅要防範軍隊叛變，也要防範政府機關中出現專權現像。郭士立將中國士兵與羅馬禁衛軍作比較，中國士兵顯然是安分守己多了：

他們不像羅馬禁衛軍那樣無法無天的操控皇帝。他們是如此審慎膽小，不敢大聲喧鬧。相反地，他們的行為是保守到難以注意，以致於比起他們的行動，忠誠穩定會更令人重視。²²¹

不僅士兵要小心翼翼避免涉嫌反叛中國皇帝，中國官員也須謹守本分，不可讓自己成為皇帝眼中尾大不掉之份子。比郭士立稍晚到中國的衛三畏更進一步說明連「官員」在官場上都不可過度露出鋒芒的情況：

官員在年輕時就受到教育，如何尊敬統治者；現在他們有了地位，他們懂得做個小心謹慎、忠實正直的地方官會得到獎勵和提升，經驗表明，安定節儉是好政府的目的和證據，是他們職稱的最佳考驗。²²²

衛三畏還提到，中國法律規定官員不可在家鄉任職，這是為了避免官員在家鄉的地方勢力擴大，造成朝廷的威脅：

其中一項規定是禁止官員在家鄉省份任職的法律，除了足以阻止最有可能成功的陰謀之外，還可以使所有謀取官職的人集中到北京，他們來這裡總是希望得到一官半職，或是在科舉考試中取得最高的學銜。再者，不允許官員在自己管轄的地區以內締結婚姻，也不能擁有土地，他的兒子、兄弟或近親都不許在他的手下工作。²²³

在此可發現郭士立、衛三畏都認為中國的官員、士兵必須小心謹慎、注意自己言行，不可出現疑似反叛的舉動。

(四)頭銜與賞賜

得到中國皇帝賜與「頭銜」是相當榮耀的事情，無論官員或百姓，甚至是外民族都會希望得到這種賞賜：

²²⁰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314.這裡郭士立談到的士兵原文使用「soldiers」。

²²¹前引書，頁320。

²²²衛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392。

²²³前引書，頁313。

「頭銜」被用來當軍事獎賞。一個軍官只要拿下一座城池，就可以得到一個封號。為國捐軀的後代、把女兒嫁入皇室，成為皇室一族成員，或是明朝遺留下的世家大族，都可以得到榮耀。²²⁴政府會給耆老、守貞寡婦，孝子頭銜。雖然這些頭銜無法加註在他們的名字前面，但會受到同伴的讚賞。在某些節慶或皇帝大壽上，皇帝會為某些軍隊士兵或其他人再加封爵，以使他們永遠記得天子。軍官的兒子會繼承父親的榮耀，但只有父親本身會贏得別人的感激，其他則要靠自己爭取。住在中國山區的首領被叫做土官，按照中國政府對他們的信任程度不同，會受封不同尊號。他們上任後的責任，是必須維持一個部落不致引起騷動。²²⁵

郭士立注意到中國有「買官」的傳統：

有些士紳關心自己親屬未來的社會地位，會用錢去買官銜(rank)，以使自己地位鞏固。當官銜拿到手，過去是平民的人馬上會受到尊敬。這是個很實際的傳統，甚至過去羅馬也有。²²⁶

郭士立也發現到，皇帝所加封的頭銜中，通常會稱讚受封者具有「忠誠」「勇敢」的特質，受到這種加封的人會立刻提升身價：²²⁷

沒有什麼會使外國人更訝異已逝世者還可被封為貴族。假如有任何官員對自己的國家很忠誠，皇帝送他的一兩個頭銜當中會追封到他的前四代祖先。按照中國法律規定，第二、三階的貴族可封他們的父母輩、祖父母輩，而第一階官員才可封他們的曾祖父母輩。²²⁸

受到皇帝加封頭銜是相當榮耀的事情，不過，在中國，最受尊敬的家族，是孔子、孟子等儒家聖賢的後代——這點為中國人有共同默契所承認。²²⁹

從郭士立對中國政治制度、官署機構的描述中，可找到其中心思想：中國的政治是完全圍繞著「皇帝」運作。十九世紀後期到中國的西方人馬士也有此觀點：

清廷的大臣們只就各地奏報的措施加以批准或駁斥，並對各督撫所建議的政策加以贊助或否決，就自以為心安理得。這種東方式的制度乃是一種節制制度，它的目的的一方面是要維護這以聚斂為務的異族朝代並防範他們的漢族官吏，另一方面是要防範過分獨立的趨向，這是一個東方統治者所最害怕的。²³⁰

郭士立、馬士都發現到，中國皇帝的臣屬不須要對政治有太多想法，也不須要向皇帝提出太多建言，以免被懷疑有反叛之心。皇帝冊封頭銜、操控軍隊時，基本立場都是維護至高無上的皇權，這是「東方」國家的特色。

²²⁴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310.

²²⁵前引書，頁312。「土官」原文「too-kwan」。

²²⁶前引書，頁311。郭士立此處並未說明是在羅馬王政時期、共和時期或帝國時期。

²²⁷前引書，頁310。

²²⁸前引書，頁311。

²²⁹前引書，頁311。

²³⁰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頁6-7。

郭士立對中國政治的看法是，中國政體以「皇帝」一人為中心做運轉，皇帝底下的官員、士兵都必須表明自己是忠誠的。衛三畏比郭士立更進一步地瞭解到，中國的皇帝制度與宗法倫理互相結合，皇帝相當於「父」，官員相當於「子」，皇帝與官員之間存在著「父子關係」，因此官員忠誠也代表遵守孝道，中國政治存在著「忠」、「孝」倫理，所以中國政體才能長期處於安穩狀態：

中國的政治理論與實踐理想的思考引起學者的重視，有若干特殊原因，諸如眾所周知的歷史悠久、人口眾多、國民享有相對安謐等方面的因素。這個非基督教的國家，其政府在這樣大的程度上基於執政者個人品格而更改，人民這樣傾向於將機構和個人混而為一，其中緣故，或者是人們對這些機構的性質不完全瞭解，或者由於需要和習慣，人們輕易地被有計謀、有力量的人所領導和左右；中國政體的長期延續，證明瞭它適應於人民的習慣和條件，也證明瞭它的治理一般說來還是可以的。然而，這樣的政府既歷史悠久，而又幹練卓越，有秩序的行政管理可以遠達中國境界以外，並沒有因龐大的人口以其生命、財產、給養和安全在極大程度上繫於其上，而對他們的利益有所關懷。看到決策失誤所造成的不幸結果，或公正的治理而帶來的有益影響，都是如此重大，我們最初懷有的好奇感覺，逐漸變成敬畏心理。中國政治理論無疑是宗法的；皇帝是父，他派出的官員就是省、地區、縣的父母官，就像他治下的每一戶的父親一樣。也許這也可以是其他政府所持的理論，但是沒有一個地方像中國這樣系統地始終如一地貫徹了這麼長的時間。有兩個原因交互地發生作用，使這一理論保持有效。²³¹

衛三畏進一步討論為什麼中國人民總是「安份守己」。他說中國政府是專制的、具有軍事性質，人民之所以安分守法是因為政府實行連坐法用以威嚇人民：

中國政府有如此精密的等級制和官員的服從性，使政府具有一種軍事的性質，這比最初觀察要強烈的多；整個制度是現存的最純粹的專制制度之一。它像一張大網籠罩在整個社會的表面上，每個人在他自己的兩眼中都是孤立的，可是又和他周圍所有的人在責任上是連繫在一起。人們知道，除非離群索居，否則不可能擺脫政府的密探或公開警員的跟隨。切不可連犯國家法律，否則，即使自己逃跑，家屬、親戚、鄰居都要受牽累；如果不能給受害者以補償，他一旦回家就非常危險；他還會發現，財產已在鄰人或官員手中，大家覺得，掠奪一個違法犯禁的人是合乎情理的。²³²

而中國政府因為實施連坐法造成人民極大畏懼，人民只有遠離政治，不參與政治才能確保能安穩度日：

敬而遠之才能得到安全。這種互相監督和互相承擔責任，雖然在人民大眾中涉及一部分，但必然破壞了信任的原則，形成了普遍的互不相信；完全的孤立，雖然付出了公道、真理、誠實、自然情感作為代價，這畢竟就是

²³¹ 衛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69。

²³² 前引書，頁271。

政府實現的目標，而且的確做到了令人驚奇的程度。²³³
中國人心中對政府的恐懼，會抵消中國人真正的活力

導致他們不關心任何進步，滿足於已知和己有的事物，屈從於可能落在個人身上的一些不公平和損害。人們因互不信任而擔驚受怕，就像害怕衙役一樣，他們不可能以明智的方式聯合起來反抗政府違背公平原則而進行的壓榨。…中國和亞洲其他國家都不會發生這樣的事情。他們具怕非法社會，怕的是為首者按同一原則採用的殘酷行為施行到變節者或受懷疑的成員身上，就像害怕官方進行逮捕懲辦一樣。²³⁴

衛三畏對中國政治的觀察，可以說是延續了郭士立對中國皇帝的觀察。郭士立認為中國皇帝是中國政治運作中心，可以任意使用國庫錢財、利用賞賜頭銜來樹立至高無上的地位，官員與士兵都要極力避免做出威脅皇權之事。衛三畏更深入地觀察到，皇帝與官員間存在「父子關係」，所以官員對皇帝「盡忠」就相當於在「盡孝」。即使宗法倫理導致中國政體能穩固存在，但是衛三畏對於這樣的宗法倫理是不認同的，他批評中國這種政治特色只會造成百姓機械性地順從國家：

中國的制度是專制的，有其缺陷，它建立在錯誤原則的基礎之上。這些制度可以說有穩定的因素，但沒有改進的因素。宗法理論不會使人尊嚴、誠實、仁慈；不會使婦女有應得的地位，也不會教育所有階級對上帝承擔義務；對這些懂得人類心中罪惡情欲力量的人們來說，這樣一個龐大的人類集體卻沒有變得更壞，倒是令人奇怪的。真的，我們有必要審視這一組織結構，來找出其穩定性的原因，既不是靠一支常備軍進行強制，也不是靠國家機器使人們順從。簡要的探討可以說明目前中國政府藉以維持對人民的統治有其重大指導原則，這就是對一切階級實行嚴格監督和互相承擔責任的制度。由於這一國家在地理上的孤立，對自己歷史有著突出的自豪感，還加上政治教育和官員考試的制度，使上述原則更有效。²³⁵

在郭士立、衛三畏眼中，中國政治的特色就是穩固、保守、以皇帝為中心、藉由宗法倫理或者連坐法來規範人民順從政府。但是，如果比較「非傳教士」對中國政治的敘述，卻會發現不同的看法。亨特認為中國有獨特的民主方式，雖然西方有投票選舉制度，但是仍然存在酗酒、鬥毆、賭博等惡行，中國雖然沒有選舉制度，但人民卻也安份守己，順從地接受中國官府統治，如果地方上發生人民反叛事件，那地方官府會被追究責任，因此中國官員不能在地方上任意實施暴政，亨特認為這也是一種「民主」：

對他們來說，帝國政府任命地方官或任何別的長官來統治他們，是天經地義的事情。這使他們得以避免產生在西方國家的那些爭鬥、流血、敵意和仇恨；在西方，官員的任命是由公眾投票的結果決定的。他們也同樣避免

²³³ 衛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271。

²³⁴ 前引書，頁 271。

²³⁵ 前引書，頁 271。

了酗酒、鬥毆、賭博這些不雅的現象，這些問題幾乎總是成為選舉手續中必然涉及的。但中國在這一點上面是民主的，即一個官員不能沒有風險地濫用他的權力去違背傳統，或實施暴政；如果那樣做，哪裡發生了反對地方官府的起義，官府這方面也要被追究是否有不公平現象試圖施行苛政。

236

比較郭士立、衛三畏與亨特對中國政治的看法，可以發現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政治是保守、穩固的。中國皇帝與朝廷藉由「宗法倫理」來塑造官員、士兵或者百姓的忠孝觀念，也利用法律來威嚇人民，雖然有助於中國政體的穩固，但這種穩固是建立在人民的恐懼之上，而非人民真正對中國政府心悅誠服。亨特觀察到的中國人民，願意順從朝廷所任命的地方官來統治他們，其根本原因就是傳教士所述：中國人民對官府感到畏懼，不敢對官府有所非議。亨特把這種現象當成「中國式的民主」加以稱讚，是因為他出於商人的身分，希望政局能穩定、從商環境不受影響。只要讓商人能順利做生意，中國政府即使用打壓手段以促成政局穩固，商人也視為「民主」，甚致加以讚賞。

郭士立不是第一個認為中國政治以皇帝為中心作運轉的人，在 *The Chinese Traveller* 書中，談到：

中國人不會質疑皇帝的權力。中國人相信皇帝身負重任，不會濫用權力…
中國人把皇帝視為天子，他是世界上唯一的領導者，他的命令是不可置疑的，他說的話就像神諭。²³⁷

十八世紀末的西方人已經觀察到中國皇帝的至上權力。郭士立對於中國皇帝的認識，也許是承襲自十八世紀後期西方人的觀點。隨著他居住於中國的時間愈久，郭士立對中國皇帝的描述也有所轉變。

郭士立去世後，1852 年在倫敦所出版的《道光皇帝一生—北京皇宮記載中的晚清皇帝》中，就提到「雖然任何人都不能命令中國皇帝，但是皇帝仍必須遵守傳統」²³⁸、「皇帝若打破傳統，可能無法繼續維持身分或者是會遭受到懲罰」。²³⁹「中國皇帝必須傾聽人民的聲音，每個人都有向他闡述的機會。中國皇帝肩上所負擔的責任很重，一個普通農民都比皇帝享有更多自由」。²⁴⁰郭士立身處於中國由閉關到開放的轉變時期，在鴉片戰爭以前，他所認識的中國皇帝高高在上，手中握有軍隊、經濟大權，中國政治運作圍繞皇帝運轉。鴉片戰爭以後，他眼中

²³⁶ 威廉·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臺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3，頁 128。

²³⁷ *The Chinese Traveller* 一書是由「十八世紀經典古籍」資料庫：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簡寫為 ECCO 所搜尋到在 1772 年在倫敦所出版的書，網址是：
<https://huso.stpi.narl.org.tw/husoc/husokm?!!FUNC270>(下載時間：2012.09.08)，作者佚名，其內容編排與郭士立出版的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相似，全面性地介紹中國。此段文字出現於本書第 70 頁。

²³⁸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 with Memorie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52.),p.3.

²³⁹ 前引書，頁 3。

²⁴⁰ 前引書，頁 6。

的中國皇帝是必須服從傳統、傾聽百姓聲音且缺乏自由之人。闕紅柳指出，十九世紀是西方傳教士對中國君主評價由尊敬到蔑視的時代。²⁴¹在十九世紀之前，傳教士筆下的清代君主形象，多是稱職而聖明的。十九世紀時，由於傳教士對宮廷傳教理想逐漸破滅，因此傳教士對中國君主的熱情與期待降低，傳教士開始不斷試圖修正此前的傳教士所苦心建立的清代君主形象。²⁴²郭士立曾期待道光皇帝「能憐憫傳教士所受到不公正的待遇」，²⁴³但後來發現道光皇帝「對傳教士的態度僅止於合乎禮儀而已，缺乏出自肺腑的熱忱」²⁴⁴所以《道光皇帝一生—北京皇宮記載中的晚清皇帝》中所描述的道光皇帝，好似失去自由，也不像先前中國皇帝般享有至高權力。郭士立對「中國皇帝」認識有轉變，應是由於寫作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n the Chinese Empire* 一書時，仍憑藉前人描述來介紹中國。寫作《道光皇帝一生—北京皇宮記載中的晚清皇帝》時，自己已在中國居住多年，發現中國皇帝無法改善傳教環境，對傳教無所助益，中國皇帝並非一位傳教士可以期待、依賴的對象，中國皇帝的權力若無法促使傳教活動更順利，那麼，這種權力便是「虛弱」的。

第二節 開放貿易為時勢所趨

本節裡分別就農業、手工業、內陸貿易、對外貿易探討郭士立對於中國經濟發展的理解。本節中亦探討：郭士立如何描述中西貿易限制情況、中國未來勢必開放貿易。

(一)中國的農業

農業是中國的經濟基礎，郭士立說明中國農業起源甚早：

差不多在中國形成國家時就有農業了。中國人將國家的強盛、經濟發展繁榮、人口繁衍眾多都歸功於「神農氏」這位發明家。神農種出穀物取代了肉食，他告訴人們怎樣耕種。他是非常成功的一位農業藝術家。任何人只要遵循神農氏的方法，都可以成為一位傑出的農夫。²⁴⁵

在中國，所有土地名義上都是皇帝所有：

身為全國百姓政治上的父親，皇帝是個獨裁的老闆，全中國的農夫都是

²⁴¹闕紅柳，〈傳教士眼中的清代君主—以郭實臘《道光皇帝傳》為中心〉，《歷史檔案》，2009年第2期，頁50。

²⁴² 前引文，頁50。

²⁴³ 前引文，頁52。

²⁴⁴ 前引文，頁52。

²⁴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2.原文：「Shin-nung,that celebrated inventor of everything useful and necessary,first substituted grain for raw meat,and taught the nation to cultivate it.」

他的佃戶，他隨時可以沒收田地，再將田地分給他喜歡的人。²⁴⁶
而實際上，田地是祖先傳承下來的家產，必須好好維護：

田地是從父親手中傳承而得。父親去世時會將土地分給所有的兒子。長子在父親葬禮上會盛水清洗父親屍體，因此會分得較多的地。就像所有東方民族一樣，中國人很珍惜傳承自祖先的地產。²⁴⁷

中國人對種植作物有其獨到的天賦與技術，郭士立在著作中寫到中國各地的農產種類、農耕工具、種植方法以及灌溉技術。郭士立認為，中國人非常熱衷耕作，把自己的田地整理地比房子還好，所有與耕田有關的事務都令他讚嘆。²⁴⁸衛三畏也稱讚中國人是世界上最勤勞的民族，可以把崎嶇的山坡地開墾成梯田，懂得如何在山區蓋房屋：

中國人的勤勞不僅使原有的植被到處已為種種作物所取代，他們的辛苦得到了報償，甚至高山也已開墾，梯田幾乎開到山頂上；山上建成了城市，沿著綿延的山峰建起了長城。他們發展一切行業的技藝，無論是農業的或是製造業的技藝，以維持最大量人口的衣食、教育，使人類生色曾輝，並把他們團結在一個統治制度之下。²⁴⁹

郭士立肯定中國的農業發展比其他國家優秀：

相信同樣肥沃的地，在其他國家種出作物的數量不會比在中國所種出的數量多。²⁵⁰

農業既是中國立國基礎，因此「沒有一位皇帝敢不致力推動農業。」²⁵¹郭士立認為中國農業能超越西方農業的主因是：中國有較多的勞動人口——這是西方國家所不可能擁有的條件。²⁵²

從以上討論可得知，十九世紀前期初到中國的基督新教傳教士對於中國農業是相當讚賞的。他們都認為中國人總是辛勤地從事農耕，細心照顧自己的農地。中國人懂得在不同氣候、不同土壤的地區種植適當作物，因此中國各地農作物種類有別。傳教士仔細地觀察中國的農耕用具、肥料、灌溉方式，他們肯定中國的農業發展比西方更加優越。傳教士也嘗試著找出中國農業優於西方的原因，郭士立認為是因為中國人口眾多，從事農耕時人力足夠，因此中國農業能超越西方。郭士立已瞭解，中國人與「土地」之間的情感是既緊密又特殊的。「農田」除了是中國百姓維持生計的財產以外，也是祖先傳承下來的祖產，中國倫理講究孝

²⁴⁶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16.

²⁴⁷前引書，頁 16。

²⁴⁸前引書，頁 12~15。文中「唧筒」原文是「pump」。

²⁴⁹衛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31。

²⁵⁰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15.

²⁵¹前引書，頁 12。

²⁵²前引書，頁 3。

道，所以中國百姓必須維護好家產、祖產，才是對祖先盡孝。郭士立用「中國人口多」來解釋中國農業優於西方的原因，只是很表面的歸因，實際上，他筆下談論到中國人對「土地」的情感，也是中國農業發展良好的原因之一。

(二)中國的手工業

相對於農業優越的發展，郭士立眼中的中國手工業(manufacture)則顯得落後許多：

在歐洲使用的精密工具，若在中國使用會比在其他國家使用造成更多障礙。以前有段時間，中國的手工業是我們學習的對象，但今日時局已變，我們的工業產品已完全超越中國的，換成我們的產品賣到中國了。²⁵³

當一個家庭的耕地無法供應所有成員糧食時，就有部分成員必須當勞工。郭士立認為中國勞工不會遭受歧視，也可以自由選擇自己喜愛的工作：

中國人比其他古民族優越處在於，在任何敘述中都不會把勞工視為可恥的階層，同時，也不像印度有世襲階級。在中國，每個人都可自由選擇合於興趣的工作，也沒有人會因為他的工作而被貶低。²⁵⁴

郭士立採用「labour」來敘述中國勞工。但是在十九世紀前半期，中國還未發展西方現代工業，郭士立所說的中國勞工，應是指從事傳統生產技術的手工業者，而非為資本家聘用、在工廠裡從事機器生產的勞工，較不適合採用「labour」一詞，使用「manufacturer」或許較為恰當。再者，這樣的手工業者還須區分是自由執業，或是受雇於人。若是後者，則清朝法律對受雇者有所歧視。趙剛、陳鍾毅研究清代乾隆二十四年、三十二年、五十三年及嘉慶六年對於雇工人身分的法律修定內容，指出清朝法律視受雇為人執役是一種賤業，應受法律歧視。不過這種歧視是針對職業，只要雇用期滿，即不再受法律歧視。²⁵⁵趙剛、陳鍾毅的研究是從法律角度來說明雇工會遭受歧視。實際上，中國傳統社會風氣重視讀書人，輕視農、工、商人，以「士」排為四民之首，職業有貴賤之分。因此郭士立所說「沒有人會因為他的工作而被貶低」是錯誤的認知。

(三)中國的內陸貿易

郭士立眼中，中國擁有相當優良的「內陸貿易」條件——河運。除了天然的長江、黃河以外，又有運河通達四方：

除了荷蘭外，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內陸航運路線四通八達。黃河、長江及支流遍及整個中國，又有運河連接北京到廣東。河流交錯情況就像葉脈一樣。最繁榮的城市坐落在大河邊，有肥沃的土地和聰明又懂合

²⁵³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3.

²⁵⁴前引書，頁3。

²⁵⁵趙剛、陳鍾毅，《中國經濟制度史論》，臺北：聯經，1986，頁302。其中引用〔大清律輯注〕卷二十：「不過受人雇值，為人執役耳，賤其事而未賤其身。雇值滿日，即與家長亦同凡人。」

作的居民去推動貿易發展。²⁵⁶

中國的京杭大運河成形始於元朝，京杭大運河沿途所流經的重要城市有：大都城（今北京）、通州、海津鎮、淪州、景州、臨清、大名、濟州、徐州、邳州、宿遷、鎮江、丹陽、常州、無錫、平江（即蘇州）、嘉興、杭州等處。²⁵⁷其中最北端城市是元朝的大都，最南端城市是杭州，並未通到廣東。郭士立認為中國是河運發達的國家，而實際上，中國應是南方長江流域具有較好的河運條件，北方的黃河流域仍以陸運為主。郭士立形容中國是一個河運發達的國家，應是因為他足跡所致皆是沿海地區，沒有親自到內陸觀察，他沒有看到中國內陸許多地區是運河或天然河川未流經之處。

郭士立觀察中國北京的貿易情況，發現首都本身是貿易運輸中心，不生產農作物，但有出產手工業產品：

中國主要的貿易原則是，地方省分製造產品，將產品輸出到近海地區有商業發展的城市。首都接收各省輸入的產品，但本身並沒有什麼農產品可輸出。我們是從貿易紀錄本的內容來判斷貿易量，同時也發現到，在北京所收的貨物稅比地方省份還多。首都在很內陸，對其他許多大城市而言，首都算是手工業重鎮，出產玻璃、毛氈、畫、書…。每年都有六千艘運載穀物的船停在這裡，供應首都所需。首都人口食用的肉來自滿洲、蒙古數不清的牛隻。²⁵⁸

此處可看到郭士立對清代首都地理位置的認知值得探討。他定義「很內陸」標準是什麼？北京雖屬於內陸城市，不過比起寧夏、敦煌等地已屬近海，且北京有天津做為它的外港，是否算距離海岸甚遠，郭士立沒說到他的評判標準。而北京既然已屬內陸城市，又如何能讓船隻停留？如果郭士立是指藉由京杭大運河將各地物產運送到北京的船隻，那麼「六千艘船」是非常多的數量，北京是否能讓這麼多的船隻停留也待商榷。

接著，以首都為中心向外擴展，郭士立提到幾個重要的貿易地點：

天津是首都的外港，雖然海河很擠，海灣很淺，仍有很多船隻集結到此處。在貿易季節，海河河面上滿是戎克船，商業活動興盛的狀況實在難以形容。鹽業也以天津為集散地，不僅運到整個直隸省，也運去蒙古和滿洲。這裡有進口糖、棉花、乾木材。每年從商品徵收來的稅收很低，有個明確的紀錄是一年收了六萬八千一百五十六兩稅。政府抽走稅很少，以便吸引更多貿易者到天津。山海關是中國和滿洲之間的中繼站，也是買賣牛、穀物的重要地方。這裡的稅收不會超過百分之三，一年稅收總數約二十二萬

²⁵⁶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28.

²⁵⁷ 陳壁顯編，《中國大運河史》，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頁358。

²⁵⁸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28. 「貿易紀錄本」原文是：「Custom-house book」。

八千零一十三兩，可證明這裡的貿易量很大。蒙古前緣城市，例如延慶州(yen-king-choo)、tsun-hwa-choo等，有沙漠居民在此往來，用羊隻、馬匹、毛皮交換茶葉、木頭、絲織品。遼東最大的城市是錦州(Kin-choo)。它的出口物是品質很好的穀物、豆類。凱州(Kae-choo)比錦州稍小，也出口同樣的貨品。江南帆船每年造訪凱州三次，福建和廣東的快艇每年會到凱州一次。鳳凰(Fung-hwang)是滿洲最邊界的城市。這裡的人民與高麗人做生意，一年有四次市集。為避免商業量過度增加，政府限制只有一定數量的商品可賣到市場。高麗人輸入人參、衣服、毛皮、紙張，再買走中國絲綢、棉布、手工藝品。這裡每年的平均稅額是三千兩百九十四兩。瀋陽(Moukden)是個內陸貿易城市，許多中國人移居那裡和吉林人做生意，這座城市出產毛皮、人參等珍貴物產。²⁵⁹

此段文字開宗明義指出天津是北京外港，也是重要的貿易集散地。郭士立在文中寫到中國政府可以從天津、山海關、凱州抽取多少稅，但是他沒有說明這些稅收數字從何而來，所以這些數字是令人懷疑的。郭士立在此應是想凸顯這些地方商業繁榮，中國商人在這些地方賺錢，中國政府從這些地方收取很多稅，若是外國商人也能到這些地方做生意，那麼也可以預期能賺取很大利潤。

雖然中國河運四通八達，但黃河常有水患，所以重要貿易城市是集中在長江沿岸：

長江是所有季節都可以航行，且長江流過中國的富庶省份。長江附近的城市都被當作貿易商城，住有許多有錢商人和手工業者。但黃河週遭的城市很少大型商業城鎮，因為黃河的河道很陡，附近城市常被淹沒。²⁶⁰

郭士立提到親眼所見上海貿易盛況：

上海位於吳淞江旁邊，距離長江不遠，停在這裡的船隻比其他貿易城鎮數量要多，且與南方省份的貿易比天津更頻繁。輸入上海的主要產品有糖、胡椒、海產、麥、豆子、菸草。輸出者有手工藝品、中國奢侈品。我看過一天之內有三百艘船同時湧進上海港，河面上滿是帆船的景況。²⁶¹

郭士立也提到寧波：

寧波也是座商業城市，但貿易量沒有上海多。每年有許多福建、廣東的船隻到此做生意，他們把南方產品帶進來，也會帶出生絲、棉花、手工製品。最近寧波、定海的貿易量也增加，但寧波畢竟只算是中繼站，絕大多數的商品是賣到上海。²⁶²

福建的情況則是：

福建比起內陸貿易而言，對外貿易更是發達。福州府(Fuh-choo-foo)擁有

²⁵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29-30.

²⁶⁰前引書，頁32。

²⁶¹前引書，頁31。

²⁶²前引書，頁33。

很好的港口條件，因與台灣貿易而發達。它出口木材、菸草、茶葉、竹子，進口棉花、絲織品，製造帆船。貿易量次於澳門。第一次到福建首府的外國人都會對這麼多艘船隻往來此處感到驚訝，並自然地問起這些船隻都販賣什麼東西。這座城市自然條件貧乏，除了鹽、明礬、糖、中國服、乾果外少有東西可以出口。然而，貿易的問題容易解決，福建人會去台灣做生意。福建人會把船開到台灣府、鹿港、淡水、基隆，購買米、糖、樟腦、大麻…等。²⁶³

廣東省也是中國南方重要的貿易省份：

廣東有幾個良港，也有內河航運。廣東省出產米、水果、絲、羊毛、鐵、珍珠、茶葉、檳榔。福建人會把樟腦、糖、菸草、紙、玻璃賣到廣東，買進棉花、油糕、鴉片…等。浙江商人會把生絲、紙、扇、筆、酒精、人造花、刺繡賣進廣東。因此廣東的內陸貿易非常發達。顯然地，廣東商人很少會去其他省分做生意。他們的家鄉就有亞洲最好的貿易市場，在家鄉就有足夠生意可做了。²⁶⁴

郭士立在《三次中國沿岸航行日誌》及《被開放的中國；中華帝國的地形、歷史、風俗、禮儀、藝術、製造品、貿易、文學、宗教、法學等》都有提到北京、天津、上海、寧波、廣東省的貿易情形，而《被開放的中國；中華帝國的地形、歷史、風俗、禮儀、藝術、製造品、貿易、文學、宗教、法學等》一書在敘述中對進出口貨物內容描述更加詳細。除此之外，郭士立還提到其他地區的特產，例如：

江南各省出產的茶葉、生絲、絲織品會輸往各地。山東會接收來自江南地區的水果、毛皮、酒，同時也接收很多歐洲的工藝品以及鴉片。山西出產酒、毛皮、麝香、各種藥。陝西和甘肅都出產金屬和玉石，可提供首都和手工業者所需。廣西出產肉桂、鐵、鉛。貴州則出產金屬、藥，貿易量少。湖南湖北生產大黃、菸草、蜂蜜、大麻。江西出產粗糙的衣服、大麻、藥材。廣西人口較少，雖然可以利用內河航運，但貿易不盛，沒有進口多少東西。雲南和貴州也有相同情況。陝西與甘肅是貧窮地區，除了黃河和淮河外，沒有其他適合航行的內河。陝西是農業地區，出口穀物，手工藝品除了地毯外沒有其他東西。²⁶⁵

郭士立雖然並未到過中國內地，但從他的文章中可發現，他對中國各地區物產有一定程度的了解。

²⁶³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34.

²⁶⁴前引書，頁35。

²⁶⁵前引書，頁35-37。

(四)中國的對外貿易

郭士立在他的著作中描述對外貿易發達的現象：

外國人和中國的貿易最近增加許多。參與對外貿易的城市有廣州、海南島、上海、寧波、澳門…等。所有外國船隻都在這幾座城市出入。這裡的船長和員工不是福建人就是廣東人，沒有其他省分的人。從東京、越南、柬埔寨來的商人大多會買一些中國服、檳榔、米、糖、可哥油、乾木柴、乾魚，把貨物運到上海或天津。由澳門前往馬尼拉每年約有二十艘船往返共兩到三趟。²⁶⁶

但是，這段文字中提到參與對外貿易的城市有廣州、海南島、上海、寧波、澳門…，應與當時實際情況不符。南京條約簽定前，中國只有開放廣州一地可從事對外貿易，外國船隻無法在廣州之外的城市出入，因此，郭士立在此記下的貿易狀況似頗令人質疑。不過，郭士立在文章中，描述中國商船到外地做生意的情況，顯示清廷並未禁止中國商船前往外國貿易。王宏斌研究乾隆二十二年十一月初十日(1757年12月20日)上諭，提出「乾隆皇帝從未下令關閉江、浙、閩三海關」的說法。王宏斌指出：「限制西洋商人在廣州貿易並不等於取消了中國商人在江、浙、閩的出海貿易權」，²⁶⁷江、浙、閩三地出海貿易的人數還是很多。²⁶⁸琉球、日本等「東洋」各國貿易仍來到江、浙、閩三海關，而江、浙、閩三海關自乾隆二十二年後也仍在處理東洋船隻的貿易事項。此段文字中，郭士立說的「外國人」和「外國船隻」，其「外國」確切來講應是指東洋地區，而非「歐、美」等西方人。若郭士立所言的外國人是東洋各國商人，那麼他的描述就是正確的。

在郭士立筆下，中國商人足跡遍及南洋地區，抵達暹羅、新加坡、印尼…等地：

中國人喜歡在葡萄牙或西班牙人的殖民地裡買賣貨物。中國人最大的亞洲貿易對像是暹羅。每年往返廣東福建和暹羅之間的船隻約七十至一百艘。很多暹羅貴族參與貿易，但他們會讓中國人操控帆船、駕駛輕艇，因為中國勞工的工資便宜。新加坡也吸引很多來自上海、澳門、廣東省的船隻，因為新加坡是一個自由港口。新加坡會輸入中國的紙、服裝、雨傘、棉布、生絲、印花棉布、鴉片…等。中國商人去 Banka 和 Palembang 是為了買錫、胡椒、藤杖。有些大船偶爾會拜訪馬加薩(Macassar)和安汶島(Amboina)，和附近的獨立小島做買賣。印尼群島也有很多中國移民，中國移民聚集處會形成一座新城市，這些人的移居目的是挖金礦，與當地原住民格格不入，因此需要當地政府特別保護。雖然印尼與中國的貿易在一千多年前就開始，但從不曾像現在這麼熱絡。中國船以前就會前往波斯灣、錫蘭沿岸探險、買賣貨物，也會把貨物運過紅海抵達亞歷山卓城。這

²⁶⁶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38.

²⁶⁷ 王宏斌，〈乾隆皇帝從未下令關閉江、浙、閩三海關〉，《史學月刊》，2011年第6期，頁43。

²⁶⁸ 前引文，頁44。

樣一趟旅程通常會花費他們兩年時間。明朝時與這些地方的交流本來是很少的，後來由於明朝與蒙古人作戰，使一些移民前往南洋地區。²⁶⁹

中國商人也前往日本地區：

對日貿易是由浙江省乍浦(Cha-po)港出發，共有五艘五百到六百噸重的大船，每三年往來日本五趟，把生絲、糖、銀製品、人參、羽紗(一種輕布料)、銀、歐洲毛衣輸往日本，再從日本帶回銀。銀在中國可用來鑄造刀具。²⁷⁰

除了南洋地區外，中國商人也不畏險阻前往中國西南方做買賣：

中國人會駕駛篷車，越過八座山前往西藏首都。這路商隊可能多達五、六百人，他們用騾子或牛來運貨。中國人將茶葉、粗絲、棉織品、各式各樣的手工藝品、金銀產品帶入西藏。從西藏運回由孟加拉輸入的毛紡織品、印花棉布、孔雀羽毛…等。雲南商人會駕駛篷車，用騾子載運商品前去緬甸。我們試著瞭解中國人的貿易路線，發現滿洲政府會對與貴州、雲南、廣西、湖廣等地原住民的貿易課以重稅。但就算如此，中國人還是會勇於冒險，前往這些南方沼澤濕地，或是前往北方沙漠。只要有錢可賺，中國人都不懼怕危險。即使政府有嘗試阻止，仍無法斷絕中國人對買賣的熱誠。中國商人甚至會買賣人的頭髮、瓜果種子、橘子皮…等奇怪商品。²⁷¹

郭士立筆下的中國商人充滿貿易熱忱，爲了賺錢不懼危難，願意深入不毛之地。

中國與西方國家接觸的情況，郭士立寫到中國最早與西方國家接觸是在漢朝：

在中國邊境荒涼地帶，有些草原民族總是準備好要打劫沒武裝的旅人，他們成為貿易障礙。因此過去中國和羅馬這兩大帝國雖然同時間存在，卻幾乎不曉得對方。後來，漢朝皇帝將觸角伸入到裏海(Caspian sea)，打通了通道，形成一條絲路，才讓這兩個國家有機會彼此認識。但是膽小的中國將軍，在被派去出使大秦的任務卻失敗了，他並沒有抵達裏海，根據他的紀錄，應是抵達波斯。²⁷²

中國人透過絲路將商品—特別是指絲綢，運到中亞地區：

數年來，沙漠商旅表現出的企圖心比羅馬人自己更強盛，他們將絲綢運到中亞去賣。絲綢是奢侈品，一磅的絲綢約可賣到十盎司金子，只有最富有的羅馬女人才能穿絲織品。有些中亞地區商人越過喜瑪拉雅山和西藏，在印度留下，等待來自紅海的船艦。²⁷³

他也寫到唐朝時景教教士前往中國的情況：

²⁶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39-41.

²⁷⁰前引書，頁45。

²⁷¹前引書，頁43-44。

²⁷²前引書，頁46。

²⁷³前引書，頁47。

景教教士(聶斯托裡托鉢修士)來到中國後，會把蠶蛹和桑樹種子裝在挖空的罐頭裡，帶回西方嘗試培育。景教逃亡者來到中國境內，他們在山西蓋教堂，並沒有成為商人。²⁷⁴

十六世紀後，從海上來到中國的西方國家有葡萄牙、荷蘭、英國：

1580 年一月、六月，葡萄牙人兩次得到允許可以進入大陸地區買賣，獲利甚多。反倒是英國人與荷蘭人在此地的貿易量減少。1620 和 1627 年荷蘭人攻打葡萄牙人失敗，撤軍轉往台灣，台灣因此被占據一段時間，成為與中國和日本貿易的中繼站。英國人在 1558 年曾努力找出經由俄羅斯能抵達中國北方路線，1583 年曾計畫送傳教士去蒙古傳教，這些目標都未達成。荷蘭人在台灣的貿易量愈來愈多，但後來在 1662 年滿洲皇帝拿下台灣，又發現台灣沒什麼有價值之物，差點要放棄台灣。同時，皇帝允許荷蘭人可以在福建做生意。²⁷⁵

這段文字中，郭士立提到「英國人在 1558 年曾尋找經由俄羅斯能抵達中國北方的路線」，以及「1583 年曾計畫送傳教士到蒙古傳教」，但查考歷史無此二事件發生。1558 年正是英國伊莉莎白女王一世上任，此時英國尚未躍升歐洲大國，國內也剛結束基督教新、舊教派之分爭，尚無積極向外尋求貿易路線或者向外傳教。郭士立說荷蘭人是因為攻打葡萄牙人失敗而轉往台灣，實際上，中國明朝在 1623 年九月實施海禁令後，派遣船艦攻打當時站據澎湖的荷蘭人，荷蘭軍隊與明朝軍隊作戰後漸居下風，便主動派人與明朝談判，達成撤出澎湖的協議。於是 1624 年 8 月 26 日荷蘭人拆毀澎湖的城堡，轉往大員(台灣安平)。1662 年也不是郭士立文中所說由「滿洲皇帝」拿下台灣，而是鄭成功在 1661 年(明永曆十五年)進入台灣，荷蘭人在 1662 年撤出台灣。清朝正式將台灣納入版圖開始統治始於 1683 年。

郭士立提到，所有與中國做生意的國家裡，葡萄牙與中國關係較好：

與律勞卑和中國人不和的情況相比，澳門的葡萄牙人與中國人的關係穩固多了，甚至葡萄牙的總督都親自寫信表達對中國政府照顧他們的感謝之意。²⁷⁶

郭士立也注意到，位在中國北方的俄國，一方面想侵略中國領土，一方面其商人又仰賴毛皮貿易之利：

正當滿洲人占領中國時，俄羅斯的探險家征服了西伯利亞地區，結果導致俄羅斯與中國簽定貿易協定。俄羅斯人繼續擴張他們的領土，與中國起衝突，貿易停止，中國人在協定中聲明他們駐軍的正當性。彼得大帝重啟貿易，並在 1692 年派使臣前往北京。但這次俄國使臣前往北京卻只有確認一件事情，就是「中國政府愛講究禮儀規矩更甚於談生意。」中俄貿易裡，

²⁷⁴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47-48。

²⁷⁵前引書，頁 52-53。

²⁷⁶前引書，頁 57。

一年毛皮可帶來四千至五千盧布的獲利，可說是百分之百的回報。本來在首都賣毛皮的商人可以自由做生意，但自從清政府下令禁止販賣深受喜愛的毛皮後，待在北京的俄羅斯人數銳減，從兩千人減至兩百人。中國和俄國雙方因為政府獨裁而打斷貿易交流。²⁷⁷

中國閉關自守期間，到達廣州的外國船隻還有丹麥、瑞士、法國、奧地利、西班牙…等：

1750 年，有一艘丹麥船、兩艘瑞士船、兩艘法國船、四艘荷蘭船、九艘英國船前往廣東。直到英國商人停止走私行動，與中國開啟正式的貿易交流之前，上述紀錄可說是每年到達廣東的各國船隻平均數。從此後，很少瑞士船和丹麥船前往中國了。去到廣東的外國船隻還有奧地利、普魯士、西班牙。在所有國家中，西班牙最受尊重，清政府允許他們可到廣東、澳門和廈門，但是卻禁止和福建人做生意。法國人曾嘗試與中國人貿易，兩度設立工廠，但沒辦法維持，因為中國人不太需要這些現代產品，而且其他國家的民族可以賣更便宜的價格。丹麥人和瑞典人藉由賣茶葉進英國而賺錢。這些貿易關鍵國中並沒有美國，但之後美國也全力前往中國發展。

²⁷⁸

這些國家裡，貿易量增長速度最快者是英國：

英國國內增加的茶葉消耗，刺激英國東印度公司更努力開展與中國的貿易。1664 年抵達澳門的蘇芮艦隊(Surat Frigate)沒有達成貿易目的。但幾年之後，英國成功地在廣東和台灣打開貿易市場。英國人也嘗試去廈門，在廈門必須花大錢賄賂官員才能取得貿易自由。²⁷⁹

英國人用各種方式嘗試與中國自由貿易，郭士立提到馬加爾尼事件：

乾隆六十大壽時，英國曾派使節挑戰貿易制度，但受到不禮貌的對待。英國貿易比率持續增加。1700 年有位領事被送去舟山以長久維持貿易，但是這個任務過於艱鉅，不久，貿易中斷了好幾年。廈門沒落之後，英國人只剩廣東可以去做生意。²⁸⁰

馬加爾尼使華時，是以祝賀乾隆皇帝八十三歲大壽為名，但郭士立在文章中卻是說六十大壽，可見他對中國歷史掌握不精準。郭士立又說 1700 年英國將一位領事送去舟山，但考察歷史並無此事發生，應是郭士立所虛構。英國尋求正式的貿易管道雖然沒有成功，但是走私貿易卻不曾停止，中國官方對貿易的限制反而使走私更加嚴重：

中國人和「野蠻人」的貿易常被禁止，當地官員並不樂見貿易盛況，所有

²⁷⁷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55-56.其中「使臣」原文是「envoy」。

²⁷⁸前引書，頁 58。

²⁷⁹前引書，頁 54。

²⁸⁰前引書，頁 57-58。

限制導致，沿海有許多非法走私。²⁸¹

在說明西方國家前往中國做買賣的盛況後，郭士立開始討論中國政府對中外貿易的態度與做法。

(五)中西貿易的限制及開放之必要性

在行商體制之下，郭士立觀察到粵海關監督不瞭解如何掌管對外貿易，但卻必須每年向皇帝進獻：

監督外商貿易的叫做粵海關監督，他們是滿洲人，屬於皇室家族，是被皇帝直接指派任命處理外國人事務。每年領 2500 兩薪水。粵海關監督每年要進獻首都很多錢，因此要努力增加收入。粵海關監督大部分都長年生長在皇宮中，對貿易幾乎完全陌生，必須雇用有經驗的官員。²⁸²

這段文字中，郭士立對粵海關監督一職解釋錯誤。祈美琴研究《清高宗實錄》指出：「粵海關設立之初即派內務府斯員擔任監督」，²⁸³且粵海關監督官員從設立之初便設置有滿官、漢官，²⁸⁴非獨由滿洲人擔任，他們負責抽稅，而實際上處理外國人事務是由兩廣總督負責。此外，粵海關監督並非皇族，不可能長年生長在宮中。郭士立談到粵海關監督不瞭解如何處理貿易事宜，他是以近代國際貿易的標準來對粵海關監督的專業程度做出評價。陳國棟的研究指出，粵海關上任以前，有許多實際接觸這一職責的機會：

一般來說，包衣的子弟在年滿十八歲以前可以隨其父兄當差，如彭年之次子鍾祐即隨他出任粵海關監督；如果情況特殊，年滿十八歲的子弟也還可以隨同其父兄赴任以便作為得力的助手，如寅保即隨父唐英認職九江、粵海兩關以幫辦關務。這些包衣子弟耳濡目染，再加上父兄的指導，顯然可以培養財政行政上的能力。而歷試諸差，更使包衣的經驗日益豐富。²⁸⁵

陳國棟認為，粵海關監督在上任之前已對關務有所接觸，應不致於對貿易「完全陌生」。不過，按照陳國棟的解釋，粵海關監督在上任前所學到的關務處理方式，應是沿用過去粵海關監督處理關務的經驗，他們的確是有事先接觸到關務，只是他們所學到的是過去舊經驗、舊慣例。郭士立必然是以當時西方國家處理貿易事務的標準來看待粵海關監督，在這種評判標準下，郭士立眼中的粵海關監督自然會成為不懂貿易之人。粵海關監督在外國人眼中是一位不瞭解處理貿易事宜，卻

²⁸¹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51.

²⁸² 前引書，頁 80。郭士立寫到粵海關監督每年必須進獻首都錢財，原文是：「His pay only amounting to 2500 taels per annum, his dependants being very numerous, and the presents he has to sent to his patrons at capital being costly…」詳細意思應指，粵海關監督每年領到的薪水是 2500 兩，他手下有很多部屬，而他每年必須送給在北京支持他的同僚許多禮物。」

²⁸³ 祈美琴，〈關於清代權官“差官”問題的考察〉，《清史研究》，2003 年 11 月第四期，頁 52。

²⁸⁴ 前引文，頁 45，祈美琴在文中指出「清初戶部、工部沿用明朝差官制度，各關的關差繼續由熟悉情況的互部漢司官一人擔任」，此後各關滿人、漢人的比例則有所更動。

²⁸⁵ 陳國棟，〈清代前期粵海關的利益分配(1684-1842)：粵海關監督的角色與功能〉，《食貨月刊》12 卷第 1 期，1982 年 4 月，頁 26。

必須致力聚斂錢財上繳中央的官員。這點馬士也曾提出：

粵海關監督不單是一個詐取者，同時也是一個斂財者和散財者，他聚斂到的一部分要直接送給宮廷中的人們，上自至尊，下至妃嬪太監。²⁸⁶他初一到任就必須有所報效；在這從來長不到三年的任期之內，仍舊要經常不斷的報效；並且在他可以滿載而歸之前，也還要再作報效。他從頭到底一直報效。²⁸⁷

由此可見，西方人眼中的粵海關監督不是一位專業的貿易人才，而僅是一位不斷斂財者。

郭士立提到，行商必須為外商作保，「行商」的存在違反自由貿易原則：

行商要負責各種事宜，這裡有幾個樣本：1830年當行商數量減少，沒有本地商人願擔任，當時的粵海關必須減少一些慣常支出。1710年行商體制還未通過，單一商人無法接洽整個貿易活動，後來才會出現行商制度。然而，行商體制與自由貿易的精神絕對背道而馳。一般商人的數量日漸增加，行商的數量卻永遠占少數，因此信用也比較少。這樣的貿易制度最近出現一些問題了。如果行商要對中國政府完全負責，那就無法取得外商的信任。行商雖然已致力改善貿易條件，但首都並沒有因此減少危險，所以行商被視為叛國者。在滿清官員的掌控之下，行商必須承擔很大壓力，他的債權人必須有心理準備隨時會有所損失，就算不是全部，至少也是部分金錢。外商每艘來船都必須找行商作擔保，行商也要對貨物負責。從船長、水手到商人，都必須受到行商監視。行商要負責外商的欠款。行商被當作違反法律與外商做非法生意的有錢人，所以每年必須送給皇宮很多禮物。²⁸⁸

郭士立提到馬禮遜曾記下行商支出：

1832年助平臨州的叛亂花了100000兩，1833年義務幫廣州治水患的捐款花了120000兩。最近又將翻修新堡壘會捐獻。除此外還有很多其他與外商相關的支出。²⁸⁹

郭士立在書中引用進出口貨品統計表，他指出物產評估的比實際少，實際的進出口成長肯定更多。由於進出口貨品是行商掌控，很多資訊是不透明的。²⁹⁰

參與對外貿易的除了粵海關、行商外，還有翻譯與買辦。郭士立提到翻譯是中國人在與西方人交易時重要的中間人，但又不為中國政府信任：

中國翻譯瞭解英文，但無法書寫，也不曾閱讀過任何一本英文書籍。翻譯工作還包含要處理貨物運送、與海關打交道、付錢給海關。中國政府常將

²⁸⁶ 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 第一卷》上海：上海出版社，1910，頁17。

²⁸⁷ 前引書，頁37。

²⁸⁸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80-82.

²⁸⁹ 前引書，頁83。

²⁹⁰ 前引書，頁84。

這些翻譯當成騙徒，投以憤怒之情。中國政府認為翻譯會誤導野蠻人，他們應該被約束，但是對中國政府而言，他們又是唯一合法的溝通管道。翻譯的酬勞很少，但是會隨著貿易量增加而增加收入。²⁹¹

買辦的工作則是提供外國商人到中國的日用品和僕役：

馬禮遜曾有段文字專門形容買辦——買辦最重要的事，就是提供外國船隻日常用品，但也被雇用來招募當地中國百姓從事外商的僕役、勞工。這件工作是違法的，所以買辦必須為此付一些費用。和翻譯一樣，買辦有幾項花費，除了海關的勒索外，還必須為每艘外商船隻付出 200 元，最近減少至 50 元。²⁹²

郭士立在著作中提到由於中國政府採取貿易限制，造成走私貿易更加盛行。許多外國商人想到中國賺錢卻缺乏正當管道，但中國政府並沒有正視這個問題：

大多數的外國商人住在廣東，他們對賺錢有極大興趣，當然也必須比其他人擁有更多對中國的認識。這一百五十年來的貿易情況告訴外國人，中國政府要不沒有準備好做生意，要不就是根本不想做生意。²⁹³

過去學者認為清政府將對外貿易當成「懷柔遠方，加惠四夷」的政治行為，²⁹⁴中國將與外國人做生意視為一種「恩賜」，中國物產豐饒，不須仰賴外國產品。但郭士立指出，有些中國官員明白實際情況是一無論中國政府或人民都不能缺少對外貿易：

我們發現，中國官府與法庭私底下默許交易行為。舉例來說，上個世紀有位府尹(Foo-yuen)接到命令要把所有外國人都趕走，他提出四點抗議：第一，如果外國商船不來，政府及私人的壓力、不安都會增加，因為從這個世紀之初，中國政府的一些花用是來自對外貿易的稅收。第二，每年廣東、廣西的軍用物資都會缺乏，外國商人的商品可補充軍隊日常所需。第三，廣西有很多日用品必須仰賴廣東供應，假如禁止廣東對外貿易會引起廣西反彈。第四，廣東人也靠做生意維生。這些貨物會一手傳過一手，藉由貿易提供食物和衣物，政府也因此得到協助。這位府尹接著指出，這個興旺的王朝過去曾表現出對外國人的仁慈，准許外國人貿易將近一百多年，也非常安穩沒有出現任何問題，如果這時突然下令阻斷貿易，那麼，在廣東有數百數千個窮困失業的人，原本藉由和外國人買賣維生。若這些人失去

²⁹¹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85. 有關「中國政府常將翻譯當成騙徒，投以憤怒之情」的原文是：「They are, with few exceptions, great knaves, upon whom the wrath of government is frequently hurled.」

²⁹² 前引書，頁 85。

²⁹³ 前引書，頁 60。「大多數的外國商人都住在廣東」原文：「The majority of merchants resident at Canton.」

²⁹⁴ 張明之，〈從朝貢體系到條約通商：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型態的變遷——鴉片戰爭 170 週年反思〉，《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0 年第 3 期，頁 13。

了維生方法，對當地會有很不良的影響。²⁹⁵

此段文字中，郭士立說「上個世紀有位府尹接到命令要把所有外國人趕走，他提出四點抗議……。」內容無可察考，按照常理判斷，中國官員不會爲了讓外國人能到中國做生意而替外國人說話，這些內容應是郭士立自己杜撰而來。郭士立爲了使西方人相信「中國也有人支持開放貿易」，所以憑空創造出「歷史」。在郭士立眼中，廣東、廣西軍用物資以及民生用品有一部分來自進口，反而是中國人必須仰賴對外貿易才能謀生：

外國人的結論是，中國政府比起我們更不願意擺脫貿易。只要看到廣東有這麼多人藉由與外國人做生意而生存，就不會想把這些人餓死。中國有這麼多的人口，比起顧慮人民用什麼方式維生，政府更在意人口是否有增加。所以，中國人不能沒有對外貿易。人們常說，中國地大物博，可以自給自足，不須仰賴對外貿易維生。但同樣地，我們也可以說，英國進口了糖、咖啡、茶葉、胡椒等等，但就算英國無法再獲取這些物品，英國人也不致於餓死。但是，既然這些物品已經被買賣了，要立刻終止買賣便很困難。²⁹⁶

郭士立呼籲，要用發動戰爭促使中國政府立法建立正式貿易管道：

我們可以公正地說，所有國家都有他們的法律，人民都必須服從法律，中國也是如此。任何無法遵守國家法規者都該被驅逐。因此上述討論所衍生出的問題是：如何藉由正派管道進行貿易？合法貿易的權利應該明文寫在條約裡。雖然，用戰爭來獲取貿易條件是可怕的政治手段，不瞭解一個國家的優點就出兵打它是很無禮的。但是，若要我們(指與中國)之間的貿易關係有任何改變，就一定要發生流血衝突。這樣的衝突對我們來講會是個負擔，危險的賭注只為了獲取合法貿易。看看過去，當我們從事走私貿易卻被中國人勒索時，我們有抱怨過嗎？放棄挑戰不是一個審慎的人會做的決定。貿易的支援曾經非常堅固，一度公平又有尊嚴。現在我們向清政府提到這些過去經驗，試圖友善地與清政府協商都失敗了。²⁹⁷

這段文字中，郭士立說「貿易的支援曾經非常堅固，一度公平又有尊嚴」，這是他再度虛構不存在的歷史。郭士立刻意虛構「過去」中國曾經友善對待外國商人，來非議「今日」的清朝政府多麼不如過去。

只要建立正式貿易管道，就可以避免中國官員爲了向上級進獻而參與走私：

現在，只有將貨物正當合理地上稅，才能抑止當地官員自己進行的走私行

²⁹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61.

²⁹⁶ 前引書，頁 62。原文：「With the same force we might say, that England could dispense with sugar, coffee, tea, pepper, &c. and the people would not starve, if they could not obtain these articles. But these articles having been once introduced, it would be almost impossible to do away with them instantaneously.」

²⁹⁷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63.

為。滿清官員必須進獻給上司才能確保官位，這種現象幾乎不可避免，也是我們所遺憾見到的。²⁹⁸

郭士立強調，爲了讓中國政府打開對外貿易大門，也爲了避免英國海軍被人看輕，即使不得已也必須發動戰爭：

如果中國政府認為我們會犧牲民族忠誠以取得貿易獲利，我們就會完全被他們掌控，並造成嚴重損失。我們應該去除這種誤解。英國應該向中國說明，英國軍隊是有相當能力的，只有這樣做才會有令人愉悅的結果。假如英國海軍再用對歐洲國家的方式對待中國，那麼英國海軍就會被看輕，我們的貿易量會比伊利莎白女王時代還少。我們憎恨戰爭，然而戰爭卻是必然的結果。軍隊愈接近首都，要求愈會被重視，因此不要怕犧牲。英國應該提出以下要求：協定關稅、開放北方港口、自由居住權、首都的永久居留權、保障英國人生命財產安全…等，這些要求將隨著兵力抵達首都而被同意。²⁹⁹

這段文字中，郭士立點出英國不僅應該主動出擊，也應該盡量讓軍隊前進首都。中英南京條約中提到的協定關稅、中英法天津條約中開放天津、外國人可自由出入內地…等，郭士立 1838 年此書出刊時都已明文點出。雖然發動戰爭違反國際法，但是，是中國人自己並未瞭解也沒有遵守國際法，因此英國不得已才造成衝突：

我們承認這種發展(指作戰)不是依照國際法。但中國人也從未瞭解國際法的價值，他們總是用一些詭辯與我們交涉，所以過去曾有使節團到中國卻無法達成出使目的。只有改變體制有效。然而，只有讓最糟的情況出現才能改變體制。流血和衝突無可避免。³⁰⁰

郭士立很清楚發動戰爭將違反國際和平，但他形容英國是「被魚叉攻擊的魚」，戰爭對英國來說是「被害者的反擊」：

雖然中國政府很虛弱，我們也確信這種進行(戰爭)是與國際法律背道而馳，並不具正當性。雖然很無助，但被魚叉攻擊的魚都會奮力擺動魚尾做最後一擊。英國每年的稅收很大一部分來自印度，印度地區的貿易量也是每年都有成長，何必開先例與中國作戰而使自己陷於混亂？就算我們達成目標，最後順利簽了條約，可能再也無法取得中國政府信任了，誰願意看到這樣的結果？³⁰¹

郭士立說到，商人會支持英國發動戰爭：

貿易最好自由化，否則強制用外力干擾會造成毀滅性的結果。結果不是全毀就是半毀。當我們的貿易關係發展到這種程度，中國政府會因為自己受

²⁹⁸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66.

²⁹⁹前引書，頁 64。

³⁰⁰前引書，頁 66。

³⁰¹前引書，頁 65。

到英國干擾而做出必要安排。商人們也會做出回應。比起普通平民，商人對獲利更敏銳，不會讓自己的生命、財產陷入危機，或被剝奪走利益。³⁰²但在此處，他並未指出是「中國商人」還是「英國商人」。郭士立為到廣州作生意的英國商人發出不平之鳴：

假如我們的貿易不值得政府加以保護，那我們就像廣東地區所住的其他外國人，維持著獨立性繼續過活就好了。但這兩年的經驗讓我們必須向政府(案：指英政府)提出這種要求(案：指戰爭)。我們不能預測未來會發生什麼事，但起碼目前英國商人做生意被打擾的現象不能不管。³⁰³

英國商人所遇到的貿易障礙有哪些？郭士立也在他的文章中列點說明：

第一，滿清官員違法勒索的費用。第二，行商體制。第三，與外商交易者的財產安全問題。第四，我們個人自由受到很限制。第五，缺乏與政府溝通的直接管道。行商必須代表外國人提出訴願，他們不想在違反自己利益下為外國人爭取權益是人之常情。行商被地方官鄙視，並不會真心去達成外國人的訴求。經驗告訴我們，向那些常被當作叛國者的行商溝通是無效的，因此，只剩下將軍隊帶到國家大門前才能達到目的。這樣做雖然會導致引發不名譽的戰爭，對一些紳士而言，戰爭是不得體的行為，但是這卻是我們達成訴求最有效的方式。³⁰⁴

郭士立向讀者呼籲，只要看過他對中國政府所設下貿易障礙的說明，就會理解外國商人所面臨的現實狀況，也會想改變它：

以上是我們公正無私地將眼前問題呈現出來，請讀者自己評判，上述所列問題是否符合現實，還是出於一己之見。是該讓這些現實問題繼續存在，還是改變它。如果現況沒有改變，外國人還是會被形容成「破壞者」，而中國人會被形容成「充滿憐憫心」³⁰⁵

關於中國法律對於貿易限制的項目，郭士立列點說明：

中國法律對貿易的限制很多，有以下幾點：

- 一、軍艦不可進入 Bogue 或 Typa
- 二、船隻買賣完貨物後，會留下一到兩位外國商人與行商結清款項，付完款就必須馬上離開，不可有任何逗留。
- 三、每艘船都必須先在澳門登記，才能聘用水手和進入 Bogue
- 四、每艘船販售物品前都必須取得買賣執照。如違法販賣違禁品或違法雇用人員，會處罰。
- 五、須直接與行商交易，滿清官員不會介入。
- 六、負責外國船隻安全的行商，在外船離港後要付錢。

³⁰²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65.

³⁰³前引書，頁 67。

³⁰⁴前引書，頁 70-71。

³⁰⁵前引書，頁 72。

- 七、粵海關每月必須登記來港的船隻數量、所販售的物品。
- 八、出於對外商的關懷，皇帝已經降低一些稅率，因此外商禁止直接向中國人賺錢，不可停船做生意。如果船長不約束自己的船員，就必須為後果負責。
- 九、百姓不可向外國人借錢。
- 十、外國商人不留在廣東過冬，這是為了避免讓外國商人取得作物價格的資訊，避免讓外商因此賺錢。然而，若外商的資訊不是很清楚，卻又被允許可多留一些時間。
- 十一、外商必須住在商館裡，不能雇用僕役。行商會負責外商的居住飲食。
- 十二、外商住在行商家裡，被限制行動，必須看行商臉色行事。一個月只有三次開放讓十位外商去河另一邊的花園遊玩。
- 十三、外國女人不可到廣東。
- 十四、同上，外國水手也是。
- 十五、同上，外國軍隊也是。
- 十六、船長可在黃浦江進出，但是必須讓兩個海關人員監視。
- 十七、外商的訴狀必須藉由行商呈送，行商很有可能拒絕轉達。
- 十八、中國法律將殺人案區分為(1)有意殺人者處以死刑(2)意外殺人者減刑(3)自保而殺人者不受處罰。乾隆曾說：自然法並不適用於中國，這是為了讓活人保有生命，以威嚇野蠻人。但會因此產生一些問題。³⁰⁶

郭士立說乾隆皇帝講到「自然法」，西方「自然法」的觀念在十七世紀發展出來，其精神強調「社會是為人存在」，³⁰⁷當時的中國社會還未像西方發展出自然法的觀念，乾隆皇帝不致於會說到這個專有名詞，郭士立又一次虛構歷史。另外，郭士立所提到的這些限制在他眼中對外國商人很不利，處處限制外國商人行動。可是，身為商人的亨特，卻覺得在中國生活相當愜意，中國官方的法律對他似乎不成限制。他在行文中，多次提到廣州官方對外國商人的保護，³⁰⁸商館街上駐守的士兵，在亨特筆下成為負責驅散鬧事的中國人，彷彿專門在保護外國商人。

郭士立對上述中國法律作出批評：

即使澳門的法律並不完善，我們也不奢望有像澳門那樣的法律，但中國對貿易的法律限制卻值得我們好好探討。特別是第一、三、四、六、七、十三條過去不被重視。中國立法者把法律當作放在牆角很久不會用到的一張網子，但是當某天突然要用到時，卻會網羅很多無意誤觸法網者。不只法律，連官員都是這不公義系統的一員。前者會將無辜者定位為罪犯，後者則會種種懲處這些無辜者。這種法律導致當中國百姓想收留野蠻人時，會被抓去關。所有法律都是要將中國百姓和「喧鬧恐怖的野蠻人」畫清界線。

³⁰⁶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77-78. 其中「自然法」原文「Natural Law」。

³⁰⁷ 賽班(George H. Sabine)著，李少軍、尚新建譯，《西方政治思想史》，臺北：桂冠，1997，頁448。

³⁰⁸ 威廉·亨特著，馮樹鐵譯，《阿兜仔在廣州》，臺北：台灣書房，2010，頁25。

外國人只能和翻譯與行商做買賣。而行商必須小心記下買賣行為，並監督外國人，避免有間諜埋伏其中。如果不是因為發生幾次意外事件，如果到廣東的外國人沒有那麼多，那外商的處境可能就像在日本的荷蘭人一樣。這個政府出於「一點同情心」准許野蠻人可做買賣，也因為認為抽取的稅率輕如鴻毛，就認為貿易不須設定法規來保護。³⁰⁹

郭士立認為中國對外商的法律限制導致中國百姓必須和外國商人「畫清界線」，但是，亨特倒認為中國人和外商之間互動良好，外商在與中國人的貿易中建立與中國人的友誼，當外商要離開時，都帶有對廣州的眷戀之情。³¹⁰亨特說，中國法律限制外國商人的活動範圍，這樣的法律即使經由皇帝重申過，但外國僑民早已不再遵守。³¹¹而且，外國人比起中國人更能輕易避免掉一些災禍。³¹²亨特筆下的中國行商是誠實可靠、「遵守合約、慷慨大方」的。³¹³在亨特的眼中，不僅中國法律無法限制外國商人的行動，連中國官府派出通事跟隨外商，通事都會幫忙外國商人欺上瞞下。³¹⁴亨特寫出中國行商面臨的難題是中國人自己製造的一來自上層官方無窮的勒索敲詐。³¹⁵他與中國商人做買賣沒有因為官府阻撓而受限，他還稱讚中國商人性格誠實，不會偷斤減兩。³¹⁶同樣是西方人，郭士立在中國的活動受到中國法律限制，他不能隨心所欲與中國人來往，而亨特在中國從事買賣，與中國人往來時，倒好似暢行無阻般，中國法律對他而言不成「限制」。會出現這樣的差別，主要原因應是：亨特與郭士立「身分」不同。亨特 1825 年到達中國廣州時年僅十三歲，他在 1829 年加入廣州美商旗昌洋行，開始參與貿易。既然他的身分是商人，「賺錢」就是他最終目標，因此面對中國法律既存的貿易限制，他就必須另外尋找貿易出路。亨特找到的賺錢方式，就是藉由「賄賂」讓自己在中國暢行無阻。他在《舊中國雜記》一書裡講到，按照規章，外國人不可以擅自前往城門呈遞稟帖，但「我們還是照樣到城門去，而那裡的衛兵卻保護我們不受眾人的侵擾」，³¹⁷「就這樣，還用了很多別的方法，使得任何事物都順利進行。」³¹⁸他文中「別的方法」雖無明寫是哪種方法，但可推想應是指「賄賂中國官員」。亨特還提到，1837 年時，廣州的外國商人在珠江河面上舉辦一場划船比賽，這違反了中國法律，但中國官員「在過年的時候收受了一筆禮金，就『閉上眼睛』了。」³¹⁹此敘述更明白顯示出，亨特很了解用賄賂方式，中國法律就不成限制。

³⁰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79.

³¹⁰威廉·亨特著，馮樹鐵譯，《阿兜仔在廣州》，臺北：台灣書房，2010，頁 25。

³¹¹前引書，頁 27。

³¹²前引書，頁 25。

³¹³前引書，頁 37。

³¹⁴前引書，頁 48。

³¹⁵前引書，頁 35。

³¹⁶前引書，頁 89。

³¹⁷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台北：五南，2003，頁 2。

³¹⁸前引書，頁 2。

³¹⁹前引書，頁 275。

亨特採取「行賄」方法達成賺錢目的，但是他不會考慮到，未來抵達中國的商人是否能像他一樣順利從商，所以也不會否定中國既存的法律。而郭士立身為一個傳教士，到中國的最終目標是要令中國人改宗，等於是要中國人改變傳統，接受一個過去所陌生的新宗教。郭士立的理想遠比亨特的目標要更難實踐。郭士立很了解，短時間要中國人改宗是件難事，必定要有其他力量幫忙，才有可能達成目標。而這「其他力量」，有可能是「武力」，也有可能是「貿易」。郭士立眼看中國政府竟然對外國商人設下種種貿易限制，這等於是切斷了有助於他傳教事業的「外力」，此法若不廢，還會影響日後所有到中國的傳教士，因此，郭士立筆下，這樣的中國法律實在萬不可取！

郭士立認為，外國商人到廣州的目的是賺錢而非製造事端，中國政府不須爲了少數衝突事件而設下嚴密的法律限制：

每個人都有責任維持貿易自由，不要因為一個不守法的人而造成大家麻煩。如果有一個人不守法，就讓他去接受官府制裁，而不要拖累外國人和本地的中國商人。因為一個殺人事件而停止貿易的頻率是多少？渴望自由貿易者的人數又有多少？比較後便能有所取捨。³²⁰

身為傳教士，郭士立譴責走私鴉片，他認為中國開放貿易後就能解決鴉片走私的問題：

當我們將毒藥灌進中國，用走私、非法的管道買賣，我們還能主張什麼？中國政府很快就會看到開放口岸的需求，會像零丁洋的貿易一樣多。但是我們必須花時間等，不要過於催促中國政府。非法的鴉片貿易無論如何不可被原諒。這種毒藥會損害健康，令人頹廢。數以千計的人用短暫快樂換來一生痛苦，並提早進入墳墓。假如這些種植鴉片的人，可以找到其他謀生方式，那鴉片這種惡魔很快會被消滅。而這個有害的藥就會消失。我們和中國之間的政治關係便會轉好。我們相信在中國會像在其他國家一樣，我們會因為有大量資本而具有貿易優勢。英國會希望在中國的貿易情形就像在其他國家一樣受到尊重。³²¹

他樂觀的表示，將來全中國海岸線船隻往來貿易將非常熱絡：

零丁洋的貿易量在短短數年中增加許多，福建沿海的船隻來往數量也穩定增加。如果讓貿易合法化，那福建沿海的貿易榮景必將延伸到全中國海岸線，海河也將可能是下一個零丁洋。³²²

郭士立還認為，若中國開放對外貿易，影響的不僅是中外雙方經濟層面，還會改善雙方外交關係：

如果我們希望英國人與中國人之間的交談是像對待同伴一樣，而非像在對待敵人，那前面的要求就是合理的。(案：「前面的要求」應是指郭士立在

³²⁰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71.

³²¹前引書，頁73。

³²²前引書，頁73。

77 至 78 頁所列出，中國法律對於外商到中國貿易的十八條限制)當貿易而得的獲利是多元的，雙方互惠時，那這樣的利益應該換來更友善的對待。然而，在中國卻不是這樣。我們被形容成是只會叫囂的野蠻人，甚至碰觸我們會被傳染疾病。我們希望中國人用合理的標準對待我們，而不是把我們當成仇人般的怒斥。我們不希望將中國排除在國際法律的適用範圍(按：指戰爭)，而是希望我們的外交不用靠自己反擊才能進行。我們認為前述的問題在過去不曾討論，但若不解決將來還會不斷出現。³²³

中國人過去對待外國人時所抱持的歧視心態將隨貿易開放而瓦解。

除了在英國出版的外文著作中，極力呼籲英國應該用武力迫使中國開放貿易之外，郭士立也在他的中文作品中向中國人一再提到與西方國家貿易的重要。道光戊戌年正月刊(1837 年 2 月)中標題為「貿易」一文中，郭士立說「以有易無」為人世間不變的常理：「人生世上，百凡最難滿，用上古以來，萬國以所有者，易所無也，此不變之常道。」³²⁴後又提到，孟子說農人不自織衣物是為不耽誤農耕，農夫使用的耕種器具也不是自己製造，而是用農產品去換，孟子教導人們不用萬物皆自己製作，而是透過以物易物方式取得：

孟子曰，許子必種粟、而後食乎，曰然。許子必織布，而後衣乎，曰否，許子衣褐，許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織之與。曰否，以粟易之。曰，許子奚為不自織。曰，害於耕。曰，許子以釜甑爨，以鐵耕乎。曰、然。自為之與。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為厲陶冶。陶冶亦以其為械器易粟，豈為厲農夫哉。且許子，何不為陶冶，舍皆取諸其宮中而用之，何為紛紛然，與百工交易。何許子之不憚煩。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為也。自是觀之，農興，百匠成，貿易日夕急需難免焉。農匠不得已而相易。倘農夫運貨，不能務農，如匠買賣，不能作工。必有經紀辦事，由此通商起矣。欲立鄉黨。莫不必招農、匠、商、三品，成家創業，不然亂頭混緒矣。孟子曰，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為備，如必自為而後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由是言之。各國向化，自然開通商之路，通商愈廣，國家愈興，經商廢衰，百姓殘弱焉。商賈之務不同，或一起買賣，或零星買賣，兩者共相輔佐。即如包攬大商，非同小販之經營，乃廣運其貨於遠地，跋涉勞頓，而後分其貿易於小販。倘無小販生理，如何可零碎買貨，誰買一千擔之茶葉自用之乎。故小販以零碎賣之，致補各人之用也。

325

一個人日常生活中所需要的各種物品是由許多人所生產，以物易物衍生而出商業買賣，中國各省有不同特產，因此內陸貿易發達是必然的：

通商之道有二，或內地貿易，或外國交易。中國十八省之形勢、水土之風

³²³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74.

³²⁴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314。

³²⁵前引書，頁 314。

氣、山海之物產迥別，各省自然有交易之理矣。國之民人，各方通商，則化昭文明，而流教澤矣。利身利國，為淳樸矣。商賈或乘船泛海面，進港貿易，或趨河江運河水溝駕舟，或用車載貨而往來。中國之海口繁多，廣東之廣州、潮州、福建之廈門、泉州、福州、浙江之寧波、乍浦、杭州，江蘇之上海、山東之膠州、登州、直隸之天津、盛京之錦州，為天下至廣大之埠頭。內地水陸衝會，舟車之所輻輳甚多。自南至北，自東至西，各省郡內互市之地。中國之江河溝通路、如身之脈絡也。因此經營，互相市易旺相，運貨往來愈易，盤費愈儉，載運錢減扣，以致貨價亦落低也。平價買，客日增，貨好銷，生理紛繁。故發仁政，廣其通路，致遍處貨物盛足，不可勝用。³²⁶

由中國內陸各省互通有無，再擴及談到中國與西方各國也應該互通有無，彼此彌補不足之處：

中國出茶葉、胡絲、桂皮、樟腦，等貨甚盛。南國出燕窩、海參、燕木、丁香、胡椒、米等貨。西國出金、銀、錫、鐵，各項羽毛、大呢、澤布、時辰表等貨，搜國之根、尋邦之畔，察其形、觀其勢，就知各國有所缺又有所豐也。由是外國交易，自然而起矣。宇宙內萬民為一家，造主上帝之智，能思頒各國之雜物，令諸人類往來接濟，以為其需用。³²⁷

郭士立深知儒家思想深入中國人心，因此在告知中國人與西方國家貿易是理所當然、必然之道理時，用孟子的話語來舉例。其中又不忘提到人類本為一家，商品互通有無是上帝的巧手安排，如此，「上帝」與「孟子」都同樣贊成中西互市，中國讀者應更能贊同郭士立的說法。而接下來的每個月分中，郭士立利用自己創造的人物、故事來訴說中國開放對外貿易的好處。道光戊戌年二月份標題為「貿易」的文章中，郭士立講述道，林興家道中落，去新加坡作生意而重新致富，回到家鄉與友談論經驗時，耆老指責林興外出做生意是「損內利外」。³²⁸林興則反駁說，到南洋貿易不僅可解決沿海省份田地不夠導致居民游手好閒、滋生事端的問題，也可以增加政府稅收、補內地物產需用，在場聽聞者一致贊同林興話語。

329

接下來，從道光戊戌年三月到九月的刊物裡，郭士立出版一篇連載故事。主角是兩位中國人「辛鐵能」與「曾植產」，平日勤奮念書，但是看到廣州進出口船隻日漸增加，開始注意到書本外的現實世界。兩人開始討論停泊廣州船隻日增現象到底是好是壞，辛鐵能擔心商人把中國銀子運出海外作買賣，「十年以後我庫頃空」，³³⁰但曾植產回答說，商人帶著紋銀出洋買進等值產品運回中國，不可謂損失銀子。四月份刊中，曾植產遇到辛鐵能，再次論及通商口岸船隻數量遠多於內河。曾植產提到孟子曾說：

³²⁶ 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315。

³²⁷ 前引書，頁316。

³²⁸ 前引書，頁331。

³²⁹ 前引書，頁332。

³³⁰ 前引書，頁344。

使民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如若廣通商之路，五穀不可勝食，百貨不可勝用，頒白者不負載於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不亦悅乎。由是言之，舟楫利涉為民之大利矣。³³¹

五月份刊中，曾值產受邀到廣州一位行商家中作客，行商將所存道光十八年英船進口貨物與估價單拿給曾值產看，曾值產很驚訝一年進口量竟然這麼大。六月份刊中，曾值產再度到行商家中作客，行商得意地向曾值產展示家中許多珍奇異寶。³³²七月份刊中，行商告訴曾值產每年貿易所得繳納的稅餉有多少，曾值產聽後讚嘆如此可「國庫充實、蠲免農夫之田賦。」³³³八月份刊中，曾值產與行商討論到若是船隻遇到海難會有所損失，行商告知有「擔保」方法，曾值產聽後覺得此法甚佳。³³⁴

這幾篇連載故事，主角對話內容都是生動活潑，藉由主角間的問答，郭士立表達出「連傳統讀書人」都體認到開放貿易、接觸外國人是時勢所趨，而且有許多好處。郭士立寫下這幾篇連載故事是在 1837 年，此時距離他 1833 年完成中國沿岸遊歷又過了四年。到鴉片戰爭發生之前，郭士立除了想說服英國政府用武力迫使中國開放貿易，《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有關開放貿易會為中國人帶來好處的文章更顯示出，郭士立也在乎中國人——尤其是「讀書人」對於開放貿易的看法。他引用儒家先賢孟子來告訴中國讀書人「以有易無」是天地間之常理，中國老祖宗早就贊成通商了。再用故事來告訴中國讀書人：已經有讀書人在與外國商人來往了，時代已經不同，只有開放貿易中國才會更文明、更進步。或許，在郭士立眼中，清朝「政府」是冥頑不靈，不願意改變封閉現狀，但是中國的人民卻有改變觀念的可能性，也有可能與外國商人站在同一陣線，因此他才會一再地向中國讀書人竭力呼籲。

小結

在鴉片戰爭以前，郭士立眼中的中國政治，是圍繞著中國皇帝而運轉。中國皇帝握有軍事大權，可以任意使用國家錢財。中國官員們期盼受到皇帝賞賜頭銜。中國皇帝重視臣下絕對地忠誠，無論文、武官員，都必須謹慎避免涉嫌叛亂，因此在工作上只求謹守分際，不求有突出表現。然而，郭士立去世前的最後著作中，卻對中國皇帝有所改觀，他認為其實中國皇帝行事是受到限制的。郭士立對中國皇帝的看法有此轉變，應是由於他早期描述中國的著作，其內容多取自西方

³³¹ 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 359。郭士立文章裡的「頒白者」應是「斑白者」。

³³² 前引書，頁 383。郭士立原文是寫「洋商」，指有與外國商人從事買賣的中國人，但此處為避免讀者誤以為洋商是外國商人，故寫成「行商」。

³³³ 前引書，頁 394。

³³⁴ 前引書，頁 407。

前人對中國的認識與經驗。郭士立原先認識的中國皇帝擁有極大權威，而身為傳教士，會希望中國皇帝仁慈地對待傳教士，只要中國皇帝立場上是贊同傳教行為，那麼以皇帝至高的權威、權力，必能使傳教活動順利進行。當郭士立居住中國時間愈來愈久，發現到中國皇帝無法滿足他的希望，甚致對傳教士面臨的困境無動於衷，郭士立了解「期待中國皇帝支持傳教」是不可能的。郭士立眼中的中國皇帝不再是高高在上，或者，他不願再把中國皇帝形容成具有威權者，他藉由貶抑中國皇帝權威、瓦解儒家禮治秩序的維護者與統治者，以方便基督教義傳入。因此寫作當中，寧可把中國皇帝描述成一個具有弱點的人。

經濟方面，郭士立承認中國農業水準很高，中國人願意把時間、精力投注於自己的土地中，所以中國一塊田地能種出比其他地方更多的作物。中國有許多運河，所以內陸貿易發達。郭士立在文章中也介紹中國各地物產，這些資訊對西方人—特別是商人而言具有重要性。

郭士立認為，中國商人熱衷求財，願意伸入險境做生意，所以在過去，南洋、暹羅、新加坡、印尼…都有中國商人的足跡。但是，他所身處的時代，卻有種種貿易限制，相當不合理。況且，郭士立指出不是只有民間商人求財若渴，廣東有些官員也知道與外國人做買賣有其必要性。道光十六年十月八日，廣州外商共同上書兩廣總督的文件中，就提到外國人每年所需要的茶葉，一年不止五六千餘萬斤，「自必與種茶貧民、採茶貧婦，有些小利。買湖絲綢緞等貨，亦必能利其種桑之夫。」³³⁵可見，郭士立並非第一個提出「中國人也需要開放貿易」者，在鴉片戰爭之前，廣州外商已經指出「開放貿易是對中國人有利」。西方人在要求中國開放時，實際上是出於互利，他們會用「為中國人好」作理由，來說服中國人。

為了促進中國早日開放貿易，郭士立也會採取「虛構歷史」的方式，向西方讀者證明中國需要開放。他說過去曾有中國府尹抗議中國政府欲趕走外國人的命令，³³⁶也談到中國過去對於對外貿易的支援曾經非常堅固，³³⁷但他這些說法的來源不明，亦查無史實，是郭士立所虛構出來的。郭士立憑空捏造事實，其實也算是替自己的主張合理化。他虛構中國「過去」曾支持對外貿易，以否定「今日」的閉關自守，他要向西方讀者宣稱要中國開放貿易不是難事，因為過去就有開放過，甚至中國以前也有官員是反對閉關自守。這種藉由「虛構歷史」以合理化自己主張的方式，也可見於鴉片戰爭前中英之間的往來文書。道光十四年八月初六日，律勞卑(William John Napier)針對兩廣總督盧坤在示諭裡，言及「天朝定制，人臣無外交外夷」作出反駁，³³⁸他說英國人在中國貿易已有兩百年之久，英國人做事都是直接拜訪中國官員：

明朝崇禎十年，有船主啞體哩傾到虎門砲台之後，駛至省城會見大憲。亦有

³³⁵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97，頁84。

³³⁶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61.

³³⁷ 前引書，頁66。

³³⁸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97，頁16。

大清雍正十二年，公司列班拜會督憲一次。乾隆七年，水師提督安遜會見一次。乾隆五十六年，英國派來查事列班拜會一次。乾隆五十九年，列班拜會一次。嘉慶十年，美士刺佛合同男爺師拜會一次。嘉慶十一年，大班美士刺佛拜會一次，多林文與益花臣亦拜會一次。嘉慶十六年，師當東拜會一次。嘉慶二十一年，男爺密駕俯與船督其刺費拜會一次。業經英人多次與督憲會見，且舊時公司大班每年上省，亦多拜候。大憲可知其論內所云人臣無外交等因，實屬無真爾可。³³⁹

然而，在鴉片戰爭之前，外國商人不能直接與中國官員接觸。自 1782 年至南京條約簽約為止，所有涉及中外事件，中國官府不直接與外人接觸。³⁴⁰英國真正以官方身分拜訪中國，只有乾隆五十二年馬加爾尼使團與嘉慶二十一年阿美士德使團來華兩次，怎麼可能像律勞卑所言一英國人能輕易拜會中國官員？可見，西方人慣以「虛構歷史」作為合理化自己行為的藉口，郭士立也是如此。

郭士立在著作中向西方讀者呼籲：只有用武力打開中國大門才能去除貿易限制，使中西商人皆得利。他特別指出英國就像被魚叉攻擊的魚，迫不得已才要出兵中國。1833 年英國政府取消東印度公司對華貿易特權後，英國政府成立一個專責調查中國的委員會。委員會為增進對中國的瞭解，會研究郭士立的著作。³⁴¹英國眾議院開會時，議員多次提及郭士立經驗的重要性，他們指出：「郭士立的語言天分以及對中國習俗的瞭解，使他能描繪出中國人真正的樣貌。」³⁴²郭士立主張以武力開放中國，這論點也勢必受到英國政府重視。郭士立提到「自然法」、「國際法」，將西方國家間的關係和法律概念套用到中國，但他所身處的中國還未發展這些概念，顯現他具有西方自我中心觀。郭士立為了能使中國開放，採取雙管齊下作法：一方面在外文著作中，向西方人闡述「中國人須要開放貿易」、「中國百姓渴望開放貿易」，一方面又藉由他的中文著作告訴中國人「開放貿易為時勢所趨」。

³³⁹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97，頁 16。原史料作「…亦多拜候。…實屬無真爾可。」

³⁴⁰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綱(上)》，台北：南天，1994，頁 37。

³⁴¹ Benjamin Louis Fischer, "Opium Pushing And Bible Smuggling": Religion and the Culture Politics of British Imperialist Ambition in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08, p.294.

³⁴² 前引書，頁 296。

第四章 郭士立眼中的中國社會與文化

本章繼續探討郭士立的著作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n the Chinese Empire*。第一節裡，討論郭士立眼中的中國社會有什麼特色，郭士立在著作中特別談到中國女人社會地位低落，也關注到中國社會裡下階層百姓的窮困生活，這些特點除了是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所關注的議題外，外交官筆下多有討論。第二節中，探討郭士立對中國文化的描述，包含：科學、藝術、教育、醫學，他在書寫時對於中國的傳統兼具讚美與批評，認為中國文化是優劣相參的。但是他在結論中，把焦點放在中國文化缺失處，認為必須依靠「神」來去除中國劣等的傳統。

第一節 婦女地位與百姓印象

十九世紀前期抵達中國的新教傳教士，從事傳教活動時，所接觸的對象多是中國下層社會裡的老百姓，他們不約而同地在著作中特別關注中國女性地位，以及中國百姓貧窮的生活。本節將分別就這兩項議題，探討郭士立眼中的中國社會特色。

(一)中國女性地位

郭士立在初抵中國時，就觀察到中國女性可以說是毫無社會地位可言，除了發現中國有「溺斃女嬰」的習俗之外，郭士立也瞭解中國社會是一個「父權至上」的社會。他描述了中國社會有「溺斃女嬰」的習俗：

對此地居民而言，將一定比例的女嬰溺斃是傳統習俗。這種不尋常的犯罪對居民來講是家常便飯，他們甚至可以在很高興的心情下完成。「問男人是否有女兒」是對他的侮辱。無論政府或社會輿論都未曾阻止這邪惡的習俗。³⁴³

中國社會對溺斃女嬰的習俗視為理所當然，席爾也提到中國法律沒有對溺女嬰的犯行做出懲處，³⁴⁴可見在十九世紀前期到中期，無論傳教士、非傳教士都關注中

³⁴³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 p.174.

³⁴⁴ Sirr, Henry Charles, *China and the Chinese : Their Religion, Character, Customs, and Manufactures: the Evils arising from the Opium Trade: with a Glance at our Religious, Mor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y*. (London : Wm. S. Orr, 1849 ; Taipei :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77.), p.50. 亨利·查爾斯·席爾(Henry Charles Sirr, 1807-1872)，英國律師與外交官，1843年他擔任香港的英國副領事(Vice-Counsel in Hong Kong)，1849年，將對中國的見聞寫成 *China and the Chinese : Their Religion, Character, Customs, and Manufactures: the Evils arising from the Opium Trade: with a Glance at*

國法律這種不合理的現象。他們提到男嬰與女嬰所受到截然不同的待遇：

父親對小孩的生命有絕對操縱權，他可以根據心情管教孩子。男孩享受到較多父親的寵愛，「男孩誕生」被視為家族中最可喜可賀之事。當父親死後，兒子的權力是超越母親的。³⁴⁵

席爾認為，全亞洲女人地位最低下的地方就是在中國。在中國，只有男性被當作公民，可以受教育，女人則是完全沒有尊嚴：

中國女人被視為男性的附屬品，從來不是一個個體，只是男性情感、行為上的奴隸。在中國，最窮的男人都可以受教育，且男人到十歲還不會使用算盤會令人吃驚。相反地，即使是有高社會地位的女人，也少有懂得識字、寫字者。女人的教育受限，只被教導如何唱歌、彈三弦琴。幼年須順從雙親，婚後須順從丈夫，一生沒有個人意志。社會地位較高的女人終日談論別家瑣事、吸鴉片、遊玩。社會地位較低的女人則成為男人的負擔，或被當為野獸，幫男人耕作負重。³⁴⁶

席爾想表現出中國男性與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差懸殊，

席爾除了寫到中國女人社會地位低下，他也提到中國「纏足」習俗，他解釋中國女人裹小腳的原因是：

在大洪水(The Flood)之前，有位皇后被發現與一位多情的家臣有染，國王憤怒地責罰她。這位皇后向國王請求原諒，跟國王說這不是她的錯，而是她管不住自己的腳，因為她的腳太大了，導致帶著她前去不該去的男人住處，違背了她的意志。國王下令把她的腳前半部砍斷。這位皇后為了掩飾自己罪刑，要求宮女必須學她一樣把腳砍半，並說：這是最新的流行。從此中國女人們都樂於追求這種流行。³⁴⁷

中國纏足起源目前普遍接受始於五代十國的南唐說法，而纏足蔚為風氣則是北宋開始。席爾將纏足習俗上溯自《聖經 創世紀》裡大洪水傳說，時間過早，是對中國歷史的誤解。席爾以外交官身分，寫下他的中國印象，其中有比傳教士紀錄更詳細處，但也不能免俗地像傳教士一樣，對中國文化做出錯誤解釋。不過，雖然席爾對中國纏足原因理解有誤，從以上史料仍可歸納出一個現象：十九世紀前期到中期，無論傳教士或非傳教士，到中國時都會特別關注中國女性地位低下的問題，他們也能認知到，這是由於中國社會屬於父權社會，中國女性只是男性的

our Religious, Mor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y. 一書出版。1850 年出版 *Ceylon and the Cingalese, Their History, Government and Religion; the Antiquities, Institutions, Revenue and Capabilities of the Island; and a Full Account of the late Rebellion; with Anecdotes Illustrating the Manners and Customs of the People*. 是當時西方介紹斯里蘭卡的名著。參考網址：http://en.wikipedia.org/wiki/Henry_Charles_Sirr. (2012.10.08 下載)

³⁴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 p.174.

³⁴⁶Sirr, Henry Charles, *China and the Chinese: Their Religion, Character, Customs, and Manufactures: the Evils arising from the Opium Trade: with a Glance at our Religious, Mor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y*. (London: Wm. S. Orr, 1849; Taipei: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 1977.), p.35.

³⁴⁷前引書，頁 37。

附屬品。

(二)貧窮的中國百姓

郭士立在三次中國沿岸航行旅途中，所接觸對象多是中國平民百姓。他認為中國百姓是貧窮、骯髒的。在其《三次中國沿岸航行日誌》中，談到中國人的衛生習慣不太好，衣服時常很久沒洗導致傳染疾病：

他們身上穿了五至六層衣服，衣服用棉花做成，但上頭有許多補丁。雖然縫補多次但可保持溫暖。中國人的衛生習慣不好，太久沒洗衣服導致疾病感染。對傳教士而言，進入此區提供藥膏也是任務之一。我總是焦急地想提供醫藥協助，但這裡患者太多，我能幫的僅是少數人。我尤其要提醒想進入中國的傳教者要做好心理準備，會遇見很多眼疾患者…真希望中國能在交通便利之處設立一間醫院。³⁴⁸

中國人貧窮但好客，會邀請郭士立進入他們的屋內參觀，郭士立看到中國人民房屋內也是髒亂的。³⁴⁹中國平民百姓可說是具有「貧窮」、「骯髒」的特色。在郭士立完成三次中國沿岸航行不久之後，雅裨禮也詳細描述中國百姓的貧窮生活。雅裨禮 1834 年所出版的《1829-1833 年旅居中國和中國週圍國家日誌》(*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1829-1833*)書中，談到他在廣東看到許多中國乞丐，其中有許多是貧窮的女人。³⁵⁰雖然男性乞丐有很多盲人，但這些盲人有組織，會聽從一位精明盲人的帶領。廣東地區的乞丐是有組織的，叫做「天花會」(The Heavenly Flower Society)，雅裨禮說：

這個天花會首領的外表，是我見過全中國最邋遢的，有糾結的頭髮、骯髒的身體上佈滿害蟲。³⁵¹

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對中國乞丐多所描述，而十九世紀後期的傳教士—丁韞良，也談到中國社會充滿許多乞丐：

乞討是對中國最大的危害之一。佛教鼓勵乞討，每一個和尚都得經過一個乞討的階段。在每個城市裡，乞丐們結成了一種幫會，每個成員都聽從一個丐幫幫主的指揮調遣。³⁵²

關於中國的乞丐，雅裨禮著作裡只有針對廣東地區做敘述，而丁韞良進一步擴大描述中國每個城市中都有乞丐、丐幫組織。鴉片戰爭之後，傳教士可進入開放口岸傳教，他們藉由著作將中國社會貧窮、難堪的一面表露無遺，出於傳教士身分，也刻意將中國乞丐的乞討行為與佛教做連結。其實，早於十九世紀前期到中國的傳教士，已經有西方旅行者寫下他們對中國乞丐的描述。在 1772 年出版

³⁴⁸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p.436.

³⁴⁹前引書，頁 210。

³⁵⁰David Abeel,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1829-1833*. (New York : Leavitt, Lord, 1834 ; Forgotten Books, 2012.), p73.

³⁵¹前引書，頁 75。

³⁵²丁韞良，《花甲記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4，頁 49。

的 *The Chinese Traveller* 中，記載一段文字：

廣東街上有很多乞丐…我好幾次被迫施捨東西給他們，才能逃離他們，你若不這樣做是很難脫身的。好幾次我被乞丐追趕必須衝入商店裡頭。外國水手通常遇到中國乞丐時，會給他們一些罐頭，這樣一來可以省錢，一方面又可離開他們。我沒看過水手們會施捨金錢給他們，但是他們也許會給中國乞丐少許的米。³⁵³

可見，十九世紀的傳教士並不是最先關注到中國百姓貧窮特色的人，西方人在十八世紀後期已經發現中國社會中有很多乞丐，甚至要極力避開他們。

不僅是傳教士，「非傳教士」筆下描述的中國百姓更是外貌骯髒、到處遊蕩。老尼克在日記中對中國社會的描述具有許多負面評論。例如，他描述中國的理髮匠有著骯髒外表、到處遊蕩，是令人「討厭的傢夥」：

令人驚訝的是，那些專門掌管風化德行的官員對任何有可能引發醜聞的事情格外嚴厲，竟然卻容忍這些人在公共場所…我向您提到了理髮匠。這裡到處都是這類討厭的傢夥，比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嚴重。我們眼前不過晃過的一個光頭也表明了這種職業蔓延之廣。他們通常到處遊蕩，隨地服務。就像希臘的智者一樣，理髮匠隨身挑著全副家當，也就是他的行當。和陸地上一樣，河上也有理髮匠。³⁵⁴

老尼克還說中國街道上總是有許多窮人在遊蕩，他們外貌骯髒甚至會吃小蟲：

一排無所事事的窮人貼著牆躺著曬太陽。他們穿著南京土布做的寬大長裙，肩膀上已經破破爛爛，沾著泥汗；四周散發著一股哈喇味的惡臭，髒衣服上的這種獨特的“香氣”就像腐爛的大蒜味。從未看見他們做別的事，除了趕走千瘡的腦門上嗡嗡作響的蒼蠅。而且我敢說，他們吃的就是身上的那些寄生蟲。至少我不只一次看見他們嘎吱嘎吱地嚼著小蟲，神情自若，這些小蟲一定剛剛叮過他們。³⁵⁵

上段文字中，老尼克是以相當鄙視的態度來描述中國窮人。他形容中國窮人腦門上是「千瘡的」，且圍繞著嗡嗡作響的蒼蠅，這樣的敘述過於誇大。文中描述他看到中國窮人會吃蟲，但「以蟲為食」和惡意的「咬死」或「吃」蟲子是不一樣的。也許老尼克眼見者是窮人以蟲為食，但他卻不加以辨別，而是以偏概全地認為那些窮人全部都「吃蟲」。可見老尼克對中國窮人抱持相當「厭惡」的心態。亨特在著作中，也用「厭惡」的口氣來描述中國乞丐，他說中國乞丐都是「一些能夠想像的出最醜陋的人…我從來沒見過像他們那樣醜陋的人，除了在訪問孟買

³⁵³ *The Chinese Traveller* 一書是由「十八世紀經典古籍」資料庫：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簡寫為 ECCO 所搜尋到在 1772 年在倫敦所出版的書，網址是：
<https://huso.stpi.narl.org.tw/husoc/husokm?!!FUNC270>(下載時間：2012.09.08)，作者佚名，其內容編排與郭士立出版的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相似，全面性地介紹中國，此段文字出現於本書第 39 頁。

³⁵⁴ 老尼克著，錢林森譯，《開放的中國——一個番鬼在大清國》，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頁 12-13。

³⁵⁵ 前引書，頁 14。

時偶然遇見過一次之外。」³⁵⁶郭士立雖然講到中國百姓是貧窮的，但倒也不像老尼克或亨特如此厭惡中國窮人，或者是像 *The Chinese Traveller* 書中作者般描寫「避開乞丐的方法」。郭士立反而是與中國貧窮百姓相談甚歡，他眼底的中國窮人雖然生活水準落後，但是樂善好施，會邀請郭士立進去住家參觀，並熱情招待郭士立一行人。³⁵⁷郭士立與老尼克、亨特，對於中國窮人的描述會出現這種差別，應是由於老尼克和亨特並非傳教士，他們沒有「深入了解中國」的動機，因此僅憑看到一個景象，就認為所有中國窮人都是一樣情況。老尼克以西方進步文明的眼光，看到中國窮人吃蟲，就判斷這代表落後、骯髒。郭士立了解中國窮人衛生習慣差、生活環境糟糕，但在向西方讀者描述他所見的中國窮人時，當然不會以「鄙視」、「輕蔑」的態度來敘述。因為郭士立若把中國窮人形容成「無藥可救」的情況，那西方讀者就不會認為「支持中國的傳教事業」是值得的、能有所回報的。且郭士立身為傳教士，直接與中國窮人來往，而中國窮人也是他的傳教對象，他不能竭力地批評他們，否則就是自打嘴巴，把自己的傳教活動形容成是「對牛彈琴」。無論郭士立心中對中國窮人真正的想法是什麼，他都必須把中國窮人描述成是一群可憐的人，他們衛生習慣不好、生活品質糟糕，都是因為沒有接受上帝的福音，所以無法改善他們的生活。對郭士立而言，中國窮人其實是想接受福音的，就像他們願意接受傳教士的醫療行為。而他們以前沒辦法接受福音、改善生活，是因為沒有這個機會。所以這群中國窮人是一群可憐的人，郭士立要藉此呼籲更多人投入傳教事業，拯救中國窮人的生活環境。比起郭士立，亨特和老尼克兩人則缺乏了「傳教」這層顧慮。

第二節 科技文明、藝術、教育

(一)中國的手工藝與紡織業

郭士立認為，中國手工藝的發展有獨到的技術，其中又以廣東的工藝家擁有更好的技術，這是因為廣東一直以來都有與西方接觸的關係：

外國人第一次到中國，一定會驚嘆於中國藝術家精湛的手藝。中國藝術家會雕琢象牙、珍珠、龜殼。廣東的工匠比江南其他城市者更擅於把工藝品塗漆。廣東人之所以有較優越的工藝技術是因為享有較多的自由。也有與外國人作生意。³⁵⁸

在此處，郭士立提到製做漆器的技術較其他地區優越。然而，明代出版的《髹

³⁵⁶ 威廉·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3，頁15。

³⁵⁷ 例如在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頁210中提到，中國人民雖然食物有限，卻熱情招待郭士立一行人吃晚餐。

³⁵⁸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142.

飾錄圖說》指出中國各地有不同種類的漆器，例如福州有脫胎漆器、廈門有髹金漆絲漆器、廣東有暈金漆器、揚州有螺鈿漆器、成都有銀片罩花漆器、安徽屯溪有犀皮漆器、北京有剔紅漆器…等，實則民間漆器生產遍及大江南北，各有特色。

³⁵⁹明朝時，中國廣東工匠所製做出的漆器，難以斷定是否優於其他省份。郭士立應是要強調：廣州是中國在閉關自守期間，唯一可讓外國人做生意的地方，也是唯一能接觸西方進步文明的地方。雖然漆器是中國的傳統工藝品，但必須使用西方技術才能提升漆器的精美度。所以，開放貿易的地區，會連帶提升當地的文化水準。

郭士立說中國人擅長製作漆器這種藝術品，但卻不會製作鋼、鐵產品，因為中國人無法掌握製作鋼鐵所需要的溫度：

中國人不擅長使用鐵、鋼。他們的器具、器皿設計不良。因為製作鋼的溫度不對。用鋼作成的玩具和剪刀久了都失去光澤。全中國很難找到一位鐵匠能單獨打造出「錨」和「大型機械」。中國人的「針」、「鎖」都是相似形態。³⁶⁰中國工匠不擅長製作彈簧，也不擅長用適合的溫差製作鋼。³⁶¹有些廣東居民或是大城市的手工業者會製作鐘錶，但無法製作鋼。³⁶²

郭士立三度提到中國無法掌握製作鋼鐵的技巧，顯示出中國還未具備成為工業國家的基本條件。換句話說，中國仍不如西方已工業化的國家文明、進步。

比起發明工具或大型機具，中國工匠更擅長的是「修補」或「模仿」。當然，還是與外國人經常接觸的廣東工匠仿製能力最好：

他們可以修理任何東西。他們修補任何破玻璃、破陶瓷器、任何摔壞的東西。修補的技能實在令人驚艷。但工匠的收入是相當少的。製鞋者和裁縫的收入就比工匠好多了。他們有較高的薪資並受到尊敬。細木工和工匠是比較有技能的藝術家。因為可以模仿歐洲傢俱，工匠又擅長造船。我們看到一種粗製的滑膛槍，是進口的，廣東人會致力於模仿好的外國物品。³⁶³這樣的敘述，表現出郭士立身為歐洲人的自我優越感——即模仿歐洲風格就是優秀的工匠，而沒有追隨歐洲風格者就是技術落後的工匠。他並不是以創造力或成品的細緻度來評價中國工匠的技巧。

雖然中國人不會製作鋼鐵機具，但是中國人養蠶取絲、製作絲綢的技術卻受到郭士立的稱讚：「若講到絲綢的製成完全是人工，那實在值得說中國人的工業是很優秀的。」³⁶⁴中國人培育蠶細心的程度不亞於照顧他們的農地：

照顧蠶的方法有兩種，可製作出不同種類的蠶絲，但都像農耕一樣的勤

³⁵⁹ (明)黃成著，長北校勘、譯註、解說，《髹飾錄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總論頁9。髹音ㄒㄧㄡˋ，指漆器。《髹飾錄》是中國明朝由黃成所寫漆器專書。

³⁶⁰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142.

³⁶¹ 前引書，頁143。

³⁶² 前引書，頁144。

³⁶³ 前引書，頁144。

³⁶⁴ 前引書，頁145。

勞。要注意溫度和室內通風、蠶的食物、產卵、其他事項，中國人都會小心照顧，一點都不能違背舊經驗。³⁶⁵中國人擅長的手工業是絲織品、陶器。中國人可以製作出最閃亮的色彩、最複雜的編織法。任何可負擔絲織品的中國人是買得起其他奢侈品的。無論是貴夫人、農夫、士兵都致力於購買絲綢。絲綢還可以作成褲子、靴子、帽子。中國絲綢由來已久，在大洪水之前，神農氏的妻子嫫祖就教人們養蠶取絲、製作衣服。現在，皇后是這絲綢貿易的主顧，每年都會率領眾女僕祭拜絲綢之神，並鼓勵養蠶。³⁶⁶

然而，中國絲綢應是屬於奢侈品，一般農夫身穿衣服布料應屬棉、麻，士兵平日也無須穿著絲製衣服的場合。有能力購買絲綢者應是只有富貴人家、王公貴族，一般百姓不僅買不起也不可以穿，農夫、工人、士兵在工作時也不適合穿絲綢製的衣服。非如郭士立所言「貴夫人、農夫、士兵」都致力購買絲綢。郭士立在此處將嫫祖說成是神農氏之妻也是錯誤的，嫫祖在中國傳說裡應是黃帝之妻。可見郭士立不是很了解中國的神話傳說。

郭士立提到，中國工匠的工作地點可以隨時改變：

中國工匠師傅手上都有工具箱可跟著巡迴工作。理髮師把多數生財工具放進竹抽屜中，這個竹抽屜還可以當作客人的椅子。他們工作地點就是在開放的大街上或市場上，不會感到有任何不適。即使是鐵匠鋪也能搬到大街上工作。³⁶⁷

郭士立對這種可隨時遷移的工作形態沒有提出肯定或否定的看法，在他眼中，這就是中國工匠的一種特殊工作形態。郭士立提到，外國人承認中國瓷器製作精美，但漆器就稍微比日本差了：

中國最細緻的手工業就是噴漆和塗漆了，這是為了保存美麗。瓷器手工業是外國人認可中國人傑出的地方。中國漆器比起日本品質稍低，日本的漆器會透露出柔和光彩。³⁶⁸

他認為中國的手工業者可以製作出非常精細的作品，例如女人頭上的花飾、象牙或珍珠做成的項鍊、竹蓆…等，都非常精緻：

慶賀場所會使用到中國手作的花朵。女人帽子上的花也代表她的身分地位。象牙、珍珠項鍊都雕琢的很精緻，有各種顏色，在北京附近製造。用竹子所編的各式蓆墊和各式產品代表中國人是很細心的。³⁶⁹

中國手工業發展到清朝已有一定水準，是否能更加提升品質端看清朝政府的態度：

假如中國政府對手工業者有更多鼓勵，並給予發明者更多酬勞，而不是打

³⁶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38.),p.146.

³⁶⁶前引書，頁 145-146。

³⁶⁷前引書，頁 143。

³⁶⁸前引書，頁 144。

³⁶⁹前引書，頁 147。

壓他們，中國人在其他實用藝術上無疑會更進步。假如手工業者被輕視，酬勞不好，發展就會停滯。³⁷⁰

郭士立文中曾說到：廣東工匠因為接觸外國人而擁有較優越的工藝技術，但是，他又說「手工業最好的發展是在江蘇和浙江。」³⁷¹或許西方人在閱讀完後會產生疑問：到底中國手工業發達地區是在廣東還是浙江、江蘇？又，在第三章裡提到，郭士立說「山西和江蘇是貧窮城市」，³⁷²除了行政等級有誤外，此處又明白顯示出郭士立的文章有前後矛盾之處。

(二)中國的四大發明—火藥、造紙術、印刷術、指南針

郭士立對造紙術描寫詳細：

西元前 95 年，中國人用竹子、石塊等東西發明瞭「紙」。竹子為做成紙，除去第一層綠色外皮，並被分解成六至七呎長，埋在泥濘水中直到它腐爛。兩星期左右他們就被拿掉、清洗，放在田邊溝渠曬乾，並灑上石灰。為了讓紙張更白，加入鋁、魚膠。除了竹子之外，中國人也會用桑樹、大麻、榆樹、棉花去做紙。廣東工人模仿外國紙張的樣式，這種紙張平滑易碎，並被小心使用。紙張很便宜因此可賣出口賺錢。中國手工藝業者會製作各種紙張。有些紙是做成黃色金紙以燒給神明。³⁷³

關於中國紙的發明，見《後漢書·蔡倫傳》中記載：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敝布、魚網以為紙。元興元年（105）奏上之，帝善其成，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下咸稱蔡侯紙。³⁷⁴

可見中國製造紙的材料中應無「石塊」和「鋁」。而若有「竹子」，推測是取其外皮來用，蔡侯紙出現時間記載為西元 105 年，郭士立對於中國紙的認知有誤。

郭士立提到活字印刷術是中國獨特的發明：

中國的書只印單面，康熙時期使用大量的「活字」。外國人曾想學習中國的活字印刷但都不成功。中國式的木板或鉛字版是比較便宜的。³⁷⁵

郭士立在此處提到康熙時期大量使用活字，然而，中國印刷術發展到清代，在雍正、乾隆時期才是使用活字印刷術最多的時候。清代的政府刻書，主要由武英殿負責專職修書、刻書，所出的書稱為殿本或殿版。其中最著名的印刷活動是於雍

³⁷⁰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43.

³⁷¹前引書，頁 144。

³⁷²前引書，頁 35-37。

³⁷³前引書，頁 147-148。

³⁷⁴(南朝宋)範曄《後漢書》，卷七十八，列傳第六十八，北京：中華書局，頁 2513。

³⁷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49.

正四年（西元 1726 年）以銅活字所印刷的《古今圖書集成》全書共一萬卷，是中國歷史上最大的一部銅活字印刷品。另一個則是乾隆年間用木活字印刷的《武英殿聚珍版叢書》，收錄許多的宋、元、明古籍史料。武英殿前後共刻製二十五萬三千五百個大小棗木活字，及總共印書共一百三十四種，達二千三百多卷，包括了經、史、子、集等歷代的重要著作，為中國歷史上製造木活字數量最多、印書最豐富の木活字印刷。³⁷⁶此外，郭士立認為西方人曾試著學習中國的活字印刷術卻失敗，其實，西方也有活字印刷術，即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 1398-1468)所發明的金屬活字印刷術。³⁷⁷中國與西方的印刷術技術不同，不見得中國印刷術就優於西方印刷術。

關於「火藥」的描述，郭士立簡單提到：

火藥在中國比在歐洲使用更早。中國人製作的火箭、火藥很有名，中國人也把它們運用在戰場上。³⁷⁸

郭士立雖然描述到中國使用火藥比歐洲早，也稱讚中國的火藥、火器有名，但是，他沒有提到身處時代的中國火藥、火器情況。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裡，探討鴉片戰爭中國潰敗原因之一，就是當時中國的火藥、火器已大不如西方。鴉片戰爭時，清軍製造的火藥，仍是按照明末的配方，以手工業作坊或工場生產。³⁷⁹茅海建進一步分析中國在鴉片戰爭之前的火藥成分和品質，他認為清軍在鴉片戰爭時使用的火藥是粗劣的，造成原本落後的槍、炮效能更減。³⁸⁰清軍無論在槍、炮或火藥方面都遠不及英國，這是中國在鴉片戰爭中慘敗的原因之一。郭士立經常鄙視中國的工業、科技，但是對於中國火藥的落後情況，卻未加以批判。應是由於他的著作成書於鴉片戰爭之前，對於中國武備中「火藥」的落後情況無從得知。由此可見，郭士立對中國的認識仍受限於「過去」的中國。

有關「指南針」，郭士立談到中國船隻在航行時會用到羅盤來辨別方位：

中國人使用羅盤指出方位，他們不用六分儀、四分儀、天文鐘。中國人把羅盤分為二十四個部分，由南方開始。上面有一個可轉動的針。³⁸¹

郭士立在著作中描述了造紙術、印刷術、火藥、指南針，可見他注意到中國重要的發明。郭士立在自己的著作中是以平實的口吻介紹中國四大發明，不帶有特殊的評價語氣，且他對於中國四大發明的認識不是全然正確，也不是完全符合十九

³⁷⁶ 參考國立科學工藝館網站：<http://epaper.nstm.gov.tw/chinascience/F/f-index5.html>（下載時間：2012.10.18）中「明清兩代印刷術的發展」介紹。「聚珍版」是乾隆皇帝為木活字所取的雅名。

³⁷⁷ 有關古騰堡(Johann Gutenberg, 1398-1468)發名的金屬活字印刷術，可參考天主教百科網站：<http://www.catholic.org/encyclopedia/view.php?id=5460>（下載時間：2012.10.18）。其中介紹古騰堡以自己發明的金屬華字印刷術來印刷《聖經》。

³⁷⁸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147. 其中「火箭」原文是 rockets。

³⁷⁹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頁 38。

³⁸⁰ 前引書，頁 38。

³⁸¹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26.

世紀前期的狀況，他對中國四大發明的認知也許不是經由親眼觀察，而是得自前人的著述。郭士立可能認為，介紹中國四大發明，不會影響西方人對參與傳教事業的意願，所以他只是「單純的做出介紹」。

(三)中國的藝術—繪畫、雕刻、音樂

關於中國繪畫，郭士立說：

中國人的繪畫第一眼看到會覺得很單調，通常是用墨汁在樹枝上簡單地畫上幾筆葉子就完成了。³⁸²雖然中國很風行繪畫，但中國畫家不會去學習自然樣貌、透視法。廣東當地的畫家可得到來自歐洲的繪畫知識。他們的模仿能力很優越。能精準的複製任何風景畫。³⁸³

由這段文字敘述看來，郭士立不瞭解中國傳統繪畫重視「寫意」，不像西方繪畫重視「寫實」，中國與西方在繪畫技法、風格上本來就不同，郭士立並沒有體認到這點，所以他只談到中國畫家「不會」的技法，而沒有談到中國畫家「會」的技法。正如同廣東地區的工藝家、造紙工人擅長模仿歐洲製品，廣東地區的畫家也擅長模仿歐洲繪畫，郭士立又再度提到廣東人學習西方能力是優越的。或許，西方讀者看到郭士立這樣的描述，會認為只要開放港口，那麼中國人學習西方的能力是很強的，就像廣東一地人民一樣。其他城市也是如此，只要能使其他城市開放，必定會有更多中國人開始模仿西方科技、文化，那麼傳教士想提升中國人的心靈層次，讓中國人也學習西方人信仰上帝是指日可待。

中國人喜愛雕刻神佛，與西方藝術家喜愛雕刻人像不同：

中國人打造花崗岩和大理石的技術是很優秀的，但只能說是機械性而不具有藝術感。他們的神像雕塑採用泥土，並用金葉子覆蓋，這些神像的表情、外貌很誇張，不像希臘、羅馬的雕像在模仿人。製作神像要表現出精力充沛、偉大的樣子。也有一些塑造成勇士或馬匹的神像。中國人也會用青銅製作雕像，我們有看到很多漂亮的樣品。³⁸⁴

這段文字中，郭士立把雕刻、雕塑一起討論。他稱讚中國的石刻技術，但卻批評石刻只具機械性而不具藝術感。他可能是指，中國人擁有好的雕刻技術，但是所雕刻出來的作品，無論人像、佛像，都缺乏作品的意義，所以在他眼中不算是藝術作品。對郭士立而言，「有意義」的雕刻作品應是以《聖經》內容為主題，或者是為了彰顯上帝的偉大而刻。郭士立對於中國的神像雕塑敘述也不正確，中國神像雕塑若外表為金色，並非用金葉子覆蓋，應是塗有金粉，或者使用銅去做，才會出現金色。

³⁸²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49.

³⁸³前引書，頁 150。

³⁸⁴前引書，頁 150-151。郭士立提到「中國雕像只能說是機械性的雕刻，不能算藝術品」原文是：「...is merely mechanical, and cannot be considered an art.」

郭士立也提到中國的音樂，他認為中國的樂器不少，在生活中很多場合都需要音樂伴奏，但是中國百姓不懂得欣賞音樂，樂器也欠缺改善：

大家說中國古代的音樂能馴服野獸和野蠻人，但明顯地，今日這樣的音樂已不存在了。孔子也醉心於音律，因此他說若沒音樂那會三個月食不知味。孔子說，要統治整個王國一定要利用音樂來教化百姓。在我們的旅程中，看到所有婚禮、喪禮、閱兵都不可以缺少音樂。有一組樂隊包含了鑼、鼓、鈸、管…等，有很多管子的「號」就像器官，上有一到兩條線的吉他、三弦琴，組成和諧音樂。北京朝廷裡有一組樂班負責朝廷音樂。中國人把吉他彈得很好，有些樂手還會伴隨歌聲。但中國人民不懂得聆聽，多樣樂器組合起來並不和諧。就像中國大部分的事務一樣，他們發明出來樂器，卻不會加以改進。中國人無法享受我們的音樂，也無法模仿。他們只能製作出粗糙的聲調。³⁸⁵

郭士立說中國樂器吹奏起來不和諧，衛三畏也持相同看法：

中國的管弦樂隊或吹奏樂隊在盡情演奏時，敲進歐洲人的耳朵裡就像是最不調和聲音的匯合…可以說是這種不和諧的最佳寫照。聽起來好像每個演奏者各有各的調，每人都想表現突出，以自己的熱情和力氣壓倒競爭者；但如果細聽，就會發現在鏗鏘聲中仍有維持一定的秩序，一人掌握八度音階，不同的樂器照顧到各部分，然而仍是一片混亂，因為他們奏的不是同一調子。³⁸⁶

衛三畏也同時批評了中國的繪畫與雕塑：

他們在音樂上的缺陷使我們不會對繪畫和雕塑抱很大期望，因為所有這些都來自同一的美的感知能力，表現在聲音、形狀、顏色等方面，從其中一種的缺陷就可以概見其餘了。³⁸⁷

郭士立與衛三畏一樣認為中國人不具美感，中國的藝術是落後的，不僅音樂聽來粗糙不和諧，繪畫也不如歐洲人精準。³⁸⁸由此或可推知十九世紀前期的傳教士在看待中國傳統文化時，仍無法擺脫其西方人的思維，無法跳脫西方欣賞另一民族或另一國家的文化。

(四)中國的建築—城牆、運河、寶塔、烽火臺、墳墓、橋樑

郭士立發現中國建築物與西方截然不同，房屋內通常都有「龍柱」：

中國的建築不是希臘風格，也不是哥德式。我們發現皇宮、廟宇是蓋在浪

³⁸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151-152.

³⁸⁶ 衛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653。

³⁸⁷ 前引書，頁 654。

³⁸⁸ 前引書，頁 151-152。

漫的地點。建築物的藝術風格是固定的，有一堆柱子和龍、高入天際的屋頂。建築的形式都是固定的，很難用言語形容。在澳門的中國人有建造好看的房屋，這房屋漂亮到若是放進高級傢俱簡直就像皇宮了。這些建築物是按照被認可的形像去做成的，通常有廣大的金邊雕像，給人崇拜。³⁸⁹文中，郭士立沒有解釋什麼叫做「浪漫的地點」，清代皇宮紫禁城是在今天的北京市內，應不是特殊地點。郭士立有可能是看到中國的廟宇蓋在山裡或河水邊，認為這樣的自然風景遠離塵囂，因此可算是浪漫之處。中國清代宮殿建築中最高者為紫禁城太和殿，高35米，若用今日樓房一層約3米高來計算，太和殿大約十二到十三層樓高。³⁹⁰在1850年以前，應是中國少見的高樓，因此郭士立形容皇宮是「高入天際」。

郭士立觀察到「牌坊」的外貌，並與西方「絞架」做類比：

女人若被獎賞時，會受贈牌坊。牌坊有點像我們的絞架，但是更高更寬。最頂端一片平坦，有雕刻品裝飾。寫上成立此牌坊的原因，以及紀念者的名字。牌坊由三部分組成，中間是大的，兩邊是小的，柱子非常寬，用花崗岩做成。³⁹¹

郭士立還注意到中國特有的建築：寶塔、烽火臺：

最令我們驚訝的中國建築是寶塔。如何將石頭一片一片黏在一起實在令我們好奇。這些高大建築物對我們而言是陸地上美麗的風景，也像是海岸邊的燈塔。中國人用來發送信號的是烽火臺。這是一個三角形建築物，裡面挖空。烽火臺會排成一直線，因此若爆發戰亂，很快就能傳遞訊息。³⁹²

皇親貴族的宅邸有一定的形式：

親貴的宅邸很大，包含四到五個中庭，被一些簡單的建築物給包圍。宅邸都有兩到三個出口。在第一個中庭的入口處，駐守著侍衛，有侍衛的辦公室，接著是辦公正廳。³⁹³

郭士立認為中國的城牆是堅固的，中國人建造城垣的技巧算是不錯：

中國人對他們建造牆壁的技巧很驕傲，通常城牆都蓋很高。這樣這座城市才看得見。城牆的內部含有泥土，外部有些是花崗岩。城牆上有城垛，通常除了火藥與彈炮外很難摧毀。³⁹⁴

但是多數的城市並沒有經過設計：有些城市的街道設計有藝術感，但多數城市是

³⁸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52-153. 「浪漫的地點」原文：「romantic spot.」

³⁹⁰參考北京故宮—文化人民網：culture.people.com.cn/BIG5/40483/40484/4279188.html 有關紫禁城建築物介紹。

³⁹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53.

³⁹²前引書，頁153。

³⁹³前引書，頁154。

³⁹⁴前引書，頁154。

沒有設計的。」³⁹⁵

郭士立也看到中國墳墓的樣子：

我們看到浙江墳墓蓋的很氣派，這是其他國家墳墓無法比的。很難確切描述陵墓，因為它們是如此不同。墳墓大門口通常是開放式的，紀念物有包含一些甕和其他塑像，有柏樹、桂樹環繞四周。³⁹⁶

郭士立稱讚中國墳墓建造奇特，超越其他國家的墳墓建築。

郭士立對中國運河相當稱讚，他談到，中國人相當懂得利用水運，中國土地上蓋了很多運河及橋梁：

建造管道方面，中國人是比其他民族優秀，運河四通八達，不僅可灌溉也可運輸。運河都很寬廣，可通行吃水深的船隻，有好幾哩都沒有石頭。為了避免運河被人為破壞，每一段里程都派有守衛駐守。有很多橋梁蓋在上面，這種橋有五到六個拱門，就算不是很漂亮，但可以用很久。在橋的一頭，中國人會放置四到五步長的石頭。拱門頂端的石頭並不會比一般石頭細，但卻能互相連接。我們有看到 0.75 英哩長的橋，聽說還有更長的。這些橋主要是用花崗岩做的。³⁹⁷

此處，郭士立誤以為中國運河四通八達，實際上中國運河主要位在東半部，為南北向。中國西部地形多高山高原，人口少，無運河。他說中國人懂得如何控制水量多寡、避免水災發生：

所有中國的河流都從蒙古(Tatary)高原流下，在中國土地上交會。因此中國人會蓋堤防、引水道。若水太多，可打開水閘門讓多的水流入水道，以避免國家水災，並讓主要水道保持最適當的流量。³⁹⁸

不過在此處，郭士立的解釋有誤，他說中國所有河川源自蒙古高原，而實際上，中國兩大主要河川黃河與長江都起源於青藏高原。

衛三畏也對中國運河感到興趣，他更進一步說中國的運河建築比長城、甚至比其他國家的名建築物還要更有意義：

中國另一項重大公共工程是大運河，也稱作閘河或運河。策畫和實施這個工程的君王應贏得的榮譽，遠遠高於中國征服者所建的長城；如果考慮到挖掘的年代和策劃者的品格，任何國家的歷史上為數不多值得提及的工程，都不會比它更有意義、更有功用。³⁹⁹

郭士立還稱讚中國的橋樑：

中國人為了要連接兩座山，會花費大筆金錢蓋橋梁給旅人通行，他們在建造船隻時也沒有任何缺失，中國人在這些建築物方面是很優秀的。⁴⁰⁰

³⁹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54.

³⁹⁶ 前引書，154。

³⁹⁷ 前引書，頁155。

³⁹⁸ 前引書，頁156。

³⁹⁹ 衛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21。

⁴⁰⁰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大體而言，郭士立對中國的建築，無論是城牆、砲台、房屋…，在形式、建築技巧方面是持肯定態度。衛三畏在《中國總論》裡也對中國的運河頗為稱許，十九世紀前期的傳教士對中國建築物大體而言是持肯定的態度。

(五)中國的造船技術

郭士立發現中國內陸貿易發達，商品運送主要仰賴河運，有些中國人一輩子在船上生活，郭士立認為，中國人製作船隻的技術值得外國人學習：

中國有幾條管道是用來運送商品，因此中國人擅長建造適於在河中航行的船隻。建造船隻需花費許多心力，工人必須查看船隻是否有足夠的承載力，以及船艙是否能提供乘客良好的住宿品質。我們可以從中國人那裡學到優秀的造船方法。有許多戶人家以船為家，一生不曾住在土地上，連死亡都在河上去世。政府希望他們能到岸上居住，但這些人寧願照著傳統的方式居住。⁴⁰¹

他對中國船隻製作方法有詳細地描述：

最好的船隻有十六呎寬，八十呎長，九呎深，平坦寬敞。甲板上的通道兩旁都蓋有隔成間的船艙。每一艘船都有他的頭骨，用同樣的方法打造，像魚一樣的前進。船隻的樣式太多，很難一一概述。他們的船隻比起我們的船，須要更多木材，較少的鐵。錨也是用堅硬的木頭做的。中國人並沒有學到用銅來做船身可阻隔水。中國近海的船隻非常笨重又難看，那種船的頭有鷹勾鼻，接著有兩個翅膀和角。為了確保船不會迷航，中國人會在上面畫上眼睛。船身沒有按照甲板分成幾個部分。所有的木板都用釘子釘住，按鈕用石灰和樹脂做成，因此無法防止小蟲蛀蝕船身。船頭延伸到船尾都沒有龍骨或分水角，非常平坦，因此船隻可上岸，缺點是容易毀損，而且在深海不好操控。主船桅是船隻行進方向的主宰，其他就像裝飾品。船槳是用「莖」作成柱子，再連接木板。要升起船帆時，採用升降索和纜車來運用。升起來很容易，但降下來很難。每一摺布都有繩索綁著，末端束成一條。⁴⁰²

在這段文字裡，郭士立提到中國人會在船身上畫上「眼睛」。中國的海船頭上往往畫著一對大眼睛，其形樣和埃及的「太陽神眼」頗相似，古人稱為「鵠首」，在鄭和的寶船上也畫有眼睛。⁴⁰³其實，在船身上畫眼睛的習俗，不只中國有，台灣的達悟族獨木舟上也繪有船眼圖騰，在船身上畫船眼代表將船隻擬人化。船眼可以保佑出海的平安，並指引船隻到達魚群多的海域，也可安全領導人們返回家鄉。⁴⁰⁴郭士立對中國船隻外觀描述很仔細，不過他卻未進一步說明船身圖像的意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38.),p.156.

⁴⁰¹前引書，頁 24。

⁴⁰²前引書，頁 26。

⁴⁰³蕭兵，《避邪》，香港：萬裡機構·萬裡書店出版，2004 年，頁 154。

⁴⁰⁴施翠峰，《台灣原始藝術研究》，宜蘭：傳藝中心，2005，頁 276。

義。張靜芬研究中國古代造船技術談到，隋煬帝的「大龍舟」有四層樓高，使用到很多大、小木材料，須要很好的連結技術。「隋代大龍舟的連結方式是採用榫接，結合鐵釘釘聯。用鐵釘比使用木釘、竹釘聯結要堅固牢靠多了。隋代已廣泛採用了這種先進方法。」⁴⁰⁵可見中國在隋朝時打造船隻方式已使用鐵釘，郭士立寫船隻木板會用釘子釘住是正確的。不過，文章中說「錨」是以「堅硬的木頭」所做成，尚待查考，因為以常理而言，錨應是用石頭材質製成方能迅速沉入水中，若用木頭做，無法沉入水底。郭士立對中國船隻理解僅限於外表能見部分，其所蘊含的文化意義他沒有談論到。

(六)中國的天文學、曆法

中國人各門學科當中，郭士立認為只有天文學的發展比較有內容，因此他花了很多篇幅描述中國天文學的內容，其中提到中國人用來計算時間的儀器有漏壺、水鐘：

而數學科，除了天文和算數，中國人幾乎一無所知。天文曆法是首都中有特權的個人所制定的，這些人是政府雇用的。中國人將一年分成幾個月份。中國人會使用漏壺、水鐘來測量時間，仔細觀察星體運行而訂定冬至、夏至時間。這些科學是政府機構裡要學的，中國因為保留這些觀測紀錄而成為古老帝國。十三世紀有一位作家告訴我們，中國已經忽視天文學很久了，無法知道中國人如何預測月蝕。有人猜，中國人不像我們估算時、分，而是估算全部度數。他們寫下月蝕、彗星出現的時間，每次哪個小時、哪一天、哪一個月分、哪一年發生。中國人應該是接受過伊斯蘭教徒幫忙，修正估計值以及教導正確的方法。天主教修士到中國時，建造了一座黃銅打造的高大觀測器，放在南京郊外高山上。儀器裡有一個地球，上面刻有經緯度。這個儀器大到必須有三個人張開雙臂都還無法圍繞他。這個天文儀器區分為 365 度，在地球中間有一個管子可讓觀察者用任何方向觀察。有個儀器是象限儀，有四到五個單位長，放在大石桌上，指向北方，其中有一條小溝。當天主教傳教士獲准進入朝廷，並提問有關天文的問題，他們發現曆法上有很大錯誤，而被任命要造一個新的儀器。中國天文學家的觀測技術被質疑，應改革。⁴⁰⁶

這段文字應是寫康熙三年(1664)發生湯若望被判刑的曆獄案，後由南懷仁與楊光先進行天象測算比試後，南懷仁勝出，受到康熙皇帝賞識。康熙八年(1669)南懷仁受命製造新的天文儀器，即天球儀、黃道經緯儀、紀限儀、象限儀、地平經儀和地平緯儀，⁴⁰⁷在 1673 年製成，然而，這些儀器都是放在北京觀象台而非南京。郭士立未到過中國內地，更沒有去過南京，他不曾親眼證實天文儀器放置地點，

⁴⁰⁵張靜芬，《中國古代造船與航海》，臺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頁 69。

⁴⁰⁶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66-167.

⁴⁰⁷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頁 50。

故此段文字對於地點描述出錯，也可證明他所了解的中國知識，許多是來自前人經驗，而非出於自己親身經歷。明末清初，天主教耶穌會傳教士到中國所接觸的對像是中國朝廷中的皇帝、大臣，而皇宮地點是在北京，因此不可能跑到南京城外高山上設置天文儀器，郭士立對於設置儀器的地點描述錯誤。這段文字裡，郭士立把中國的天文學歸類在數學科中，應是由於，中國人研究天文星象，目的是為了制定曆法或占卜吉凶，而非單純地研究天體運行，因此，在西方人眼中，中國沒有獨立的「天文學」這一門學科。

郭士立談到中國百姓對太陽、月亮和流星外的天體不感興趣：

大部分的中國人，每日勤於農耕，對星座並不瞭解。天上唯一會吸引中國人注意的是太陽、月亮與流星。中國百姓對天體沒興趣。「太陽」象徵「火」「男性」，「月亮」象徵「陰」、「女性」，是溫柔的。中國人把彗星稱為掃帚星，若彗星有點為紅色，表示地球將有災難發生，也象徵政府即將被推翻，會有一連串壞事發生。⁴⁰⁸

郭士立瞭解中國人用陰陽五行去解釋行星的運轉，且中國人用陰陽五行去解釋各種自然現象，⁴⁰⁹而人類行為，特別是皇帝的作為會影響到星體運行：

至於行星有五種：金木水火土，也就是「五行」。無論中國人有價值的天文知識為何，都已被天主教羅馬教士所帶來的知識取代了。他們過去的知識不被一般社會大眾所接受。中國人認為，天子的行為會影響宇宙運轉，北極星所在地就是天庭所在。⁴¹⁰

中國人研究天文學的原因是要制定曆法，以方便進行農耕：

學習天文學在中國是要用來制定曆法。每年中國政府都會頒布三種曆書。三種曆書中，最普通的一種是將每年分為數個陰曆月，每日預測太陽升起的时间和落下的時間，白天和晚上的長短分配，以及月亮出來的時間。也會寫出月亮圓虧時間和太陽何時進入到黃道帶。第二種曆法是包含個別星球的運作。第三種曆法是只給皇帝看，用手寫，上面有月亮和其他星球，把各種星球標示在刻度上，會記載適合結婚、旅行、建造房子的時間。中國人的「年」是以六十為一個單位去循環。中國人的年份是從日、月的連接點開始，每年在二月十五日，進入春節，此時是寶瓶座。在金牛座的第十五天是夏天開始，獅子座第十五天是秋季開始，天蠍座第十五天是冬季開始。一年包含十二個陰曆月，有些是三十天，有些是二十九天。中國人的月份並沒有取名，是用數字表示，每十五年有一次閏月，一年又分為二十四個節氣。每個月分又會分成三等份，每天並沒有特別的名稱。一天分為十二個時辰。中國人對天文曆法研究成癮，但皇帝自己卻不承擔研究責

⁴⁰⁸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168.

⁴⁰⁹前引書，頁 168。

⁴¹⁰前引書，頁 168。

任。⁴¹¹

這段文字又出現矛盾之處。前文提到「大部分中國人每日勤於農耕，對星座不瞭解」，何以此處又說中國人對研究天文曆法成癮呢？郭士立應該作出區分：研究天文曆法是欽天監成員的工作，而中國人民多數只是遵循朝廷頒佈的曆書進行農耕。郭士立此處對中國陰曆置閏月的解釋錯誤。陰曆閏月算法應是每十九年需加七個閏月，陰曆月份裡通常須包含一個節氣一個中氣，如果僅出現節氣而無中氣時，便置一個閏月。⁴¹²

(七)中國的醫學

郭士立詳細地探討中國的醫學。他指出中國醫生並沒有受到完整的教育訓練，很多醫生是來自科舉落榜的文人，甚至有些是不懂醫術的騙子：

中國醫生並沒有受到政府的管控，醫生也沒有經過正式的考試或正式訓練。只有那些國子監生或軍隊中的醫生，他們是滿洲人，才有被訓練。在城市或村莊裡都可以看到習醫者。醫生某種程度上相當於外科醫生。各村莊、城市都有行醫者，很多是失意文人，沒通過科舉考試而去習醫。中國有數以千計的郎中行騙醫術，很多人民被其口才所騙，郎中幾乎只能醫治一種疾病。⁴¹³

郭士立在文中對中國醫生的描述大致是正確的，他很細心地觀察到，中國社會中有很多行騙醫術的郎中。他所謂「郎中幾乎只能醫治一種病」，這種病指的是「慢性病」。中國郎中以沒有醫學根據的藥行騙生病者，他們無法醫治急症、做外科手術，只能行騙慢性病患者。

他發現中國人民較注重醫生的道德而非他的醫術：「中國醫生並不專業，中國人稱讚醫生的道德比稱讚醫生的技術還要多。」⁴¹⁴

在書中，郭士立提到中國醫學祖師是神農氏，名醫華佗是他的追隨者：

神農在嚐藥草時，會分析出哪些藥草是有藥物性的，並解釋所有藥草可以治療什麼病。他有很多追隨者，其中最有名的是華佗，他精湛的醫術使人把他奉若神明。華佗曾把骨頭損毀之處修好，把一個年輕皇子的眼疾治好，這令倫敦的內科醫生吃驚。但華佗拒絕醫治一位將軍(曹操)，而惹來殺頭之禍。但可惜的是在這世界上，所有他的書都被燒光，而其中很多是可以拯救人生命的書。⁴¹⁵

⁴¹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70-172.

⁴¹² 關於農曆設置閏月的方法，見中央氣象局網站裡「農曆置閏原則」說明，網址是：<http://www.cwb.gov.tw/V7/knowledge/encyclopedia/as091.htm>(下載時間：2012.10.20)

⁴¹³前引書，頁 173-174。「只有那些屬於北京學校中或軍隊中的醫生是滿洲人，且有被訓練。」原文：「Only those belonging to the imperial college at Peking, and the surgeons of army, are mandarins, and have been previously examined.」

⁴¹⁴前引書，頁 174。

⁴¹⁵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他提到中國最有名的藥學著作「本草綱目」：

中國醫藥，藥物學比我們更廣泛。藥劑師會從大自然界各角落尋找適合的藥物，全部寫在本草綱目中。這部著作共有五十二卷，明代完成，作者整理了前人的藥物貢獻，編者把所有藥草特性都寫下來。本草綱目中有記載水果樹的種類，也有記載動物，分為昆蟲、害蟲…。⁴¹⁶

中國的藥物學也是結合陰陽五行：

「陰」、「陽」的觀念就像存在於全世界一樣，也適用於藥物學。人類身體會視需要而選擇「陰」性或「陽」性藥物。藉此分別哪些是受歡迎的成分，他們的味用五行去分別。人參是藥草之王。⁴¹⁷

郭士立提到中國人也用動物來作藥材：

麝香鹿是動物界中最高等的。牠能淨化空氣，把三種吞進胃裡的昆蟲排出，可去除丘疹。若眼睛長針眼也可以醫治。鹿角、虎骨都是很有用的補藥，螃蟹也有藥物作用。大象可利用他的肉、膽汁、眼、皮、骨，單峰駱駝也是。⁴¹⁸

「茶」除了用作日常生活中的飲料，也有醫療效果：

茶可以改善消化系統，減緩胸腫發炎、畏寒現象，提振精神，不僅是葉子，連種子都有好的用處，並對氣喘和暈眩有效。⁴¹⁹

雖然中國的醫藥仍比不上西方，但是仍有少數受到西方藥學家認可：

儘管中國人的醫藥觀念很粗糙，他們仍然有很多優良的藥是我們的物理學家會推薦的。例如，「泥罨劑」這種藥草，我們並不瞭解它的成分，但它的確對治理癌症有效。中國人有硫酸鹽和其他化學調製品。雖然他們的化學知識很少，只有少數是我們推薦的。大約有三百多種常用，通常混有二十至四十種成分的複合物。藥採用「煎煮」和「做成藥丸」是最常出現的形式。⁴²⁰

郭士立在文章中提到：嚴格來說，中國並沒有化學藥劑師(druggist)，只有藥商(apothecaries)。⁴²¹

中國也沒發展出解剖學，而是用陰陽五行去解釋人體各項器官：

中國醫生不瞭解解剖學的藝術。根據中國人觀念，人體就是一個小宇宙，和大自然的物質都有關係。「陰」、「陽」是維持生活的兩條規律，人也是由五行組成，五行相生相剋。人體是一個小宇宙：肝—木—綠、心—火—紅、肺—金—白、腎—水—黑、胃—土—黃。全身又分為左右兩部分，上下又分為頭、軀幹、腳。動脈、靜脈、肌肉、肌腱，身體就像用水泥把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38.),p.173.

⁴¹⁶前引書，頁 174-175。

⁴¹⁷前引書，頁 175。

⁴¹⁸前引書，頁 177。

⁴¹⁹前引書，頁 176。

⁴²⁰前引書，頁 177。

⁴²¹前引書，頁 175。

管線都封住，全身各部份都很接近。⁴²²

郭士立指出中國常見的疾病有一千多種，中國人深受眼疾、腰痛、痛風、風濕病、皮膚病、胸腔病所苦。相較於歐洲人，中國人所患疾病輕微多了，而且中國人是很能忍受病痛的民族：

中國人大體而言是健康的民族，不像歐洲人容易染病，且中國人較能忍痛，疾病剛開始常會輕忽它，最後變成慢性病。中國人很能忍受勞累、貧困，而又不曾傷害身體。當中國人生病時，會毫不遲疑服用醫生所開的藥方，且通常認命地服用藥物。⁴²³

他提到中國人想保存完整軀體而不願接受手術的觀念，也驚訝於中國的「診脈」醫術：

我們的藥物用在中國人身上比用在我們身上還有效。中國的醫藥醫術還有診脈。在「用手」預測疾病上，中國人比我們還厲害，這令我們驚訝。但我想這種診斷方式須要長時間經驗，才能看出是否正確。有二十四種脈象，例如，脈象中，右手有輕微跳動者代表有氣喘，左邊跳動代表胸腔是正常的。觀察完脈象後就要開處方，如果診斷有誤會被法律懲罰。醫生會小心觀察病人，如果又被病人叫來，就必須好好審視藥方是否有誤。中國人很少動手術，他們反對輸血或移植器官。當所有內服方法都沒用時，才會不情願地接受手術。但他們不願意切除軀幹，這是因為他們必須保存身體完整，也不想失血。中國人的皮膚常會起水泡，這對我們而言容易醫治，但中國人通常輕易放棄醫治。⁴²⁴

(八)中國的修辭學

郭士立批評中國人不懂「修辭學」、「邏輯」：

很難向中國人說明世界的科技發展很前進，應該扔掉舊思想。中國百姓日常生活中的對話不會使用修辭，修辭學對中國人而言是無用的學科，並非所有人都會學習。因此在中國，幾乎沒人真正懂修辭學，也不懂文學的藝術。中國也沒有發展邏輯學，即使是古典經文也沒有任何邏輯可言。最好的作品文筆仍有許多紊亂。在中國，沒有任何用來形容「邏輯」的文字。

425

中國雖無「修辭學」這一門學科，然中文的修辭已隱含在文句中，否則如何會出現絕句、律詩中的對偶、押韻呢？中國文學中的排比、對仗、譬喻其實都屬於修辭技巧，雖然「修辭學」(rhetoric)這個專有名詞是西方人所發明，但中國文學中

⁴²²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38.),p.177-178.

⁴²³前引書，179。

⁴²⁴前引書，頁179。

⁴²⁵前引書，頁165。「中國大眾對公眾語言沒有使用修辭」原文：「Where public speaking is not practised, rhetoric becomes a useless science, which nobody will study.」

早就有運用修辭技法。如果郭士立是指中國百姓不會在日常生活當中修飾自己的言語，歐洲老百姓難道就會注意修飾自己的日常對話？顯然這又是郭士立出於歐洲的優越感，他要貶低中國人不懂得高級文學。

(九)中國的教育

在談完中國的硬體建築後，郭士立開始談到中國教育。他描述到，中國老祖宗很早就體認到教育的重要性：

古代聖賢在教導人們耕種後很快發現如果沒有教育中國人，中國人很快會變得野蠻，因此建造學校，到今日幾乎沒有改變。家族有他們的學校，村莊有他們的，所有人都有機會受教育。

郭士立提到，在中國，所有人都有機會受教育，這是錯誤的。中國女性無法受教育，即使是男性，也多是有錢者、世家大族子弟才能受教育。多數中國百姓務農維生，沒有接受教育也不識字。

郭士立說中國古代聖賢希望透過教育，促使所有人都守本分以維持社會和諧：

天、地、聖賢是三股很大的力量，結合在一起推動人類家庭成長。天創造地、地養育人、聖賢則教導人。所有在地球上的居民和勞工都快樂和諧的生活著。就像歌曲唱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我們要努力耕種、暢快飲酒。我們種植田地，我們有糧食吃，帝利與我何關？這就是教育的成效，可以完成它的獨特目標。這樣的言語被重複讚頌著。⁴²⁶

而中國教育的目標是：「教小孩子讀、寫，藉由『仔細地讀古典經學』而瞭解聖賢精神。」⁴²⁷中國人是注重教育的，他說：

根據中國人的常規，聖賢母親當孩子還在肚子裡時就開始進行教育，當孩子能講話時，就該認真的教導。⁴²⁸

郭士立指出中國啓蒙教育讀本由三字經開始，進一步讀四書

最早的啓蒙讀本是三字經，或三音節的古書。啓蒙教育的主題是人的天性，子女或兄弟之間應該負擔的責任。四季、六畜、七情、八音、九族、十責(十項責任)。大學課程有一特別的書—歷史，會列出興盛的朝代。啓蒙教育目的在培養榮譽感，促使中國人有學習動機。有 365 個子題，每個子題有三個特徵，寫成小品文。這些教材是宋代的人寫的。學習的課程有：四書—倫語、孟子、大學、中庸。每個讀書人都要念完四書，倫語一共包含了二十章，紀錄的孔子的話語。孟子有七章，談到道理、美德、仁慈、公正。五經有詩、書、易、禮、春秋。⁴²⁹

⁴²⁶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59.

⁴²⁷前引書，頁 160。

⁴²⁸前引書，頁 160。

⁴²⁹前引書，161。

郭士立認為學童的啟蒙讀物是簡單易學的：

小朋友所讀的初級讀本，內容變化很大，有趣又活潑，容易瞭解而不需要另外注解，能被流暢的閱讀。不至出錯。這些讀物還有一個重要目標是培養孩子的榮譽心而良性競爭，以證明他們是成功的。這些讀物告訴孩子應該趁年輕時好好學習各種課程，而逐級晉升。中國政府裡的上層官員對文學是非常精通的。為了欣賞這些小冊的價值，翻譯必須要加入音律。⁴³⁰

念完啟蒙讀本後，教師開始教學童背誦四書五經內容，但是不會加以解釋：

在這些啟蒙讀物之後，孩子要開始念四書五經，四書五經念完後就結束初等教育了。學習四書五經的方式就是把他們記在心中，不用去理解他們。

一個小孩學習兩年後，就開始教導他閱讀四書集注。⁴³¹

教師會教學童書寫，帶領學童學習新字、新句子，但是大部分學童受教育時間很短，通常是有能力可以寫出一篇文章就停止受教育：

第一次教授書寫是用黑色墨水寫在紅色框出的簡單筆畫，接著再用筆描摩在一張透明紙上，這就是大部分中國人取得的知識。此後，要學著開始自己寫文章。只要他可以寫出一封有文理的信，教育過程就結束了。這樣的教育至少要花五年時間，大約到八歲可以流暢地閱讀一般書籍，並能寫信。每個去上學的男孩坐在一張書桌前，只要他還有肺活量就從早唸到晚，跟著老師大聲朗誦。老師會教他們唸新的字或句子，並寫下文字。接下來就「沒有」任何教育了，連口頭上的教導都沒有。⁴³²

十九世紀前期到中國的傳教士對於中國的教育頗有非議，衛三畏也談到，中國學生的教材無法啟發思考，初等教育教材以《三字經》一書為主，要求學童必須熟背，但是《三字經》本身就不是具有吸引力的一項教材：

它作為啟發年輕人心智的讀物是很不完善的。寧可說是事項舉要，而不像供研讀的書，不適於作為有吸引力的精神食糧，誘導孩子去做功課。然而，這最後四個朝代中它的影響也許和經典一樣大，無數的孩子會“背”這本書，但是沒有閒暇學更多的東西，他們跨越了這個津渡，卻不能旅行得更遠。一個孩子從讀這些格言開始受教育；到時候他得到學位……⁴³³

由於中國初等教育只教孩童背誦，沒有引導孩童理解書中道理，雖然學生懂得認字和讀音，但是不瞭解意義也是枉然。除了《三字經》，衛三畏更是用相當直接的語氣批評中國書籍，彷彿書中知識完全沒有價值可言：

總體而言，中國人在天資和想像力方面，較歐洲人為劣，他們的語言文字是單調貧乏的，中國文獻充滿著令人生厭的重複語句和無法使人滿意的理論。在這種狀態下，科學，不論數學、物理、博物，在最近幾個世紀內沒

⁴³⁰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162. 「五音步行詩」原文是「pentameters」；

⁴³¹前引書，頁163。

⁴³²前引書，頁163。

⁷⁶衛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367。

有多少進步，現在一切學科都在期待著來自海外的勢力。⁴³⁴

郭士立還談到，中國學校的教學模式是一成不變的：

中國的教育沒有任何計畫或特殊方法，幾乎一成不變。所有學校的模式都是一樣的。學校裡很少有女學生，而教師的性別比，女教師幾乎只有男教師的千分之一。⁴³⁵

十九世紀前期，中國學校內的老師應無女性教師和女性學生，郭士立所謂「女教師是男教師人數的千分之一」，這個數字來源是令人懷疑的。

郭士立在敘述完中國教育的狀況後，他開始批評中國教育：

那些想取得功名的人會持續讀經典，學習歷史、詩。他們會訓練自己作文的功力，寫文章會按照最好的格式，並致力於按照規格寫詩。為了激發念書熱情，在適當時機父母或政府會舉行考試。很可惜，這樣的教育從小就遏止了真實知識的取得。⁴³⁶中國人學習很多古代事務，但很少有東西可移到現在來用。他們從來沒有接觸宗教，沒有學到欣賞神所創造的天堂和地球，僅被教導聖賢道理或形象，因此中國人的心智是僵化的，沒有取得更好知識的方法。我們相信，只要有充足的機會，中國人就會愛上救贖，偶像會被打倒。⁴³⁷

這段文字中，郭士立提到中國政府舉行考試是為了激發學生念書，顯然因果錯置。正確來講，應該是：中國政府為了選才任官而舉行科舉考試，士人為了進入仕宦之途才努力唸書。舉行考試並非想藉此激勵士人追求學問。郭士立認為中國教育缺乏帶領學生認識宗教，衛三畏也有同樣看法。⁴³⁸綜上所述，可將郭士立對中國教育的批評整理為三點：第一，中國教育是教導學童機械化背誦，缺乏培養學童的自我思維，教育目的不在追求知識。第二，中國人受教育的時間很短，缺乏一連貫有系統的教育機構。第三，中國教育欠缺教導學童認識「宗教」，所以中國人不認識創造世界的上帝。

小結

本章第一節中，探討郭士立所觀察到的中國社會現象，他特別關注中國社會中的「女性地位」和中國底層社會的百姓生活。郭士立談到中國有溺斃女嬰的習俗，對中國人而言，家中誕生女嬰不是一件光彩之事。同時期的西方人，也談到中國男性、女性的社會地位相差甚大。西方人也關注中國「纏足」的傳統，但是

⁴³⁴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628.

⁴³⁵ 前引書，頁 163。

⁴³⁶ 前引書，頁 164。

⁴³⁷ 前引書，頁 164。

⁴³⁸ 衛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頁 362。

對於「纏足」的由來解釋並不正確。郭士立在中國傳教，接觸對象多是中國社會底層的平民百姓，他認為中國百姓生活貧窮、困苦，但總會熱情招待外國人，郭士立樂意與這些窮人交往。十九世紀前期的雅裨禮、丁韞良，對中國社會「貧窮」的特點也多所描述，他們認為中國社會裡有許多乞丐，這些乞丐是有組織的。而非傳教士例如席爾、老尼克則對中國乞丐避之唯恐不及。郭士立在描述中國窮人生活時，不會像「非傳教士」帶著極盡輕蔑的口氣，而是充滿著憐憫之情。這是因為郭士立若把中國窮人的生活環境描述成無可救藥的樣子，反而會另西方人覺得沒必要解救中國人、沒必要支持郭士立的傳教事業。所以，郭士立在寫作時，必須說明：中國窮人雖然衛生習慣不佳、生活環境髒亂，可是中國窮人並不排斥傳教士。傳教士能將西方進步的醫學知識帶進中國，可以教導中國人如何改善衛生環境，所以只要中國窮人願意與傳教士往來，就有機會改善他們的生活，郭士立要藉由文章告訴西方人這項改善的「機會」，他期盼西方人看到這個機會後願意支援傳教工作。

本章第二節中，探討郭士立在著作裡所介紹的中國文化，包含科技發明、建築、工藝、文學藝術、教育等。郭士立對中國的建築、傳統科技發明多有稱讚，但是對藝術、教育卻大加批評。這種論述在 1797 年所出版的《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中，⁴³⁹可找到一樣的特點。斯當東(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在日記中提到，馬戛爾尼使團打算在圓明園中安裝儀器，這個儀器中有玻璃，但是玻璃的尺寸不合。所有外國工匠都束手無策，找來中國工匠卻能輕鬆解決。中國沒有玻璃工業，但中國工匠卻能想出辦法來彎曲玻璃，可見中國工藝水準是很高的。⁴⁴⁰日記當中也稱讚中國人發明火藥、造紙術、印刷術。⁴⁴¹談到中國繪畫，卻批評中國人不懂立體感，絲毫不懂配景法與調和明暗面。⁴⁴²郭士立在 1831 年到中國後，直到 1838 年出版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n the Chinese Empire* 一書，在七年之間要對中國做出全盤觀察、瞭解是相當難的，他著作裡的中國知識勢必有部分得自前人研究。在中國文化方面，郭士立對工藝、建築、運河等「硬體」有褒，對教育、音樂、美術等「軟體」有貶，與十八世紀末斯當東的日記寫法如出一轍，或許此二書是有關連性的。

郭士立談論完中國文化後所做出的結論是：「中國人在藝術、科學方面仍是落後的，須要上帝來啟迪民智。」⁴⁴³儘管在文章中，他承認中國的房屋、管道等建築技術優秀，他仍然回到身為傳教士的立場，告訴西方人應該由上帝來帶領中國人進步：

⁴³⁹ (英)斯當東著 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上海書店，2005。

⁴⁴⁰ 前引書，頁 371。

⁴⁴¹ 前引書，頁 374。

⁴⁴² 前引書，頁 379。

⁴⁴³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81.

中國人還有很大學習空間，雖然他們的無知是看不見自己在藝術、科學方面的落後。然而，真希望已帶給歐洲、北美洲人民許多恩澤的神也可以造福中國人。相信上帝不會忽視他們的。若上帝願意降福，中國人將會成為一等民族、充滿知識、擺脫黑暗，這將是多麼神聖的景像啊。⁴⁴⁴

郭士立認為，中國的文化裡欠缺高層次的「精神」層面，中國人在「道德」、「心智」上，都是既無知又驕傲。即使他曾讚賞中國有傑出的建築設計、手工藝品，但缺乏精神層面的中國文化，仍是低水準的。而提升中國人的文化水準，只有靠「令中國人改宗」才有用：

教導中國人提升道德、心智層次，會比征服印度人更有建設性、更光榮。假如我們把花在戰爭中的金錢，拿百分之一去教導中國人，那中國人就不會像現在這麼低層次。中國人實在應該看看這些已啟蒙的民族，他們受到福音感召，並關心同伴。噢！這些民族絕對不會把救助中國人當成白費力氣。中國人已經經歷過好幾世紀的黑暗。無知又驕傲的中國人、沒有接受教會光明的中國人。如果歐洲人可以成功組織教育中國人藝術、科學的團體，那中國將會有很大的進步。這個計畫必須拒絕讓唯利是圖者參與。如果我們的要求不受重視，就必須請基督徒來推動這個神聖的工作，因為這些人的心智已接納了基督，必能成功打開這條道路。⁴⁴⁵

最後，郭士立仍然回到傳教士的身分，用他極富情感的口吻，呼籲歐洲人投入「拯救中國人脫離黑暗」這個神聖計畫。而他自己，就是這項計畫的領導者。郭士立在評價中國文化時，採用「像不像西方」、「是否符合西方觀念」為標準。只要「像西方」、「符合西方概念」者就是好的文化，行文中流露出身為歐洲人的優越感。但是，郭士立對中國歷史掌握不清，在敘述中國文化時出現錯誤，前後文章也多處矛盾，他本人卻未發現。

⁴⁴⁴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81.

⁴⁴⁵前引書，頁 181。

第五章 郭士立眼中的中國宗教

本章要討論郭士立如何敘述中國宗教。他斥責中國多數人信仰的佛教、道教只是迷信，甚至說佛教是經由扭曲基督教的教義而出現。郭士立觀察中國人的宗教信仰後寫下自己的意見：中國人長久以來不認識上帝，心智為多神信仰所蒙蔽，中國人是處在黑暗、未開化社會中的盲目民族，急待傳教士為他們引進光明。郭士立期盼透過自己的著作，可以呼喚更多西方人關注、支持中國的傳教事業，而作為「異教徒」的郭士立，又會如何觀察中國宗教？第一章裡，討論郭士立筆下的中國佛教與道教，第二章中，探討郭士立筆下的天主教與基督教。

第一節 道教、佛教的粗略認識

郭士立到中國的最終目標是向中國人傳教、促成中國人改宗，他自然會對中國宗教做一番詳盡地觀察。第一節裡，第一、第二部分會分別就郭士立的著作，討論他如何描述中國主要信仰——道教與佛教，以及郭士立對中國道教、佛教之批判和誤解。另外，郭士立把中國政府舉行的祭天儀式，或者中國人民的節日慶典、生活習俗、祖先崇拜，都歸類為「宗教」範疇，顯現他對中國的道教、佛教認識仍很粗淺。在第三部分裡，將一併討論郭士立如何描述這些習俗、儀式。

(一)中國道教

郭士立在書中對於中國道教所做的介紹，可以分為幾方面探討。第一，關於道教創立者，郭士立誤把老子當成道教的創立者：

我們先前有提過「道德經」是老子唯一留下來的著作。就像每一個改革者，在所有宗教事務的獻身者中，他會得到很高的榮譽地位。歷史上有很多神話傳說、寓言故事談到老子，幾乎把他當成「仙」。老子比一般人更具知識，因此他可以說出自然界的精所在，並以此解釋政府的運作。老子使神仙理論推廣出去。⁴⁴⁶

郭士立解釋道家政治原則主張無為而治，這點解釋正確，不過他將中國「道家」與「道教」混為一談。老子是道家創始者，但非道教創始者，更不可能「推廣神仙理論」。可見郭士立對於中國的「宗教」與「學術思想」無法清楚分辨。

第二，關於道教的教規、儀式，郭士立特別提到道教有「過火」儀式：

每個人的精神並非純潔的，通常都有邪惡的一面，處在天地之間會有很多

⁴⁴⁶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211.

妖魔，行為因此會受到影響，有時良善有時做惡。脆弱者的靈魂會變成魔鬼，惡魔會留在地球上，這是為了懲罰他們所犯的錯。這就是道教的主張。這些主張在孔子之前就已出現。有人住在山裡面與靈魂交談，使自己不受外界干擾。他們也藉由這樣退隱山林而向人們介紹他們的教條。不僅受到民眾熱情的招待，也受到皇親貴族的召見。中國人相信「仙」的存在。這些神仙若是沒有滿足中國人的願望，祂的廟宇就會被損毀，神像會被鞭打，神的名字會被刪除。中國人會互相告知神仙是否靈驗。有人是神仙與凡人間的溝通者。⁴⁴⁷只有少數道教僧侶是維持獨身、與世隔絕。道教徒認為，頭頂上有「三清道祖」，或「玉皇大帝」，他們被奉為神明。中國人崇拜 Hwa-Kwang 這光明之神，他們不避諱把他當摩洛哥人崇拜的火神。在他的生日那天，會點燃煤火，人們會赤腳扛著光明之神的神像過火，以證明光明之神能保佑他不受傷。筆者自己就曾經看過這種場景，親眼看到被雇用的人倉促在咒語中進入火堆。數次燒傷燙傷，每年都有很多人死掉，但儀式還是每年舉行。⁴⁴⁸

郭士立在這段文字中所提到的過火儀式，目的並非為了「證明光明之神能保佑他不受傷」，而是人們為了淨身潔體，辟邪祈安。⁴⁴⁹

郭士立在此說明，道教這些教義其實不是孔子能接受的：

孔子曾說要小心這些人(子不語怪力亂神)。孔子一向也不參與談論神仙。

孔子的學生曾經成功地攻擊過老子的觀念。⁴⁵⁰

第三，郭士立特別關注道教中的「丹鼎派」：

道教徒致力於尋求長生不老丹藥，而這些煉丹者也成為少數接觸化學的中國人：

道教還有很多神祕之處，道教徒永遠在追尋不朽的藥酒，因為想長生不死。這種靈丹妙藥是用草藥混合的，但對人體的健康有害。當追隨者的健康受損時，教徒就會告訴他們：你即將要成仙了，快要可以永生不死了。然道教僧侶要在有限時間內延長生命這點並不成功，但仍有很多人追尋吃神仙的食物，且很快導致死亡，就像西方煉金術出現一樣。雖然中國人從不曾發現這個大秘密，但他們仍對煉金術保持嗜好。煉出來不是一堆金子而是一堆浮渣。不過，這使中國人更懂化學，這群人也是中國人中唯一懂得實用化學的人。那些取得更高層知識的人，把自己當成像印度苦行僧那樣，在各城市和村莊間乞求人們的憐憫。筆者曾看過他們用釘子釘入自己的頭骨，使得身體受到損傷，他們在各房子之間乞食。⁴⁵¹

⁴⁴⁷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210.

⁴⁴⁸前引書，頁 212。其中有關「光明之神生日時舉辦的儀式」，原文是：「On his birthday a large coal fire is made, and persons are hired to go through it bare-foot, carrying the standards of the idol, in order to prove that he has power to subdue the violence of the element.」

⁴⁴⁹黃文博，《台灣民俗趣譚》，台北：台原出版社，1993，頁 130。

⁴⁵⁰前引書，頁 211。

⁴⁵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這段文字裡，郭士立描述「道教徒永遠在追尋不朽的藥酒」，應是指道教裡的丹鼎派，爲了追尋長生不死而煉丹。丹鼎派從追求長生不死目的出發，推動了中國古代冶煉、氣功養生學的發展。⁴⁵²丹鼎派所煉的丹，是以鉛、汞、硫、砷一類化學物質爲主，⁴⁵³並非如郭士立所言由「草藥」混合成，也不是一種「藥酒」。道教儀式中，也未見有「將釘子插入頭骨」儀式。郭士立可能看過中國人「將釘子插入頭骨」這一景像，但有可能是他碰巧遇到中國騙子，因爲他在文章中也描述到，曾看過會表演把戲的騙子，而他也認爲這騙子是「道士」：

道士會熟練的表演一些把戲，除了相信眼見爲憑的人之外，即使是已受啟蒙的人都會受騙。我們曾和道士同住過，我們用常理判斷相信那些僧侶是不名譽的人。雖然道教法師並沒有花很多時間去教育人民，但他們很瞭解如何激發人民的恐懼，用恐懼填滿人民心中，加以斂財。⁴⁵⁴

在郭士立眼中，「道士」等同是一群「騙徒」，藉由一些把戲向百姓詐財。可見，郭士立不僅無法區分出「道家」與「道教」不同，他也將道教的「道士」與「騙徒」混爲一談了。

第四，關於道教僧侶，除了上述談到郭士立將中國的道士與騙徒混爲一談外，他也批評道教僧侶是自耕自食，對國家的生產力沒有幫助：

除了皇家寺廟必須供養的僧侶之外，無論是道教或佛教僧侶都太多了，他們是不繳稅給國家的。僧侶自耕自食，他們要隱藏自己的慾望，有很多僧侶像乞丐，蹲在別人的家門前接受別人的餽贈。⁴⁵⁵

郭士立提到道教有許多隱士，就像猶太苦修教派(Essense)和畢達哥拉斯學派(Pythagoreans)一樣：

在所有民族之中，總會有人是被這個世界所嫌惡的，這些人在退休後想尋歡作樂。除了隱士和托鉢修士外，還有很多神祕人士，追尋避世的快樂。深刻地反省自己。這些人通常是和平又慈善的，在很多方面聰明的人，這就是對中國道教徒最好的描述。我們覺得道教很接近猶太苦修派教徒和畢達哥拉斯學派。他們在追尋的目標方面是一樣的。道教和佛教在教義上有相似也有相同的地方。道教的教義使它曾成為國教。很少有民族會否定靈魂的存在，也承認靈魂會影響到人的生存。⁴⁵⁶

郭士立似乎認爲，道教徒都是避世隱居者，而實際上，道教徒除了出世僧侶外，也有入世僧侶，藉由煉丹、畫符爲人治病、趨吉避凶。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38.),p.212-213.文中提到「釘子」原文是：「an iron nail…」

⁴⁵² 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頁200。

⁴⁵³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台北：桂冠，1991，頁470。

⁴⁵⁴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38.),p.213-214.

⁴⁵⁵ 前引書，頁214。

⁴⁵⁶ 前引書，頁207。

(二)中國佛教

郭士立向西方讀者介紹中國佛教。首先，他談到佛教起源和佛教在中國的歷史發展：

漢明帝時派使者前去印度帶回很多經書和僧侶，從此佛教在各省中快速傳開，很多中國人開始信仰。中國史家記錄了佛教興盛的過程，這讓史家在記載迷信歷史時也失去尊嚴。後周時有三百名僧侶去印度取經，當朝廷被女人或宦官掌控時，佛教特別盛行。當很多人開始接受怪誕、荒誕的慰藉，失去理性力量，這就是腐化的開始。相反的，有知識的人總是致力於指出它的荒謬。但是這反而造成更多人加入佛教反政府。我們很難得知有些皇子出家是因為政治原因還是因為個人問題。梁武帝就是個例子，他出家修行幾乎要把自己餓死，最後他失去國家。⁴⁵⁷

這段文字中，郭士立說漢明帝派使者前去印度帶回很多經書和僧侶，這件事應是指，東漢明帝派遣蔡愔前往天竺，蔡愔從天竺帶回佛經和攝摩騰、竺法蘭兩位僧侶。這兩位天竺僧人到中國後，協助翻譯出《四十二章經》，他們的活動地點主要在洛陽。然而，郭士立說佛教在漢明帝時期「在各省中快速傳開」，與事實不符。佛教應是在魏晉時期，由於戰亂因素使中國信徒增加。佛教傳佈到各地，應不是如郭士立所言，始自蔡愔回中國。

郭士立談到佛教傳到中國，爲了適應中國傳統習俗而在教義內容上有所轉變：

佛教在中國並沒有維持它原來的單純風貌，外來者很難消滅中國人的習慣，所以會有所轉變以適應中國人。雖然已去除很多荒謬怪誕的內容，但是中國人又增加很多傳奇故事，而散佈到日本、安南。甚至觀察者會發現有些內容與基督教相近。假如我們不允許人類心靈裝滿愚蠢，我們可以假定這些儀式來自七世紀的某宗教，當時大乘佛教有一場很大的改革。天意准許很多人相信這個迷信，實在令人難解。我們只能接受我們不能理解的部分。在所有異教徒中，佛教徒是最偏執的。他們允許其他宗教藏有一些真實，但會說他們的才是最好的。在他們所崇拜的神祕偶像當中，並沒有可怕(可憎)的表示，他們也不會容許放縱的存在。佛教僧侶被當作是乞丐，廟宇被當作是賭場、劇院在使用。⁴⁵⁸

郭士立所形容的「七世紀大乘佛教有一場很大的改革」應是指唐朝佛教中國化，出現儒釋道三教調和理論，不過，郭士立無法精確地指出這種中國化現象。而他說佛教理論有些內容與基督教相近更是一大謬誤。佛教與基督教的起源本不相干，佛教屬於多神信仰，基督教屬於一神信仰，對宇宙的解釋也完全不同。這兩種宗教傳入中國時間與傳入中國後的發展也各有分別。郭士立在此處，向西方讀者解釋佛教與基督教有相似之處，就如同他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慣用

⁴⁵⁷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212.

⁴⁵⁸前引書，頁218。

以中國古聖賢話語來解釋聖經內容。⁴⁵⁹所以，傳教士為向中國人傳教，會致力於把中西歷史「和合」，⁴⁶⁰告訴中國人中西文化本有相似處。而為了激發更多西方人投入中國傳教事業，也用同樣手法告訴西方人中西宗教有所類似。

第二，關於佛陀形像、佛陀所在的世界，郭士立做出如下描述：

佛陀的形象幾乎沒有改變過，最明顯的特徵就是捲頭髮、長耳朵。有人推測他是出生在埃及。通常他身邊有很多留著絡腮鬍的人在追隨他。當佛陀及門徒盤腿打坐時，猴子和大象都仰慕而來，因此這兩種動物獲得佛陀贈與的智慧。佛教有三十三個跟天堂有關的故事。第一個就是佛陀生在蓮花當中，觀看這個世界。我們必須心中有佛、口中唸佛，無論是否有所回報。佛曾說「在世界各個角落，多數的人群中，有哪一個人時常覆誦我的名字，就會進入我所在的國度，我發誓，他們將很快成為神，他會遵守諾言。現在，只要一個人心中有佛，他就會成為佛。如果心中沒佛，就會連生存的意義都失去，且萬年不能超生。佛所身處的世界遍地是黃金，祂的宮殿、花園、房子用七種寶石妝飾，有七圈的樹圍繞，有七層柵欄環繞在外面，其中有七座塔。⁴⁶¹

郭士立文中說「有人推測佛陀出生於埃及」，實則佛陀就是釋迦牟尼，出生於印度，可見郭士立對佛教創立者不了解。

佛陀住的地方環境優美、安和日麗，但是郭士立說這種極樂世界總有消失的一天：

佛陀住的地方有七層珍珠做的階梯、九層蓮花、和平鴿、水蜜桃，全都甜蜜和諧地唱歌。這裡也是佛前子弟羅漢的家，住著觀音、海神，過去—現在—未來之神。還有全部的聖人。無論他們來自天堂還是人界，都聚集在一個地點。這裡不會看到女人，那些被允許住在此地的必轉化為男人。住在天堂的居民都有給他們父母安樂鄉。他們的身體既乾淨又芳香，面孔看來很安詳。整個王國充滿幸福快樂，居民都是不死之身，這稱為西方極樂世界。但是，神啊！最富有和尊貴之人在百年後都會是一場空，天堂自己也一樣，千年之後就會煙消雲散。⁴⁶²

第三，關於佛教教義，郭士立說佛教有地獄審判、輪迴轉世的觀念：

地獄審判，好人直接進入天堂，中層人士進入輪迴、壞人直接下地獄。人死後的審判地獄有好幾層，去地獄前，有七天時間讓去世者知道自己已經沒有肉身。要讓所有人都理解死後有獎懲是很自然的現象。我們也發現，佛教相信未來不會全部消失，而是有「輪迴轉世」。但關於輪迴卻有很多

⁴⁵⁹ 見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道光癸巳年六月，〈序〉：「子曰：『四海之內皆兄弟也。是聖人之言不可棄之言者也。結其外中之綢繆。倘子視外國與中國人當兄弟也。』郭士立以孔子之言來向中國人說明信耶穌者為一家人。」

⁴⁶⁰ 方姿堯，《從衝突到和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書寫策略與文化意義》，政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100 年，頁 114。

⁴⁶¹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221.

⁴⁶² 前引書，頁 222。

不同的意見，要評判出哪一個最普遍很難。因為這些理論都只出現在書中，沒人實際證明過。⁴⁶³

郭士立說佛教經文多使用梵文和巴厘語，因此只有少數中國人能閱讀其中內容，也有很多被中國翻譯者誤解：

很多佛教經文是用梵文和巴厘語寫的，然而，梵文和巴厘語是很少中國人懂得，只能透過少數僧侶翻譯，且翻譯出來還有很多錯誤。⁴⁶⁴

佛教徒最常說「阿彌陀佛」這句話，郭士立相當不以為然，他說：

我們很懷疑這世界上真的有這麼具有美德的一句話嗎？甚至說一句話就有神力？在所有場合，說一句話就可以抵抗魔鬼，且是生活中的「避邪物」。一個人只要重複說這句話，就會到極樂世界與佛愉快地交流。為了可以時常祈求，他身上配戴十八到一百零八顆的念珠，就像是虔誠的天主教徒一樣。⁴⁶⁵

郭士立質疑「阿彌陀佛」這句話的功用，他對於佛教徒時常祈求很不以為然，他說佛教徒就像天主教徒一樣，為了能時常祈求，身上都配戴念珠，這項觀察是正確的。不過，他忽略了一點，基督教徒也是會為了祈求上帝幫忙，會在身上配戴十字架，也常把「願上帝祝福你」(God bless you)掛在口邊。郭士立批評佛教徒的祈禱方式，但他忘記每個宗教都有特殊的祈求方式，基督教也一樣。他批評佛教徒，但自己也在做類似的事。

第四，關於佛教神祇，郭士立發現佛教與道教一樣是多神信仰，甚至凡人只要能捐錢蓋廟者也會被當成神明供奉：

佛教的神明既多又不明確。這是因為當佛陀在傳教時，他的追隨者就已經信仰多神了，他也不會拒絕那些教徒。佛教信仰中有一個「三面佛」分別代表「過去、現在、未來」。在佛教出現的時候，拜火教已盛行，且是不能崇拜多神。我們相信沒有一個僧侶可以告訴我們神明的數量到底有多少，或正確的念一遍所有佛教神明的名字。一個對佛教有堅定信仰的人，可能捐錢蓋了一座廟宇，自己就成為佛。因此有很多人死後牌位被放入廟中，和其他神明一樣被膜拜。⁴⁶⁶

在此段文字中所說的「三面佛」正確名稱應是「三世佛」，在佛寺的大雄寶殿中，大多供奉三尊佛像，中間是釋迦牟尼，是現在佛；左邊是燃燈佛，也是過去佛；右邊是彌勒佛，也是未來佛。「三世」是佛教的說法，三世之說是佛教業報輪迴的理論之一，「三世」就是過去、現在、未來。⁴⁶⁷

第五，關於佛教僧侶，郭士立也批評佛教徒不事生產，也與道教一樣有「占

⁴⁶³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224-225.

⁴⁶⁴ 前引書，頁 219。

⁴⁶⁵ 前引書，頁 219-220。

⁴⁶⁶ 前引書，頁 220。

⁴⁶⁷ 馬書田，《中國佛神》，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頁 22-23。

卜」行爲：

佛教僧侶很多，他們保持獨身，限制自己只能吃素，也很窮。有些大寺廟會花錢向父母親買小男孩來增加僧侶數量。但這些人是准許可以卸下神職人員身分而還俗的。佛僧是一群懶惰的人，主要的任務是乞求。他們每天早晚都要在佛像面前禱告。為了激勵自己，他們通常會撞鐘。有些人會俯臥在地，有些人會焚香禱告。在大慶典中，他們會掌管儀式或管理膳食。每一個寺廟都準備好大型的占卜儀器。占卜者會把兩片木頭丟在地上，低聲乞求。有些人甚至會花錢聘請僧侶為他們占卜。占卜的解釋會寫在一組竹片上，而竹片的解釋又會寫在一張白紙上。⁴⁶⁸

郭士立提到，中國人請佛僧來祈福，也提到佛僧的打扮：

當有人的靈魂要離開時，他們也要參與葬禮。有錢人會邀請佛僧來背誦符咒，在公眾場合祈禱，以求得祝福或對抗惡魔。他們住在窮困的環境，人數眾多，因此人們大多不太願意去供養他們。他們不會拒絕乞討來的食物，除非是肉類。他們的頭髮被剪掉，平日的裝扮是黃色短袍，戴的帽子跟歐洲有些款式很像，手上通常有戴念珠，通稱為「和尚」、「老和尚」或「方丈」。⁴⁶⁹

第六，關於佛教的信徒，郭士立認為，中國人選擇信佛的原因是為了消除罪惡：

一個人進入大城市完成工作後，第一個會尋求的是休息的地方，當天黑時總要找住處。人生也會有天黑的時候。在靈魂離開時，會先到地獄，若他能在腦海中想十遍阿彌陀佛，那背景就會瞬間轉換成蓮花。佛祖的神力是廣大無邊的，每個佛教徒只要有這個信念，他的罪惡就會消滅掉。信佛可以使本來只能在地上爬的昆蟲轉換成可以移動千里的人類。⁴⁷⁰

郭士立寫到佛教徒膜拜佛像的情形：

佛教徒會找一個房間，雕出一尊佛像，每天焚香禱告，放上一杯潔淨的水，點一盞燈。不管是畫在紙上或刻在木頭上都好，製作出一尊佛像，佛教徒便會早晚膜拜祂。向祂跪下膜拜起立，把佛像隨身攜帶，無論到何處，不斷向西方默念 Ne-to，無論走路、坐下都一直念，這樣可以讓我們的心不再乖戾，不再流淚，也能使火消滅灰燼、陸地上的魔鬼都消散，佛的名字會刻在木板上。⁴⁷¹

郭士立認為，在中國，信佛教者人數眾多，有時難以分辨到底是佛教徒還是道教徒：

我們很難估計中國的出家者有多少。因為大部分的人並不是真心投入宗

⁴⁶⁸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225.

⁴⁶⁹前引書，頁 226。

⁴⁷⁰前引書，頁 228。

⁴⁷¹前引書，頁 222-223。

教，而光是偶爾捐錢蓋廟。中國一般人民不會自己說「我是道教徒」或「我是佛教徒」。他們把分辨佛教道教的事情交給僧侶。⁴⁷²

郭士立瞭解中國人民多數是道教徒或佛教徒，事實上，在中國，道教和佛教的界線是很模糊的，不僅外國人無法明確分辨出來，中國人也很難做出區分。郭士立想估計佛教徒人數，不過他只考慮到出家者人數，而沒考慮到在家修行者人數。郭士立可能認為所有佛教徒都是出家修行者，或者，他刻意不告訴西方讀者有在家修行的佛教徒，以避免西方讀者認為中國佛教徒人數太多，傳教「阻力」龐大。

第七，有關佛教廟宇的樣式、作用，郭士立有以下敘述：

佛教和道教一樣，也有提供給女性出家的尼姑庵，無論是寺廟或尼姑庵都有規律的生活作息。每間廟宇的設計都不太一樣，都有三排建築，每排都有一個大廳，中間放一尊最大的佛，其他地方有小佛像約九到十座。佛僧在選寺廟地點時就會找浪漫的地方，例如山上或叢林中。並蒐集一些聖人的遺物以吸引朝聖者。幾乎每一省都有這樣的寺廟。有的寺廟很大，包含200到300個僧侶。有些寺廟接受賄賂而有錢，但卻沒有好好培養年輕人的教育，反而是讓他們的生活舒適地過。朝聖者會捐贈寺廟食物、金錢，使僧侶生活過得很優渥。在較大的寺廟中，大部分的僧侶住在深山谷地，什麼都不做而只是焚香禱告，大量吃蔬菜。為了增加影響力，僧侶長途旅行，告訴各地百姓他們寺廟所顯現的神蹟。有些入世的僧侶會在寺廟內有老和尚時共同修行。捐錢蓋廟者的名字會刻在石頭上，捐錢贊助慶典的人，名字會刻在紅紙上。⁴⁷³

這段文字中，郭士立說「有些寺廟接受賄賂而有錢，但卻沒有好培養年輕人的教育」，這應是郭士立不了解中國信徒有「捐香油錢」給寺廟的習俗。郭士立或許看到中國佛教徒捐香油錢給寺廟，將這行為解釋為寺廟收受「賄賂」。收入賄賂應是要幫人辦事，但中國佛寺收香油錢沒有要幫信徒做什麼，純粹是信徒出於虔誠祈求而奉獻的。再者，中國佛寺不是學校，沒有義務要培育年輕人教育，郭士立此段文字中，可能是刻意要詆毀中國佛寺的存在。

介紹完中國的佛教後，郭士立開始批評中國佛教的。他批評佛教徒信仰的天神：

世界上很多錯誤的宗教在追尋糟糕的目標。佛教僧侶並沒有追求精神生活，他們的天神是粗俗又不誠實的。⁴⁷⁴

從這句話語可看出，郭士立在批評佛教時的口吻極為嚴厲，直接否定佛教徒追求的目標。「信仰宗教」本來就是為了尋求精神上的寄託，無論佛教、道教、基督教、天主教都一樣。但是，在郭士立眼中，只有信仰基督教，才算有追求精神生活。可是，郭士立一邊批評佛教徒沒有追求精神生活，一邊又在剖析中國道教徒、

⁴⁷²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228.

⁴⁷³前引書，頁226-227。

⁴⁷⁴前引書，頁227。

佛教徒所追求的精神目標，前後文呈現矛盾之處。郭士立指出，道教所追求的終極目標就是求取長生不老，佛教追求目標是精神得以昇華，兩者在追求精神層次提升這方面是很接近的：

道教在乎修煉成仙的方法，因此他們討論如何讓水銀變硬，轉換成鉛，製做出長生不老藥。道教領導人就是這樣永保長生不老，這一句話就能簡單指出道教的精髓。而佛教高僧，那些住在深山峻嶺中的人，簡單而言就是要約束他們的心智。道教的得道高僧住在山洞中修練，尋求精神上的昇華。我們注意到，道教僧侶會藉由盤腿打坐，以進入更高境界的精神層面。

475

無論道教或佛教僧侶，在郭士立眼中都是對社會無貢獻的人，利用燒香、燒紙錢欺騙信徒，最終導致中國人迷信法術：

現在我們不能說道教僧侶等同佛教徒，也不見得都能達成永垂不朽。但若他們真能如此，肯定是曾看過西方天堂啊，這完全是一場鬧劇。但，儘管中國人很相信佛、道僧侶所說的話，但他們對社會卻是沒有任何一點影響。所有關於建造寺廟、創造形像都是被和尚、道士發明來欺騙你們的。而你們還是會相信，不只自己崇拜，還會焚燒紙錢。和尚們臉上抹油、臉上化妝，身穿袈裟、青色長袍。信徒跑去廟裡燒香。我看到他們在談論這件事時沒有任何好處。相反地，他們是做了很多可恥的事，招致許多煩惱。佛陀在幾次考驗後，證實自己是無賴，他的追隨者是不孝的，長久以來是不道德的，道教也一樣。他們談到如何用法術呼風喚雨、驅逐惡魔，但用這種方式會導致中國人不去努力，損毀他們的心智和道德。⁴⁷⁶

郭士立在這段文字中，竭盡所能地批評中國佛教與道教。在他眼中，所有佛教、道教僧侶都是騙徒，他甚至批評佛陀是「無賴」，仿佛中國人所信仰的佛教與道教，都不是「正當的宗教」。

郭士立不僅在《開放的中國》一書中大力抨擊佛教、道教，他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道光甲午年二月標題「西漢紀」中，也提到「佛教傳入中國」這件事遺禍中國千年：

明帝聞西域有神，因遣使之天竺國，求其道，得其書，及師傅以來，使至西方，逢遇沙門，示以佛法，誘惑愚俗，於是中國始得其術，圖其形象，而王公貴人，最好尚之，然佛氏所言，具所謂大亂之道，在三代聖王，所必誅而無赦也，明帝為人之父，而崇無父之教，居君之位，乃容不臣之人，以為中國千萬年無窮之禍害，豈非明教之罪人哉…。耶穌門徒被聖風感化，遍識番語，致傳教四方也，早耶穌道入天竺國，被該處人錯聽亂傳，真假相參，弄出佛教來，值明帝使人西求聖人，恨不識路，不知真本，乃

⁴⁷⁵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237-238.

⁴⁷⁶ 前引書，頁 238-239。「佛陀在幾次考驗後，證實自己是無賴。」原文：「Budhu, after minute examination, proves to be a scoundrel.」

逢沙門，隨引入中國，為禍不淺矣。⁴⁷⁷

這段文字中，郭士立先是批評東漢明帝身為君王竟然崇信違反倫理道德的佛教，後又批評佛教原來是天竺人亂傳基督教、誤解基督教義而產生的宗教。郭士立用極為直接、嚴厲的口吻，指出中國受佛教所害始自東漢明帝。佛教傳入中國時間目前雖沒無法得知確切年代，但已公認是西漢末年，郭士立把東漢明帝說成把佛教引入中國的主要人物是錯誤的。⁴⁷⁸而佛教理論的發展也與基督教完全不同，郭士立在此強行解釋佛教是「扭曲基督教教義而得來」，雖無從得知當時中國讀者是否能接受這種說法，但可確定的是：郭士立極欲向中國讀者否定佛教、勸中國讀者改宗，這樣的想法是非常急迫的。所以，引進佛教的中國皇帝是罪人，而記載佛教傳入的史家也是罪人。

郭士立在提出自己的批判後，他也談到中國政府反對佛教道教的論點：

中國政府反對佛道教的原因是：在生活中已有兩尊活佛——「父親」和「母親」要供奉，為何有人要前去深山裡修行？且塑造偶像來膜拜？諺語說「家中若有父母在，何須出遠門去焚香？」你是否可分辨真實與謊言，你將會知道，清醒而天真的心靈就是天堂。你將會用決定去行動，避免自己受到錯誤宗教的誘惑。在街上公開崇拜偶像被嚴格禁止，若聚在一起膜拜偶像會被驅散。因此看來，中國沒有任何宗教可以安全的存在。對政府盡忠，對父母盡孝就是中國宗教理論的全部。⁴⁷⁹

反對佛教的原因，與《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中指出的原因一樣——即從中國傳統倫理來看，信佛導致無父無君。郭士立一方面引用儒家思想告訴中國人信佛、道教違反忠孝之道，一方面要告訴西方人，中國政府「也有」反對人民信仰佛教、道教的理論。

(三)官方儀式、節日慶典、祖先崇拜與傳統習俗

郭士立指出宗教對中國人而言是次要的，會虔誠信仰某宗教的中國人通常是因為有利可圖：

我們對中國人所有的勸說讓我們更相信他們不認識神。我們應該高興地計畫著如何介紹神，但我們目前在尋求傳教支持者上卻失敗了。中國人全是偶像崇拜者，尤其古人比現在信仰更多神。在任何描述中，宗教一向對中國人的影響是很小的。宗教對中國人而言是次要的事務，非社會必需品或與個人滿足有關。人生要完成的責任很多，必須先榮耀自己的父母、對朋友忠誠、遵守政府規定、交稅…宗教對中國人而言是次要的。雖然宗教曾在中國造成傷亡，但它對世俗權力而言幾乎不曾造成困擾。大部分的中國人對宗教教義不感興趣，而誠摯信仰者要不是有利可圖，就是因為能取得

⁴⁷⁷ 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頁87。

⁴⁷⁸ 任繼愈，《佛教與中國文化》，台北：國文天地，1990，頁47。

⁴⁷⁹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239.

財富。那些誠信者都不斷反覆練習祭拜儀式，這些是多麼沒價值又丟臉之事，宗教儀式就相當是平常的禮節一樣。然而，儀式愈機械化，愈能顯示出中國人的個性。那些表現出他是很虔誠的人，被認為是呆子。最近在宗教上的容忍度是很大的，沒人會為了不受重視的宗教而奮戰。但是，當政府開始注意異教徒的影響力時，那些獻身宗教者就要開始受苦、被監禁了，甚至要等待他人來救援。⁴⁸⁰

郭士立認為中國宗教種類很少，因此在中國可說是沒有「異教徒」存在：

中國政府會抓改宗者，但不會管信佛、道教者拜什麼。政府不會干涉人民祭拜哪一種偶像。在這麼大的國家，人口如此稠密，我們應該要看到很多不同信仰，但是我們卻發現中國人的宗教是很單一的。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有力的異教徒出現在中國。在中國，沒有任何想創新宗教的人會成功。⁴⁸¹

對中國政府而言，宗教是一種可以用來增加權威、控制百姓的工具：

中國政府瞭解若不操控人民思想，很難操縱他的身體。因此，創造一個宗教系統。這個系統委託給一個國家統治者，裡面有僧徒，做為天界和現實人們的媒介。統治者的辦公室裝飾地很神聖。他們不僅是世俗的領導人，也是人民祈求的對象，這是出於政治考量。宗教崇拜充滿華麗的儀式，僅有少數教義。對人民而言不是宗教而是政府辦公室的儀式。⁴⁸²

郭士立認為，中國政府爲了要方便控制人民而利用宗教儀式，這點觀察是正確的。中國政府用許多方式控制人民。例如，透過「儒家思想」來教化百姓成為「順民」。滿洲人建立清朝後，以「高壓懷柔」政策來控制漢人，一方面興文字獄、下薙髮令，一方面又爲明思宗帝后致哀、禮聘文人編纂書籍…等，「宗教」也成為中國政府控制中國百姓的一種方式。

他提到中國人拜天、自然萬物、祖先、先聖先賢，在特定時辰也會祭拜。爲了祭拜而興建廟宇、家中擺設神壇：

中國人提到的天，他們認為天的力量與物質界天的力量是不同的。更有甚者，中國人崇拜惡魔或自然物的精神，包含女神、可見的物品。過去我們曾提到在冬、夏時要拜牲禮，現在又發現，在春分、秋分，其他一些時間都要拜。中國人從很久以前就漸漸地興建廟宇，設定節日。但人們只在拜拜時會參加。這些宗教信仰與孔子學說相關聯。人們模仿祭祀儀式，在家中設置神桌，擺放牌子。牌子的數量不一定。⁴⁸³中國人崇拜的神明有：天、

⁴⁸⁰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84.「儀式愈機械化，愈能顯示出中國人的個性。」原文：「The more mechanically, however, the rites are performed, the more congenial to the national taste.」

⁴⁸¹前引書，頁 185。「我們沒有看到任何有力的異教徒出現在中國」原文是：「We are not aware that any powerful heresiarchs have arisen amongst them, and overthrown the existing systems.」

⁴⁸²前引書，頁 186。

⁴⁸³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87.

地、人鬼、土地神、日神、月神、統治者的祖先、孔子、神農、絲綢之神…

⁴⁸⁴中國宗教是泛神論，包含全世界的天才、魔鬼、精靈。⁴⁸⁵

郭士立對中國人崇拜對象之多感到驚訝，他也寫到中國皇帝有權利決定讓誰成為受祭拜的神明：

中國人崇拜的對象多到令我們驚駭，特別是若再仔細研究所有儀式會令我們更震驚。只有天、地、皇帝的祖先可規範皇帝。皇帝可宣佈哪些人是聖徒，要把哪些人逐出教會。中國聖徒人數多到一整年都不夠紀念。若是某個神明的神蹟有效，官員會請求皇帝把這位守護神加封頭銜。⁴⁸⁶

顯然，郭士立此處把西方教皇有「逐出教籍」之權套用到中國皇帝身上。但在中國歷史上沒有「逐出教籍」的例子，中國皇帝也不會把「逐出教籍」當作懲罰方式。可見郭士立誤把儒家當成是儒教，也誤將廟宇當作教會，他對儒家思想了解仍不夠深。

郭士立提到，中國人最尊敬的就是祖先，上自皇帝下自平民百姓都要膜拜祖先：

中國人所有偶像中，最重要的是祖先。皇帝會向祖先磕頭，貧農也做同樣的事。所有階級人都把這項當成是最重要的義務。無論中國人扮演的角色是什麼，就算他有好的美德，只要不拜祖先就會被鄙視。⁴⁸⁷

他也描述到神壇、廟宇等建築風貌：

中國有很多種神像，有的只有一個祭壇，其它是有形象的畫像，大多用黏土做成，鑲金邊，少數是黃銅雕像。北京各地充滿廟宇，廟的建築形制大體而言是相同的。最大的一個廟是圓形建築，中間有很寬廣的空地。所有廟宇都有一個大廳，參觀者一進去就看到一張大桌子，周圍牆壁畫有歷史人物。屋頂用龍、獅身鷹首獸裝飾。有些廟很壯觀，最出色的是帝國的祭壇—天壇，有很多階梯，讓看到的外國人非常驚豔。其他廟宇就沒那麼壯觀了。⁴⁸⁸

此段文字中，郭士立所提到的圓形廟宇應是指北京天壇，不過，天壇是皇帝祭天之處而非廟宇。郭士立不曾親自到過北京，他對天壇的描述應是來自於前人經驗。皇帝在進行祭拜時，無論是穿著、物品、配樂或儀式進行都非常考究：

在祭拜儀式上，有可能是皇帝親自拜，也有可能找皇帝的代表者拜。根據祭拜主題，儀式中的成員會穿著不同顏色的長袍。例如祭拜土地時是穿黃色，祭拜月亮時穿白色，祭拜太陽時穿紅色。桌子也有不同形狀，例如中國人認為地有四方，因此祭拜土地時要用四方形的桌子。所有廟的組織都

⁴⁸⁴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88。

⁴⁸⁵前引書，頁189。

⁴⁸⁶前引書，頁189。郭士立在此採用「excommunicate」，譯為「逐出教會」或「逐出教籍」。

⁴⁸⁷前引書，頁190。

³⁹前引書，頁190-191。

有規則。儀式中有專人在喊跪下、磕頭、起立。祈求者都是吏部挑選出來的人。有很多官員在負責各項雜務。例如：準備肉、洋蔥、音樂、喪服、其他…。根據不同神明準備三牲：公牛、母牛、羊、豬，還要準備蛋糕、水果，這些都是前一天就要先準備好。⁴⁸⁹

郭士立批評祭典進行時的禮儀就像在演戲：

觀察祭典可發現中國人並沒有值得研究的詩或韻文，祭拜儀式所含的戲劇成分比宗教成分更多，實在稱不上是宗教活動，僅能說是一種朝廷禮節，讓皇帝從中維持他的尊貴。皇帝進行儀式時不會彎腰，因為他不是僕人。

490

中國皇帝祭拜祖先的另一項目的是展示他對人民的慈悲：

皇帝每年都會祭拜祖先、修建祖墳。祭祖場合中，皇帝會適時流淚，而史家會把他的行為記下，讚許他是一個孝子。這種慈悲的表現，也是要向百姓證明皇帝會關心他們。整個祭祖儀式上，華麗場面遠勝於內心感受，但一切都是主持祭典者必須為皇帝做的。⁴⁹¹

特別的是，郭士立把中國的大小節慶歸類在宗教範疇：

一年中有很多節日，例如元宵節，中國百姓會用燈籠裝飾屋子。街道、港口、船都掛滿燈籠。有很多畫家會描繪這樣的景色。在大城市中，點燃最奇幻的火焰，燈籠會作成龍、魚，或其他動物，裝飾在街道上，串成一串甚至有一哩長。在官府的階梯上會有人念出一段文字，說這是為了榮耀天地。⁴⁹²其他還有清明節、中元節、中秋節…等。我們沒有去注意其他更小的節日了。這裡面有城市建造者、各種天神的生日。在這些節日，官員會花錢整修宮殿大廳、打造匾額牌坊。⁴⁹³

這些慶典當中，最重要者是農曆新年，因此郭士立在此著墨很多：

除了農曆新年被當作是國家與宗教要普天同慶的日子外，每年僅有幾個日子固定要慶賀。即使是最窮的人也會在農曆新年致力於買新衣、為自己的餐桌增加點心，所有房子在過新年前都會仔細打掃，貼上春聯，所有的辦公機關在春節期間都會關閉。新年期間政府允許百姓在街上漫遊、娛樂，給百姓很大自由。新年期間中國人會殺豬、各種家禽，準備各項食物奉祀神明。每家每戶成員聚集在一起，興奮地等著新年到來，午夜十二點整就是最歡樂的時刻。把供品獻給神明時，獻身者會跪下、頭叩地。其他人會點燃鞭炮，對天地表達敬意。在門前安放兩支蠟燭。午夜時，中國人會衝進寺廟禮拜佛像、占卜命運。他們所求到的籤上面會寫出一整年的命運。

⁴⁸⁹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191-192.

⁴⁹⁰ 前引書，頁 192。其中，「朝廷禮節」原文是「court etiquette」。

⁴⁹¹ 前引書，頁 196。

⁴⁹² 前引書，頁 197。

⁴⁹³ 前引書，頁 199。

中國人抽到籤後，馬上會露出開心或氣餒的表情。確認幸運者是誰後，他們會互相恭賀。若數千人中只有一位幸運者，那這人就會成為世界上最開心的人。當供品放到桌上時，宴會就開始了。只有在新年期間才能大吃大喝，把所有食物都吃光，自由地喝飲料。中國人也會記得那些正在遭受苦難的人，把多餘的食物分贈給他們。在吃喝完後，他們會在各戶人家間閒逛，雜耍者、表演者、舞龍舞獅都會娛樂中國百姓好幾天。中國人會在過新年前用心地收取債務，因此到過年時每人手上都有一些錢可賭博，常有人在過年賭博欠下龐大債務，貽害一生。無論皇宮、其他官府，過年都會盛大慶祝。每一個新月分和季節轉換時都有節慶。最重要的是，也許是最實用的，就是皇帝會親耕籍田。當太陽進入水瓶座十五度時會舉行天子親耕儀式。在這之前要先讓天文學家或占星家占卜看看日子是吉是凶。在儀式舉行前，皇帝必須先齋戒三天，接下來，告知祖先即將要做什麼。得到祖先許可後，皇帝會祭拜牲禮，朗誦祭文。皇帝身後站著一組穿著華麗的人馬，皇帝手上抓著犁耙犁田，並要求親生皇子也做同樣的事，接下來，會由選來的八十二位農人完成耕田，皇帝會進入儀式場地擺的帳篷內吃喝。⁴⁹⁴

郭士立把中國傳統「春節」誤認為是「宗教」，可見他分辨不清「傳統習俗」與「宗教」是不同的。

郭士立批評中國人喜歡算命、占卜，這種行為是迷信不可取的：

中國人會用看手相、算命來判斷房子、廟宇風水是吉是凶。這套理論最早來自易經。這門學問的基礎是宗教，且很多聖人都相信算命，因此社會上無論平民、學者都會相信算命。我們無法理解，為何上自皇帝下至百姓都會相信，這種觀念是不理智的，使中國人顯得愚蠢又荒謬。儘管他們自認為能夠勝過靈魂和惡魔，但仍免不了受到小妖精、小魔鬼的傷害。中國人想藉由作法事來驅逐小妖精、小魔鬼。中國人相信冥冥中有一個不可改變的命運在左右他們的人生。宇宙中有輪迴在操縱著所有事務。人無法逃脫宿命，因為人只是其中一小部分。⁴⁹⁵

從這段文字可看出郭士立對中國的算命、風水學問不是很了解，他說算命的基礎是宗教，這種解釋錯誤。算命或風水都不會提到佛教教義、道教教義，兩者是不相干的理論。就如同西方人也有占卜、占星術，但占卜、占星術與基督教沒有關聯。郭士立若以西方的占卜術來比擬中國算命學，尚稱合理，可惜他沒有做此類比。郭士立以基督徒的身分，會覺得命運由上帝來決定，不是世人能預知。所以他不認同、不理解中國算命學，便把算命學歸類到宗教中一起批評。

中國人日常生活中的傳統習俗，郭士立都記錄下來。大致而言，他對這些習俗是相當不以爲然，甚至稱它是種騙術：

⁴⁹⁴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194-195.

⁴⁹⁵ 前引書，頁 204。

中國人很注重要擇良辰吉時開工。中國人要避免神明發怒，不像基督徒是向神請求祝福。中國人建造完房屋後，會把紅衣服或篩子掛在屋內最高的一根樑柱上，以替將來的居住者祈福，並且趕走惡魔。中國人相信，若泥瓦匠在蓋房子時刻意在牆壁上畫上魔鬼的象徵圖案，那厄運就會降臨。在婚禮上，他們會在門邊放一個篩子，篩子裡放筷子，在門前灑上米，祈求未來是成功且豐收的。土葬時會在他的嘴巴裡塞錢，以讓他的靈魂有錢可用。但未成年就不會有這種儀式。為了抵抗惡魔，中國人會在脖子上掛護身符，或是放在衣服裡面。護身符是一個小袋子，裡面裝著香灰，是從廟裡拿來的灰燼，或佛僧贈送的。這種騙術實在很荒謬。⁴⁹⁶

而中國喜歡用劍來驅邪，畫符貼在門上，只証明中國人時常處於驚嚇、害怕的狀態：

中國人也許會把一陣旋轉的風視為惡兆，突然飛起的一群烏鴉都會使中國人驚慌。中國人的心智實在是未開化。中國人若不能使自己脫離迷信，永遠會使自己陷於害怕之中，損害自己的靈魂。⁴⁹⁷

在郭士立眼中，中國人是容易受到驚嚇的膽小民族。

述及中國佛教、道教的同時，郭士立也一併談論到中國政府舉辦的儀式、中國民間傳統習俗、中國人的祖先崇拜、中國的節慶祭典，郭士立把這些項目都當成是宗教的儀式，顯示他對中國文化不瞭解。就以中國人的祖先崇拜來說，這種慎終追遠的傳統可上溯自商代，而中國道教起源普遍認為是東漢末張陵創天師道、張角創五斗米道，並結合神仙思想、民間信仰而來，中國佛教則是西漢末年由西域傳入。可見中國祖先崇拜的起源遠早於道教、佛教出現的時間。在中國，上自皇帝、下到平民百姓都會祭拜祖先，這是中國人受到儒家思想崇尚「孝道」而影響，中國皇帝進行祭天儀式，也是在儒家禮教之下表達對「天」的敬意。祭祖與祭天是中國社會的傳統，與佛教、道教的祭拜性質不同，不能算是宗教性的祭拜，郭士立卻將儒家、道教、佛教相提並論為「宗教」，顯示他不瞭解中國傳統文化。*The Chinese Traveller* 書中也出現和郭士立相同的誤解，此書描述中國宗教有三大宗派，說到中國的三大宗派，分別是：

第一，儒教。這個宗教依循古聖先賢之言，把孔子當成大師。教導人要成為守規矩的好學生，追尋個人價值，教人要盡量追尋自己的價值與尊嚴…
第二，道教，這是個會誇大的宗教，他們對上帝不敬，他們鑽研法術、煉金、講究個人道德…
第三，佛教，這不過是個充滿神話傳說和迷信的宗教，它藉由神像來欺騙人民…。⁴⁹⁸

⁴⁹⁶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208.

⁴⁹⁷ 前引書，頁 209。

⁴⁹⁸ *The Chinese Traveller* 一書是由「十八世紀經典古籍」資料庫：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簡寫為 ECCO 所搜尋到在 1772 年在倫敦所出版的書，網址是：
<https://huso.stpi.narl.org.tw/husoc/husokm?!!FUNC270>(下載時間：2012.09.08)，作者佚名，此段文字出自本書第 134 頁。原文第二點的意思應是指「道教的存在是對上帝不敬」。

文中內容和郭士立一樣，把中國的儒家、道教、佛教並列為中國宗教，而且也將道教、佛教敘述為誇大不實的宗教。顯見在十八世紀後期，西方人對中國宗教認識的不正確，已反映在歐洲出版品中。郭士立只有在中國沿海一帶活動，不曾深入到中國內地，即使到沿海一帶活動，停留時間也很短，但他卻對中國宗教做出許多介紹，其中也頗多承襲西方前人不正確的觀念。郭士立在寫作時應是承襲著十八世紀後期歐洲人對中國的認識，他在著作中仍然採用了前人觀點，繼續把中國的「儒家」當成一種「宗教」。

第二節 天主教、基督教與改宗的樂觀信念

(一)天主教

郭士立描述到天主教傳入中國的歷史發展：

七世紀時景教引進中國已證實，但在中國的傳播不廣，在西部也是一樣。中世紀時，教皇制度(popery)嘗試引進中國，但不成功。教皇制度的引進大約是在葡萄牙人進入中國時。法蘭西斯·薩夫爾(Francis Xavier)這位熱情的傳教家，證明自己是個成功的傳教士。他與一位中國人一起遊歷中國，經歷種種苦難、抵抗種種惡運，最後抵達北京，成為一位少見的天才傳教士。在科學和宗教方面都有傑出的表現。他獲得熟練的中國語言，並且寫了很多優雅的論文，所以他很受文人的青睞。驚人的是，1610年他死後江南省分竟然有三十座教堂。在那段時間有很多傳教士進入中國。開始有滿洲人信仰天主教。這種景象從十三世紀蒙古人征服亞洲之後已久不復見。接下來滿洲人繼續維持他們的地位，且在明朝滅亡之後變成積極地參與清朝事務。另一方面，到廣東建立的明皇室遺臣有接觸基督教，但因為他們的存在時間很短暫，影響力小。大清朝第一個皇帝是支持傳教士的，他甚至把日爾曼耶穌會當成他的老師。多數的傳教士都聚集到首都。康熙盛世時，認為可從那些外國人身上學到很多東西，因此接納天主教，也保護他們、任用為大臣。但不久就引出一連串的麻煩，傷害到所有傳教士。⁴⁹⁹

然而，郭士立文中的法蘭西斯·薩夫爾實際上不曾到過中國，而是在中國周遭的國家傳教，他文中對法蘭西斯·薩夫爾種種歷史敘述完全錯誤。⁵⁰⁰

⁴⁹⁹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229-230.

⁵⁰⁰ 見天主教百科網站中對法蘭西斯·薩夫爾的介紹：<http://www.newadvent.org/cathen/06233b.htm> 法蘭西斯·薩夫爾(Francis Xavier, 1506-1552)(下載時間：2012.10.12)，1506年出生於納瓦爾王國(The Kingdom Of Navarre, 位於今日西班牙)，1541年到印度、1545年到馬六甲、1546年到菲律賓、1549年到日本，他的傳教足跡遍及東南亞地區，而他最大心願就是進入中國傳教。1552年他搭乘一艘葡萄牙船抵達中國海岸的小島(small island of Sancian near the coast of China)，準備進入中國時，

郭士立還記載到，耶穌會士發現中國人根深柢固的觀念不可能更改，更不可能拋棄他們傳統習俗，因此耶穌會士在中國採取因地制宜的傳教方式：

中國人習慣崇拜祖先，尊奉孔子和其他聖人，他們無法放棄自己的儀式。耶穌會士允許它們可以維持自己的信仰，因為如果太嚴格地限制中國人，那改宗者會很少，且連重視儀式的中國政府都會生氣。但是多明尼我會仍堅持照天主教原來的教義。當爭論達到高峰時，教皇送兩個使者到中國來糾正觀念。這個教義之爭顯現出，傳教士傳教時最大的障礙在何處。乾隆時開始驅逐傳教士。即使前途渺茫，傳教士仍竭力想促進中國人改宗，直到朝廷完全不再聘用耶穌會士。再也沒有其他的修會有這麼多天才，和柔軟的人，能有技巧地適應中國人，或是像耶穌會士一樣得到世俗官員職位。嘉慶這個殘忍的皇帝致力剷除教士，當時歐洲也正處於紛亂，資源用盡，傳教士失去活力。為保持和平，戰爭結束後，歐洲人將熱情轉往關注國家政治發展。道光皇帝比他父親對傳教士還嚴苛，但是仍有很多法國、義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傳教士進入中國。⁵⁰¹

郭士立文中，顯然對耶穌會傳教士為適應中國的傳教方式相當認同，才會稱許耶穌會教士是天才。或許可說明他在中國的傳教方式，竭力將中西歷史、文化穿鑿比擬，是受到耶穌會傳教士的影響。

郭士立提到他所身處的中國已有一些中國天主教徒，雖然中國政府已下令禁教，但是禁令成效不大，而中國天主教徒並非完全放棄傳統習俗：

大家都說，基督徒的人數從來不曾比現在多。他們的和平直到今日始被打斷。最近有一個令人困惑的命令發表了，要求基督徒用自我了斷來證明他們的信念，給他們七個月的時間決定。精通中國政府命令的人會知道，這種命令是沒用的。很多改宗者即使會痛苦仍要推廣教義。傳教士致力使中國人相信天主教，也促使很多人改宗。但我們擔心只有少數人放棄異教信仰、完全捨棄膜拜祖先。除非聖靈進入中國人心中，或上帝大顯祂的慈悲，不然中國人很難完全改變。⁵⁰²

為了躲避中國政府的查緝，天主教徒的活動很隱密：

雖然羅馬天主教有很多私人教堂，但除了澳門和北京外，不能公開舉行崇拜儀式。中國的天主教徒衣服穿得和普通百姓是一樣的。但既然他們也打算在澳門開始傳教，他們也會穿著歐洲人服飾來躲避滿洲人的查緝。歐洲傳教士在中國為了避免惹禍上身，住的很隱密。最近在北京只剩下一個葡萄牙人。若是中國人願意接納天主教徒，整個中國早就充滿天主教徒了。

⁵⁰³

卻因病去世。

⁵⁰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231.

⁵⁰²前引書，頁 232。

⁵⁰³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十七世紀時曾有大批天主教徒進入中國，而希臘正教在中國則幾乎沒有發展：

中國只有北京有一間希臘正教的教堂。我們沒印象中國人有改信希臘正教者，中國政府也不會特別去查緝希臘正教。⁵⁰⁴

也由於中國沒有希臘正教徒，所以郭士立書中不多做介紹。

(二)基督教

第一個抵達中國的基督新教傳教士是馬禮遜(Robert Morrison)。郭士立寫到，馬禮遜藉由翻譯聖經、編寫字典為日後得傳教工作打下基礎。而繼馬禮遜之後來到中國的米憐(William Milne)牧師則由澳門轉往麻六甲：

嫉妒他的葡萄牙政府，不允許馬禮遜的同伴米憐留在澳門，因此傳教工作轉往麻六甲。⁵⁰⁵

在傳教士的努力之下，有中國人真的改宗，最有名的就是梁發：

中國政府對歐洲人的友善貿易心存警惕，因此歐洲人在中國的活動總是感到受冒犯。只有少數中國人是受到福音擁抱，可以全心感受神。仍有一些真正的改宗者拋棄異教習俗，誠摯地要榮耀基督新教。例如：梁發。他致力於向中國人傳教，也的確有所成就。早期的新教傳教士藉由出版書籍來開導中國人。⁵⁰⁶

新教傳教士出版的書籍，內容除了翻譯的聖經之外，也有地理、自然科學、歷史等內容，而書籍流傳的地方以巴達維亞、麻六甲、廣東為主，⁵⁰⁷這些刊物隨著傳教士遊歷中國而傳佈到華北、東北省分，也引起中國政府的注意，中國政府也因此發佈查禁令，而郭士立說到這樣的禁令就像過去中國政府的命令一樣無效：

這些刊物曾引起中國政府注意。然而，當律勞卑在 1834 年寫了一封義正嚴詞的信給中國人，激起中國當政者的恐懼，導致傳教活動被鎮壓，統治者下令要除掉廣東教會，傳教活動轉往新加坡。當沿海地區的傳教書籍持續發送，有數以千計的中國人渴望閱讀，導致連皇帝都想看內容。1832 年有給皇帝看，皇帝說這些東西和傳統很不一樣。但 1835 年有個福建人改信宗教卻被滿清官員侮辱。我們還沒得到答案，但幾個月後，有一些著作努力想傳達永生。有發佈一道命令去抵抗闖入的外國人。就像所有命令一樣，這種命令最後無疾而終。直到它的內容又再發布。⁵⁰⁸

文中所言，1832 年道光皇帝有「看過在沿海地區發送的傳教刊物」一事，應是指郭士立藉由搭乘阿美士德號在中國沿海發送傳教刊物。郭士立說迄今中國的新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 Elder and Co. 1838.),p.232-233.

⁵⁰⁴前引書，233。

⁵⁰⁵前引書，頁 233。

⁵⁰⁶前引書，頁 233。

⁵⁰⁷前引書，頁 234。

⁵⁰⁸前引書，頁 234。

教傳教士人數仍不多，新教傳教士到中國多聚集在廣東和澳門，而這兩個地方也仍有反教事件。

在向中國人傳教時，廣建學校及利用西方人的醫學技術是很有效的傳教方法：

1828 年美國傳教士編寫了「中國叢報」這部很有用的遊記。裡面仔細地觀察了中國的貧病者，提到在向中國人傳教時，用西方人精通的醫術會很有效果。在很多地方殖民地傳教士都可以自由活動，他們設立了學校，在麻六甲有設立大學，有中國、英國教師教導那些男孩，因此愈來愈多人改宗。但是，在中國的新教傳教活動卻還沒看見狂熱的開始。無論用什麼方法，我們要盡力說服中國人我們的宗教是愛。⁵⁰⁹

郭士立用極富情感的口吻鼓勵所有新教傳教士解放中國人，向中國人傳達福音：

所有傳教士永遠都要為此負責。假如這樣的人負起這份工作的責任，成效就會產生，留在中國人心中的印象就會永存。和平的訊息並沒有受限，他們始終致力於把受到異教信仰導致心靈呆滯的民族給解放出來。那麼，對中國政府、地方官員這些所謂受到天子保護的人，就再也沒有任何可制止的力量了。所有有用的藝術和科學都是跟隨福音傳進，且畢恭畢敬地建立好的原則。這是我們唯一可以避免羅馬天主教徒犯錯的方式，並克服長久以來這個生病的國家忽略的困難。只有受到神所愛的人才能愉悅地完成這份工作，並撐到最後。我們應該要踏出第一步。中國海岸應該每年讓福音之船造訪，在適當時機選擇出版福音。只要傳教活動被支持，募集到很多人願意為了福音深入險境，那就會成功。但目前廣東和澳門的傳教活動都受限，因此我們看到的成果很少。過去長久以來教會受到忽視，無法為數億的靈魂提供希望，不久，一定會在新教的傳佈下改善恥辱。中國已對基督教的英雄和烈士開啟了大門，要對抗軟弱的信仰和躊躇的心智。⁵¹⁰

郭士立批評中國佛教只注重儀式，因此崇拜偶像的中國人身處黑暗當中，等待基督教的救援，他呼籲眾多的基督徒對救援中國人要有信心：

佛教愈來愈流行，因為它施恩惠給人民，且只有在儀式方面有所增加，教義上無任何新義。中國人是一個無法避免低俗感的民族，並幼稚愚蠢地崇拜偶像。看在基督徒眼中，這麼多人處在黑暗之中實在很嚇人。中國人的影響力擴及全亞洲，獻身給無靈感的宗教。中國人不期盼丟掉束縛轉往與神同在，因此要修復中國人與上帝之間的關係必須假手外國人。基督徒必須有自信，支持救贖，為了要救贖中國人這麼多的人口。同樣的力量過去曾使羅馬帝國放棄崇拜偶像，必也能在中國有所作用。為了要讓無數的中

⁵⁰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235.

⁵¹⁰前引書，頁 236-237。

國人面向上帝，傳教活動一定要充滿熱情和熱忱。⁵¹¹

約·羅伯茨曾說：「傳教士認為中國人是一個生活在黑暗中的種族，只能靠上帝來拯救，這個態度是堅定的。」⁵¹²這句話實點出了傳教士的寫作精神。傳教士提筆著述，向西方人介紹中國，目的是希望引起更多人對中國產生興趣，進而一起投入傳教事業。因此，在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在著作中介紹中國時，無論他們對中國文化瞭解多少、行文深入或者淺出，總會在結語裡歸納出「中國仍是落後西方」的結論，而「帶領中國進步」則是傳教士所負重任。為了呼籲更多基督子民前往中國傳教，他們在著作中也對中國的未來抱持「樂觀」看法。均認為只要更多人願意前往這蠻荒之地開墾，中國必能像西方一樣文明開化。不僅郭士立在文章中多次用充滿希望的口吻熱切喊話，⁵¹³在衛三畏身上也可找到印證。衛三畏在書信中講到，他向中國人講解聖經內容時，中國人不感到興趣只是敷衍一番，但他仍相信中國人有得救的希望：

在中國人問候「你好」或「吃飯了嗎」之後，你向他們講解聖經上的內容，他們充耳不聞。他們只是默默地聽著，當你停下來等他們回答你的問題時，他們會問你多大了以及你從什麼地方來。如果你解釋書中的文字，他們看上去會同意妳說的一切，但那主要是出於禮貌。話題是陌生的，說話的人是陌生的，使用的語言從總的方面來說也與他們習慣的風格和語調不一樣。…這些舢舨船上的窮人遠不是社會的最底層，他們和其他任何社會階層一樣有得救的希望。異教徒的遲鈍和麻木是一直生活在基督教土地上的人們無法想像的。幾乎沒有什麼事情比聽到一個經過思考的問題更讓我鼓舞的了，因為它說明問話人還活著，還有生命力。我願意和他們辯論一整天，但是你找不到有足夠思辨能力的人和你辯論，一個為他的信仰和習俗辯護的人。⁵¹⁴

他所記述散發聖經的過程，也和郭士立發送聖經的經歷一樣，在高聲朗讀完聖經內容後，就會有許多中國百姓圍到身邊向他索取，中國婦女也對聖經內容感到興趣：

⁵¹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 p.185。

⁵¹²約·羅伯茨編著，劉林海譯，《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頁51。
約·羅伯茨(J.A.G.Roberts)，英國漢學家，1935生於南安普頓，1959獲牛津大學歷史學學士學位，此後四年在馬來西亞任職。1964年赴美國加州大學學習中文，之後回牛津大學攻讀博士學位，又任職於哈德斯菲爾德大學(University of Huddersfield)從事歷史教學與研究。編有《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二十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中國歷史—從史前到一八〇〇年》、《現代中國》等書。

⁵¹³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 p.236-237.

⁵¹⁴衛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著，顧鈞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34。

在我們一開始打招呼時她們很拘謹，但很快便放鬆了。我打開包袱，拿出一本福音書，讓我們一群人中的一個積極的小青年高聲朗讀。他讀了幾行之後，一個站在他後面看他讀書的人拿走了這本書。這時候路上很多挑擔經過的人都停下來看我們這些外國人，我們很快被一堆堆的柴草所包圍。每個人都向我們要書，那個原先朗讀的青年現在也忙著替婦女們要書。但是看到我們的書迅速減少時，婦女們也就不再羞澀，她主動過來拿起小冊子，告訴我們說，即使他們自己不能讀這些書，他們家裡有丈夫和孩子可以讀。她們的請求無法拒絕，我們的書包很快就空了。這使她們中一些人發出失望的叫聲「這麼少的書，這麼多的人」她們說「為什麼你們不多帶點！」⁵¹⁵

衛三畏也寫到在某次喪禮場合發送聖經，中國人還客氣地想回送東西，顯現出傳教士與中國百姓間互動良好：

這一群人中每個人都得到了一本他們要的書，結果我們所有的書都發完了。他們當中領頭的人看到我們的書包空了，就拿起一個裝滿花生和橘子的臉盆將那些東西強行倒入我們的包包裡，看到我不願意接受，他說：“你把所有的書都發了，而我們什麼都不回贈，這怎麼可以呢？”⁵¹⁶

得到聖經之後，中國百姓都肯定它的內容，且很快地大聲念出，這樣的行為都是出於自願：

一個看上去很聰明的人在瀏覽了給他的一本《聖經》後，開始大聲地向他周圍的人講述其中的主要內容。他說我們的書是宣傳德行的，說人應行善，並在我們提醒下說出了基督的名字——當時他一下子想不起來了。他的行動是自覺自願的，這說明我們的書已經受到關注、引起了思考，對此我們感到非常滿意。⁵¹⁷

在郭士立和衛三畏筆下，中國百姓是那麼熱切地渴求得到聖經，且總是得到便迫不及待地大聲朗誦。⁵¹⁸不僅傳教士會發送聖經，也有中國百姓將聖經當作新年禮物發送給親朋好友，衛三畏記下一位中國人告訴他：

有人給過他一些書，說其中大部分他都作為禮物送給了在國內不同地方的朋友，而且據他所知他的朋友們都在讀這些書。在新年到來時互贈禮物是古老的中國習俗，這個木匠就是在這個時候把別人給他的《聖經》做為禮物分送出去的。⁵¹⁹

⁵¹⁵ 衛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著，顧鈞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40。

⁵¹⁶ 前引書，頁41。

⁵¹⁷ 前引書，頁41。

⁵¹⁸ 郭士立在中國沿岸旅行時，每初抵一地便遭當地官方驅離，但地方百姓卻是樂於與郭士立來往。中國民眾在接受郭士立贈予的聖經後都立刻大聲朗讀。可參見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 p.178、231.

⁵¹⁹ 衛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著，顧鈞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42。

他對發送更多聖經感到樂觀：

在這幾次遠足當中我們散發了大約 150 冊書，我知道這個是個小數目，但從接受這些書時中國人所表現出來的禮貌和興趣來看，更大規模的散發一定會收到更大的成效。⁵²⁰

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筆下著述不曾出現發送聖經被排拒的情況。

除了對「中國未來必接受基督教信仰」理念深信不疑外，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的著作還有一項共通特色，就是兼認為中國百姓是「易於接受基督教的」。以前中國百姓之所以沒能聆聽福音，無法「改邪歸正」，都是受到中國「政府」的阻撓：

上帝曾要求「你們在我面前不能有其他神」，但這些人卻自行其是。一個熱情的基督教徒不可能不被這個智慧民族的墮落程度而深深觸動。每家商店、每個角落、每個門柱，實際上只要有房子的每個地方都燒著香，線香的數量如眾多，以至在這個城市上空形成了一片雲煙，這時在外面行走你幾乎什麼都看不見。我們難道不應該深深同情這群人，共同努力幫助他們嗎？如果他們本人的偏見不作祟，他們的政府不幹預的話，他們的改造工作並不難做。我的意思是說，他們的偏見某種程度上也是政府製造的。⁵²¹郭士立筆下的中國人迷信燒香拜佛，實在令人同情，所以中國是「一個基督徒須要努力的城市」⁵²²。

但是，「非傳教士」者卻不認為中國人是易於改宗的。羅伯特·佛瓊(Robert Fortune)在《1853 到 1856 年間居住中國內地、沿海的觀察與探險記實》(*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 Inl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 being a Narrative of Scenes and Adventures during a Third Visit to China, from 1853 to 1856*)中，⁵²³提到：

在南京條約簽定前早已有傳教士進入中國，但幾年下來，成功使中國人改宗者有幾人呢？要讓中國人改宗是非常難的一件事。中國人是這麼的自

⁵²⁰ 衛斐列(Frederick Wells Williams)著，顧鈞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頁 42。

⁵²¹ 前引書，23。

⁵²²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 頁 23。

⁵²³ 羅伯特·佛瓊(Robert Fortune, 1812-1880)，是十九世紀英國著名植物學家。根據 Thurin, Susan Schoenbauer. *Victorian traveler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42-1907*. (Athens : Ohio University Press, Co.1999), p.27. 中寫到：1842 年南京條約簽定後，英國皇家園藝學會(Royal Horticultural Society，簡稱 RHS)派羅伯特·佛瓊到中國尋找園藝種子與種植技術。1842 年後 20 年間他先後受雇 RHS、英國東印度公司、美國，五次遊歷中國，有將近 15 年住在中國。也到爪哇、馬尼拉、台灣、印度、日本。其中，1848 年到 1851 年應英國東印度公司之請到中國尋找茶樹、茶樹種子。1852 年英國東印度公司派他到中國尋求可到印度種植茶葉的中國茶農，1853 到 1856 年間遊歷中國沿海以外地區後寫下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 Inl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 being a Narrative of Scenes and Adventures during a Third Visit to China, from 1853 to 1856* 一書。Thurin, Susan Schoenbauer 在她的著作頁 47 中，提到羅伯特·佛瓊是一位「殖民統治者」。

私、善妒又自負的民族，只有醫療傳教是最有效的。讓中國瞎子可以看見、癩子可以走路、傷者得以治癒是傳教最立即見效的手段。⁵²⁴

羅伯特·佛瓊旅居中國期間，時常下榻寺廟過夜，與廟中僧侶交談，因此比起郭士立、衛三畏、丁韋良等傳教士，他是真正與中國佛、道僧侶有接觸者。他寫到曾去住一間叫 Ayuka 的寺廟，裡面的住持很熱心招待他喝茶，他詢問住持為何能當上住持，住持回答是因為花了三千元整修寺廟，中國政府就讓他當住持。當羅伯特·佛瓊想看「舍利子」，住持就帶他到一間密室、神秘兮兮地打開一個盒子，但是他什麼也看不到。住持告訴他：「只要真心信佛就能看到。」⁵²⁵又有一次，他參加中國葬禮，站在一位佛教僧侶旁邊。儀式進行中僧侶要他快點跪下，因為佛陀要現身了，但當他跪下後卻什麼也沒看到。詢問僧侶佛陀在哪裡時，僧侶回答他：「只有得道高僧才能看到。」⁵²⁶如此近距離接觸到中國僧侶，記下中國人的迷信行為，羅伯特·佛瓊的著作從一位「學者」的角度記述中國人的日常生活，應比基督教傳教士更能客觀地評判中國百姓是否容易改宗。對照羅伯特·佛瓊的說法，更能凸顯傳教士為了吸引更多人投入中國傳教領域，刻意將中國百姓描繪成期盼神的福音。

小結

郭士立爲了讓西方人曉得中國人信仰錯誤的宗教，在著作中大力抨擊中國的佛教、道教。比如：他批評中國佛教、道教僧侶不事生產，對國家沒有幫助；批評道士畫符念咒是迷信的行為；中國皇帝祭天儀式在郭士立眼中看來只是在演一場戲。郭士立身為基督教傳教士，自然會否定中國人普遍信仰的佛、道教。不過，在郭士立對中國佛、道教的敘述中，可以發現他對佛、道教的歷史以及教義不清楚，例如郭士立說佛教某些教義是來自基督教，但是他又無法明確指出是哪些教義，連佛教傳入中國的時間都描述的不符事實。郭士立批評中國人喜歡說「阿彌陀佛」、中國人相信說這一句話就能渡過眼前困境。其實默念「阿彌陀佛」是中國人對渡過生活困境的一種祈願方式，就像西方人時常口唸「願上帝祝福你」，有同樣道理。郭士立認為中國人容易受到驚嚇、膽小，會相信自然界中的某些「徵兆」，然而，他卻忽略西方人也會相信某些徵兆。中國人、西方人主要信仰的宗教雖不同，但對生活祈願的心理是一致的，若中國人口念佛號是迷信，西方人呼求上帝難道就不算迷信？郭士立把儒家歸類為宗教、以教會來比擬中國廟宇，這

⁵²⁴Robert Fortune,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 Inl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Sea : being a Narrative of Scenes and Adventures during a Third Visit to China, from 1853 to 1856*.(London : J. Murray, 1857 ;Taipei : Ch'eng Wen Pub. Co1971.),p.135.

⁵²⁵前引書，頁 28-29。

⁵²⁶前引書，頁 152-153。

些都顯現出他對儒家的不瞭解。1772 年倫敦所出版的 *The Chinese Traveller* 一書也是把儒家、佛教、道教解釋為中國「三大宗教」，可見郭士立並非第一個將中國「儒家」當成宗教者，或許他的觀念是來自於十八世紀的西方出版品。郭士立說中國皇帝可以將某些人「逐出教會」，然而，「逐出教會」是西方天主教、基督教的做法，在中國沒有這種觀念，顯見郭士立用西方標準套用到中國，他具有西方人的自我中心觀。在第三章裡，討論到郭士立為了令中國開放貿易，會提出「中國政府也主張要開放貿易」，⁵²⁷以替自己的主張合理化。在宗教方面，郭士立也用相同方式，談到「中國政府也反對中國的佛教與道教」，⁵²⁸可見郭士立為了否定他眼中的中國，有相同的論述手法。

不只對中國佛教、道教的歷史、教義描述有誤，郭士立對天主教的介紹也有不實之處。例如他說法蘭西斯·薩夫爾(Francis Xavier)到中國傳教，實際上此人未曾踏上中國土地。郭士立相當稱許明末清初抵達中國傳教的天主教耶穌會士，他稱讚耶穌會士是天才，懂得如何技巧性地向中國人傳教。郭士立或許是受到耶穌會士的影響，因此他主張的傳教方式與其他人不同，這點使得郭士立如同耶穌會士一樣遭人質疑。郭士立與十九世紀前期到中國的傳教士有相同特點：相信中國人易於改宗，對促使中國人改宗感到樂觀，他們都認為阻礙傳教的絆腳石是中國政府，中國人民其實是引頸期盼著福音。對比「非傳教士」的著作，更能凸顯出傳教士對在中國的傳教前景相當看好。郭士立在發送聖經時，總是會有一群中國百姓聚集、熱烈地索求聖經，拿到聖經後他們都迫不及待地大聲朗誦，這種現象在衛三畏的日記中也有出現，顯現十九世紀前期的傳教士向中國平民的互動良好的，他們的傳教經驗也相當愉快。

⁵²⁷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69.

⁵²⁸ 前引書，頁 239。

第六章 結論

本論文由郭士立著作來查考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眼中的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和宗教。以下是本論文所得出的幾點結論：

第一，郭士立所描述的中國，時間場域包含了「過去」與他所身處的「現在」，不完全是十九世紀前期中國的情況。例如郭士立談到中國的火藥，他對中國火藥抱持肯定態度，但對照學者對十九世紀前期有關中國火藥、武器的描述，當時中國應已大不如西方。郭士立對火藥的印象仍停留在「過去」。郭士立在 1838 年出版的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n the Chinese Empire* 時，認為中國皇帝有極大權力，臣下或士兵都不可過於求表現，以免招致疑似反叛的罪名。中國皇帝有花園、可任意使用國庫錢財、可隨心所欲賜予人頭銜…等，中國政治運作是圍繞著皇帝一人在運轉。但是，郭士立去世後才出版的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 with Memorie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裡，說明中國皇帝仍必須遵守祖制等規範，其實他比中國農夫還不自由。本論文認為，這樣的轉變，反映出郭士立到中國的時間愈長，愈洞察到中國皇帝無助於他的傳教事業。中國皇帝即使擁有權力，只要是對傳教士沒有幫助，那皇權仍是虛弱的。因此，郭士立去世前的作品，描述中國皇帝有許多無奈。郭士立的中國印象，並非全然是十九世紀前期的中國實際情況，而是交織著十九世紀以前的「過去」，與十九世紀前期當時的「現在」。當然，他為西方讀者所建立的中國印象也是夾雜著「過去」與「現在」。

第二，郭士立對中國的地理、歷史掌握不清，在他的文章裡可以發現一些錯誤描述。例如他說中國的運河四通八達，實際上中國運河集中在東部，呈南北向，並非「四通八達」，不能通往中國各地。郭士立說運河連接天津到廣東，然而，中國的大運河最南是通到杭州。他把天津旁的「海河」說成是「淮河」。歷史也是如此，郭士立說中國明朝南方人民是因為明朝與蒙古作戰而移往海外，實際上，這些移民是因為原處家鄉人口多、田地不夠才移往海外謀生。清朝將台灣納入版圖時間在 1683 年，但郭士立卻誤寫為荷蘭人撤出台灣的 1662 年。郭士立說英國在 1700 年將一位領事送到舟山以維持與中國的貿易，但是察考歷史無此事件存在。郭士立不是中國人，他無法正確掌握中國的地理和歷史並不令人意外，但從他的著作裡卻發現，他對西方歷史也有錯誤認知，這點倒是令人訝異。十六世紀到亞洲傳教的天主教士法蘭西斯·薩夫爾(Francis Xavier)實際上未到中國，但是郭士立竟然描述他「在中國克服種種苦難，最後抵達北京」。⁵²⁹郭士立錯誤的歷史、地理知識，也會使西方讀者建立錯誤的中國印象。

⁵²⁹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p.229-230.

第三，郭士立對中國的描述，兼有稱讚與批評。張志惠在《閱讀中國：〈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與新教傳教士關於中國的理解與書寫》文中指出，傳教士利用篩選過的知識發表在《中國叢報》上，向西方人介紹中國，這樣的報導是刻意為西方人建構中國的負面形象，而傳教士也藉此形塑自己傳教的正當性。⁵³⁰但是，本論文研究則認為，十九世紀前期的傳教士並非單方面刻意營造中國的負面形象，事實上，傳教士對中國文化亦有所稱讚。郭士立在著作中談到中國農耕技術比西方優越，中國農人相當勤奮。中國的管道、建築技術優秀，中國的手工業者可以製作出相當精巧的手工藝品。郭士立對中國文化批評之處，包含教育、音樂、美術、文學、宗教等方面。此處可以發現，郭士立對中國文化稱許之處，偏向實際眼見、可觸摸的「物品」，這些是物品都不會影響到郭士立的傳教事業。反之，郭士立所批評的中國教育、音樂美術、文學、宗教等，都是與郭士立為了傳教呼籲中國應該開放有所關連。郭士立藉由批評中國教育呆版，僅是要求學童重複誦念四書五經，向西方讀者傳達中國應該開放，才能改變中國人因受到傳統教育而塑造出的僵化心智。郭士立說中國的音樂雜亂無章、美術缺乏立體感、明暗技法，因此中國應該開放，讓西方的音樂、美術進入中國，才能使中國人具有美感、藝術感。郭士立說中國人信仰佛教、道教都是迷信，所以中國應該開放，讓中國人接受真正的宗教信仰。郭士立呼籲中國要「開放」，這「開放」有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指「實際活動空間的開放」，這包含要讓外國商人自由進出中國作生意、讓外國傳教士在中國自由傳教。另一個層面，是指「心靈的開放」，中國人的思想層次應該提升，讓思想「開放」以接受西方觀念。對郭士立而言，中國人信仰佛教、道教，使自己的心靈被蒙蔽，所以最重要的是，讓信仰「開放」，摒棄佛教、道教這種錯誤的信仰，接受西方基督教信仰，中國人才有希望走入正途。

另外，對於傳教士是否刻意塑造中國的負面形象，也必須重新思考。張志惠認為，郭士立、裨治文等傳教士在《中國叢報》上報導中國人有虐殺女嬰、纏足等惡習，以此來證明中國人道德墮落，必須藉由基督教來拯救中國人的心靈。⁵³¹不過，本論文在第四章第一節中，除了談到郭士立關注中國女性社會地位低落，也舉例提到，同時期的英國外交官亨利·查爾斯·席爾(Henry Charles Sirr, 1807-1872)在自己的著作裡對中國女性地位低落多所著墨。可見，「中國女性地位低落」是十九世紀前期抵達中國之西方人普遍觀察到的中國社會現象，這種現象是真實存在的，它令西方人感到中西文化間存在很大落差，所以無論傳教士或非傳教士都要把這種現象書寫出來。傳教士不見得是刻意要利用中國溺女嬰、纏足等惡習，塑造出中國的負面形象。如果在現代人眼中，纏足、溺女嬰等習俗代表一種歧視女性的落後行為，那麼十九世紀前期的傳教士在當時對此習俗做出批判，也未嘗不可說傳教士是具備了先見之明。

⁵³⁰ 張志惠，《閱讀中國：〈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與新教傳教士關於中國的理解與書寫》，台大歷史碩士論文，民國95年，頁122。

⁵³¹ 前引書，頁59。

第四，本論文嘗試查考郭士立對中國的認識，有可能得自於十八世紀西方人的中國印象。郭士立對中國的建築技術、工匠技巧多所稱讚，然而卻說中國人不懂教育、藝術與文學，這種區分並非始於郭士立。1792年馬戛爾尼使團訪問中國，副使斯當東在1797年回國後於倫敦出版《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一書，裡頭記載他親眼見到中國工匠卓越的工藝技術，相當欽佩。⁵³²斯當東本人對中國人發明的火藥、造紙術、印刷術讚譽有加。⁵³³他也談到中國繪畫不懂得透視法、立體感。⁵³⁴此外，郭士立將中國的「儒家」當成一種宗教，顯示他還未真正瞭解中國。這樣的誤解，與1772年倫敦所出版的*The Chinese Traveller*一書如出一轍。郭士立在1831年抵達中國，1838年出版*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n the Chinese Empire*一書，對中國作全面性的介紹，他如何在短短七年內得到有關中國的所有知識呢？他書中描述內容，有可能是參考前述二書，延續十八世紀後期西方人對中國的描述。郭士立的著作裡沒有加註釋標明資料來源，因此本論文不能肯定地說郭士立對中國的認知必定出自何處，僅能嘗試探索與十八世紀後期西方著作之間的關聯性。

第五，從郭士立的著作中，可看出他帶有西方人的自我中心觀。郭士立在向西方人介紹中國時，會使用到當時中國尚未存在的「西方觀念」。比如，郭士立拿「自然法」、「國際法」來批評中國不願開放貿易，將西方國家的法律概念套用到中國，其實以十九世紀前期尚未開放的中國來說，是不合時宜的。郭士立也多次提到，廣東工匠工藝技巧比其他地方的工匠優秀，廣東畫家得以接觸來自世界各地的風景畫，模仿技巧相當優越。彷彿由於廣東能接觸到西方人、西方物品，所以當地文化水準較高。郭士立是以「像不像西方」、「有沒有符合西方『法』」之標準來評價中國。

第六，爲了加強自己「要求中國開放」的正當性，郭士立會虛構歷史、捏造不實事件來佐證自己的論點。第三章裡，探討郭士立眼中的中國經濟，郭士立爲了說明中國必須開放，指出「以前曾有中國官員抗議政府閉關自守的作法」，⁵³⁵「乾隆曾說自然法不適用中國」，⁵³⁶這些都查無史實，也不符常理。鴉片戰爭以前，律勞卑舉證過去英國商人多次直接與中國官員接觸往來，⁵³⁷其舉證內容也多處虛構。可見，要求中國必須接納西方時，利用「虛構」中國「過去」來否定中國「現在」，是西方人慣用手法。

從郭士立的著作中，可看出他對中國的認識有正確也有錯誤。這些認知也許

⁵³² (英)斯當東著 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上海書店，2005，頁371。作者Sir George Leonard Staunton，在跟隨馬戛爾尼使華時，擔任副使(Secretary)一職。

⁵³³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Smith, Elder and Co. 1838.), p.374.

⁵³⁴ 前引書，頁379。

⁵³⁵ 前引書，頁61。

⁵³⁶ 前引書，頁77-78。

⁵³⁷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97，頁16。

是來自於更早之前的西方著作，也許是出於郭士立自己對中國的觀察體驗。郭士立不見得完全是本著傳教士身分，要刻意帶給西方讀者負面的中國印象。仔細分析，可發現牽涉到傳教者，郭士立會說中國的不是，而與傳教無關者，他亦不吝給與肯定，或者呈現出中國真實的一面。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眼裡的中國印象，可說是既豐富又複雜，而郭士立眼中的中國印象，可說是混合了「過去」與「現在」、「讚賞」與「批判」、「真實」與「虛假」。郭士立的著作裡有許多對中國的誤解、批評和虛構之處，正顯示他在中國的傳教處境有多麼艱困，以及他多麼急迫地盼望西方讀者能支持傳教事業，所以才無所不用其極地用各種論點，來說服西方人中國必須開放。郭士立是傳教士，但他也像一個醫生，以「醫生」角色來診斷中國，為中國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與宗教詳細檢視，端詳中國的病徵有哪些。他要告訴西方人，閉關自守導致中國政治封閉、經濟停滯、社會不文明、文化低水準、信仰不正確，這些都是中國的病徵。汴浩宇指出，郭士立「直接將醫藥與傳教聯繫起來」，⁵³⁸張琳也談到，郭士立是第一個發表文章，系統性討論傳教士在中國應該採取哪些有效的傳教方式，⁵³⁹而其中，「醫藥傳教」是快速取得中國人信任的一個有效途徑。郭士立不僅在中國遊歷時，親自發送西藥給中國人，也建議傳教士應該在中國設立醫院。⁵⁴⁰本論文則認為：郭士立所從事的「醫藥傳教」，除了他親自發送西藥給中國人、建議教會設立醫院外，還可進一步擴大解釋。郭士立在論述中國時，多方批判中國不是，或者虛構中西交流歷史，都是為了要告訴西方人「中國真的生病了」。若要根除中國病灶，唯有使用「基督教」這帖藥方。因此，十九世紀前期傳教士眼中的中國，是透過宗教眼光透視出的中國，而郭士立筆下的中國印象，實反映出他熱切渴望令中國人改宗的寫作動機。

⁵³⁸汴浩宇，〈基督教新教早期在華“醫藥傳教”剖析〉，《歷史教學》，蘇州：蘇州大學，2008年第5期，頁47。

⁵³⁹張琳，〈郭士立的醫藥傳教思想與實踐〉，《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廣州：廣州大學，2005年5月，頁18。

⁵⁴⁰前引文，頁17。

參考書目

(中文按照首字筆劃排序，英文按照首位字母排序)

史料

1. 丁韞良，《花甲記憶》，廣西：廣西師範大學，2004。
2. 老尼克著，錢林森譯，《開放的中國——一個番鬼在大清國》，山東：山東畫報出版社，2004。
3. 佐佐木正哉編，《鴉片戰爭前中英交涉文書》，台北：文海出版社，1997。
4. 威廉·亨特著，馮樹鐵譯，《阿兜仔在廣州》，台北：台灣書房，2010。
5. 威廉·亨特著，沈正邦譯，《舊中國雜記》，台北：台灣古籍出版社，2003。
6. 斯當東著 葉篤義譯，《英使謁見乾隆紀實》，上海：上海書店，2005。
7. 愛漢者編，《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北京：中華書局，1997。
8. 衛斐列著，顧鈞譯，《衛三畏生平及書信》，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4。
9. 衛三畏，《中國總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
10. David Abeel, *Journal of a Residence in China: and the Neighboring Countries, from 1829-1833.* (New York : Leavitt, Lord, 1834 ; Forgotten Books, 2012.)
11.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The Journal of Two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1831-1832.* (New York: Published by John P. Haven , 1833.)
12.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Report of Proceedings on a Voyage to the Northern Port of China, in the Ship of Lord Amherst.* (London : B. Fellowes , Ludgate Street , 1834.)
13.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 *A Sketch of Chinese History , Ancient and Modern: Comprising a Retrospect of the Foreign Intercourse and Trade with China.* (London : Smith , Elder and Co, 1834.)
14.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 *Journal of Three Voyages along the Coast of China.* (Lodon: Frederick Westley and A. H. Davis, Stationers' Hall Court, 1834.)
15.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The Life of Taou-Kwang, Late Emperor of China : with Memories of the Court of Peking.* (London : Smith , Elder And Co, 1852.)
16. Karl Friedrich August Gützlaff, *China Opened; or, a Display of the Topography , History, Customs, Manners, Arts, Manufactures, Commerce, Literatures, Religions, Jurisprudence, etc. of the Chinese Empire.* (London : Smith , Elder And Co, 1838.)
17. R. C. Hurley, *The Tourists Guide to Canton, the West River and Macao.* (Pedders Hill, Hongkong : Office of the "Hongkong Telegraph" 1898; Taipei : Ch'eng Wen Pub. Co, 1973.)
18. Robert Fortune, *A Residence among the Chinese : Inland, on the Coast, and at Sea : being a Narrative of Scenes and Adventures during a Third Visit to China, from 1853 to 1856.* (London : J. Murray, 1857 ; Taipei : Ch'eng Wen Pub. Co, 1971.)
19. Sirr, Henry Charles, *China and the Chinese : Their Religion, Character, Customs, and Manufactures: the Evils arising from the Opium Trade: with a Glance at our Religious, Moral, Political, and Commercial Intercourse with the Country.* (London : Wm. S. Orr,

1849 ; Taipei : Southern Materials Center,1977.)

20. *The Chinese Traveller*, 1772, 下載自十八世紀經典古籍資料庫：「Eighteenth Century Collection Online」, 網址：

<https://huso.stpi.narl.org.tw/husoc/husokm?!!FUNC270>(下載時間：2012.09.08)。

21. Walter Henry Medhurst, *A Glance at the Interior of China, Obtained during a Journey through the Silk and Green Tea*. (Districts: Taken in 1845, Adamant Media Corporation, 2001.)

專書

1. 古鴻廷,《清代官制研究》,臺北:五南,2005。
2. 全漢昇,《中國經濟史論叢》,臺北:稻禾出版社,1996。
3. 任繼愈主編,《宗教詞典》,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81。
4. 任繼愈主編,《中國道教史(上)》,台北:桂冠,1991。
5. 任繼愈,《佛教與中國文化》,台北:國文天地,1990。
6. 林治平,《基督教與中國論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3。
7. 吳義雄,《開端與進展—華南近代基督教史論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
8. 卓新平,《中國基督教基礎知識》,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9. 邱樹森主編,《中國歷代職官辭典》,臺北:商鼎文化,1999。
10. 茅海建,《天朝的崩潰:鴉片戰爭再研究》,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5。
11. 約·羅伯茨編著,劉林海譯,《十九世紀西方人眼中的中國》,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
12. 姚民權、羅偉虹,《中國基督教簡史》,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
13. 施翠峰,《台灣原始藝術研究》,宜蘭:傳藝中心,2005。
14. 馬士著,張匯文等譯,《中華帝國對外關係史(第一卷)》,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15. 馬森著,楊德山譯,《西方的中華帝國觀》,北京:時事出版社,1999。
16. 馬廉頗,《晚清帝國視野下的英國—以嘉慶道光兩朝為中心》,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17. 馬書田,《中國佛神》,北京:團結出版社,2006。
18. 陳壁顯編,《中國大運河史》,北京:中華書局,2001年。
19. 曹增友,《傳教士與中國科學》,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9。
20. (明)黃成著,長北校勘、譯註、解說《髹飾錄圖說》,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7。
21. 黃文博,《台灣民俗趣譚》,台北:台原出版社,1993。
22. 張西平,《中國與歐洲早期宗教和哲學交流史》,北京:東方出版社,2001。
23. 張西平,《傳教士漢學研究》,河南:大象出版社,2005。
24. 張國剛,《從中西初識到禮儀之爭—明清傳教士與中西文化交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25. 張靜芬，《中國古代造船與航海》，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94。
26. 費正清，《費正清對華回憶錄》，上海：知識出版社，1991。
27. 賽班著，李少軍、尚新建譯，《西方政治思想史》，臺北：桂冠，1997。
28. 蕭兵，《避邪》，香港：萬裡機構·萬裡書店出版，2004年。
29. 蘇精，《上帝的人馬——十九世紀在華傳教士的作為》，香港：基督教中國宗教文化研究社，2006。
30. 顧長聲，《從馬禮遜到司徒雷登》，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5。
31. 顧長聲，《傳教士東來傳教恩論文集錦》，台北：宇宙光出版社，2006。
32. Benjamin Louis Fischer, *"Opium Pushing and Bible Smuggling": Religion and the Culture Politics of British Imperialist Ambition in China*. (Indiana: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2008.)
33. Jessie Gregory Lutz, *Opening China: Karl F. A. Gützlaff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827-1852*. (Cambridge, U.K.: Eerdmans Pub Co. 2008.)
34. K. S.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in China*. (London: Society for Promoting Christian Knowledge, 1929; Chang Wen, Taipei, 1975.)
35. Suzanne Wilson Barnett、John King Fairbank, *Christianity in China-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 the Committee on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of the Dept. of History, 1985.)
36. Thurin, Susan Schoenbauer, *Victorian Travelers and the Opening of China, 1842-1907* (Athens: Ohio University Press, Co. 1999.)

期刊論文

1. 卞浩宇，〈基督教新教早期在華“醫藥傳教”剖析〉，《歷史教學》，2008年第8期，頁45~50。
2. 王宏斌，〈乾隆皇帝從未下令關閉江、浙、閩三海關〉，《史學月刊》，2011年第6期。
3. 王文權，〈清朝官服補子研究〉，《學術探索》，2012年1月。
4. 李樂曾，〈近代德國基督教(新教)傳教團在中國活動概述〉，《同濟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1994年9月。
5. 邢甲志，〈德國傳教士郭士立在中國的活動及其影響〉，《黑龍江科技資訊》，無頁數。
6. 武占江、王亞南，〈《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析論——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過渡形態〉，《西安電子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16卷第1期，2006年1月。
7. 祈美琴，〈關於清代樞官“差官”問題的考察〉，《清史研究》，2003年11月第4期。
8. 陳力丹，〈郭士立與馬克思、恩格斯〉，《傳播史話》，1999年1月。
9. 陳虹，〈郭實獵評傳〉，《圖書館雜誌》，2004年第5期。
10. 陳國棟，〈清代前期粵海關的利益分配(1684-1842)：粵海關監督的角色與功

能》，《食貨月刊》，第 12 卷第 1 期，1982 年 4 月。

11. 張琳，〈郭士立的醫藥傳教思想與實踐〉，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4 卷第 5 期，2005 年 5 月。

12. 張德昌，〈胡夏米(Hugh Hamilton Lindsay)貨船來華經過及其影響〉，《中國近代史論叢》，第二輯第一冊《不平等條約與平等新約》，台北：正中書局。

13. 張明之，〈從朝貢體系到條約通商：近代中國對外貿易型態的變遷—鴉片戰爭 170 週年反思〉，《南京政治學院學報》，2010 年第 3 期。

14. 楊玉良，〈清代北京城的警備機關一步軍統領衙門及《白塔信炮章程》〉，《紫禁城》，1996 年第 1 期。

15. 楊佳智，〈郭實腊其人及其在早期傳教活動中所扮演的角色〉，《傳教運動與中國教會》，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9 年 3 月。

16. 黎尚健，〈關於《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若干問題的探索〉，廣州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8 卷第 8 期，2009 年 8 月。

17. 羅大正，〈《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宗旨及編輯特色〉，《學術界》，第 132 期，2008 年 5 月。

18. 羅大正，〈《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創辦的社會歷史背景〉，《甘肅聯合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24 卷第 6 期，2008 年 11 月。

19. 羅大正，〈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對近代中國的影響〉，《齊魯學刊》，2008 年第 5 期。

20. 羅大正，〈開啓中國大門之先聲：《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歷史教學》2008 年第 22 期。

21. 譚樹林，〈早期來華新教傳教士與中國傳統文化〉，《北方論叢》，1998 年第 4 期。

學位論文

1. 方姿堯，《從衝突到和合—《東西洋考每月統記傳》的書寫策略與文化意義》，政大中文研究所碩士論文，民國 100 年 4 月。

2. 張志惠，《閱讀中國：《中國叢報》(*Chinese Repository, 1832-1851*)與新教傳教士關於中國的理解與書寫》，台大歷史碩士論文，民國 95 年。

網站

1. 國立台灣文學館網站：<http://www.nmtl.gov.tw/>

2. 國立科學工藝館網站：<http://epaper.nstm.gov.tw/>

3. 華人基督教史人物辭典：<http://www.bdcconline.net/en/>

4. 中國礦業網：<http://www.chinamining.com.cn/index.asp>

5. 北京故宮—文化人民網：culture.people.com.cn/